

反右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Research o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反右研究文集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劳改基金会  
中国信息中心

# **反右研究文集**

## **Research o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劳改基金会 中国信息中心  
华盛顿  
2008

# 反右研究文集

反右运动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普林斯顿）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 中国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 古原 Stacy Mosher

封面设计/ 古原

会议图片/司鹏程

华盛顿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 本书版权所有。

## **Research o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Washington, DC 2008

[www.laogai.org](http://www.laogai.org)

[www.observechina.net](http://www.observechina.net)

ISBN 978-1-931550-18-5

Printed in U.S.A.

定价: U.S. \$ 15

# **The 5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of 1957**

##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Sponsored by:**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主办:**

劳改基金会 中国信息中心

Date: June 6-7, 2007

Place: McCormick Hall 10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 会议图片



吴弘达致开幕词。左起为余英时，陈奎德。



前左起：林培瑞、陈奎德和姚监复。（大纪元图片）

# Table of Contents

## 目 录

Background of the Conference (会议背景) .....	1
余英时 欢迎词及“反右”五十年感赋四绝句 .....	3
吴弘达 一九五七年（开幕词） .....	7
陈奎德 反右——空前规模的文字狱（前言） .....	11
历史图片 .....	13
李昌玉 历史的恩宠和我的报答 .....	15
任 众 作为右派，我的生活与思想经历 .....	19
姚仁杰 作为右派我自 1957 年以来的经历 .....	22
遇罗文 右派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	24
张先痴 反右运动的背景和导因 .....	28
铁 流 人格要独立，首先经济要独立 .....	30
陆清福 一个右派对反右运动过程的观察 .....	36
章诒和 章伯钧在 1957 年 .....	38
程庆民 我在北大的右派生涯 .....	43
林希翎 我不再需要中共给我“改正” .....	45
邓焕武 我的 1957 年 .....	50
张轶东 不是阳谋，是叶公好龙 .....	55
姚监复 对张轶东发言的评论 .....	61
邢小群 评张轶东、张先痴、任众的讲话 .....	64
吴弘达 反右与劳改 .....	66
张鹤慈 被杀的孩子——纪念反右五十周年 .....	70
章立凡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两大政治目标 ——“反右”动机之研究 .....	76
姚仁杰 对张鹤慈、章立凡发言的评论 .....	100
胡 平 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	103

邵 江	1957 年的非官方杂志《广场》 .....	112
党治国	家天下党天下和反右运动——纪念反右运动 50 周年....	118
王友琴	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 .....	125
姚监复	从“反右派”到“大饥荒”的必然性 ——对河南“反潘杨王集团事件”的案例解析 .....	143
齐家贞	性格决定命运，然后相反并且循环 ——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在 1957 年前后 .....	149
邢小群	中国右派们的政治改革情结 .....	157
丁 东	终身制与右派上书 .....	164
余 杰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 .....	172
姚仁杰	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祭 .....	190
钟沛璋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劫 .....	196
章立凡	《陈铭枢上毛泽东书》读后 .....	202
魏紫丹	再论“反右”与“文革” .....	216
Jiang Shao	The CCP's Strategy of Media Control in the 1950s 中共 1950 年代控制传媒的策略.....	222

### 反右会议后记

齐家贞	普林斯顿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研讨会拾掇 .....	241
严家伟	廉颇虽老矣，努力加餐饭！ —— 写于反右五十周年 ...	252
金 钟	悲愴的历程——普林斯顿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散记 ....	255
紫 荆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	261
(附录)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程 .....	265

# Background of the Conferenc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This year marks the 5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China's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at began in 1957.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w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because it sparked a series of violent policies that created a mor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As a resul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llectual thought, and modern ideas were destroyed to maintain power.

During this campaign, an estimated 550,000-1,000,000 men and women who were educated in China and abroad were persecuted and labeled "rightists" or ultimately "untouchables." Intellectuals and accomplished professionals were ousted from their jobs, banished to labor in remote areas, and imprisoned in the Laogai. Many of the heart-wrenching stories of this dark time in China's recent history ended with the deaths of victims in desolate corners of their motherl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left China in a chaos where political extremism and legal injustice had become the norms. Although 50 years have passed, its effects are still evident in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structure. Since 1957, the polic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erpetuated by Mao Zedong and then Deng Xiaoping have persistently destroyed China's human capital, and have quashed independent thought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lthough people are no longer labeled "rightists," intellectuals continue to experience similar persecution today. The government's tools of repression may have changed, but academic freedom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speech are still prohibited in China today, and those who fight for these rights, like their 1957 counterparts, are still harassed and imprisoned.

Given the significant of this campaign, the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and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hel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5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on June 6-7, 2007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a symposium of the same name on June 8, 2007 at Freedom House in Washington, DC. More than 20 men and women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who were labeled “rightists” during the campaign, as well as informed witnesses,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ference. The speakers shared their memories, experiences, and opinions about various aspects of the campaign. “Past experience, if not forgotten, is a guide for the future.” The intent was for the conference to expose the truth about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rough reviewing its recent history in hopes of promoting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China. The 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published here in book form, focus on the following main topics:

- Wha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xisted in China prior to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 What factors led up to the campaign?
- Was the campaign a premeditated act after the Hundred Flowers Movement as some suggest, or was it an unexpected result after Mao felt the movement went too far?
- What were the campaign’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ffects?
- What were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campaign?
- What are some cases that typify what occurred during that period?
- First-hand accounts of victim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journeys.
-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ampaign and the Great Three-Year Famine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f there is any hope for democratic reform in China, its leaders must acknowledge their country's painful history and allow intellectuals to flourish. It is hoped that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this book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bate and discussion engendered during the symposia at which they were originally presented.

# 欢迎词 及 “反右”五十年感赋四绝句

余英时

作者简介：中国信息中心董事会成员。哈佛历史学博士。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等职，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公开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并成立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为中国著名的流亡异议分子包括刘宾雁、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和白梦等人提供关怀与帮助。余英时学贯中西，著述甚丰。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余英时

谢谢本次会议邀请我来参加并致欢迎词，我很高兴这个重要的会议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我这里谈两点看法，权作欢迎。

第一，我要说的是，右派分子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作为当年中国的右派，是一种历史荣誉。当时的右派到底有多少？不知道。作为右派，现在至少七老八十了。我看章诒和的书《往事并不如烟》里提到，罗隆基看到《大英百科全书》讲到右派的一条，把他与章

伯钧放了进去，条目中指出他们是为民主奋斗的知识分子，他非常兴奋，这样他们将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载入史册，会非常有名气。罗隆基在美国和英国读过书，他知道外国学术界的事情。总而言之，右派是光荣的名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右派过了 50 年，右派的历史、上百万人及家庭的遭遇，我们知道得非常少。近年我看了很多右派的回忆录，也给他们写过序，我的基本态度在这些序里讲得很清楚。比如，给巫宁坤再版的序，就是讲右派的问题。今天大家多数都是受过灾难的人，由你亲自讲这段经历，给写历史的人看，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故事越多，历史的面貌就更清楚。如果讲多少右派遭到灾难，这句话很简单，可是要了解一家一家的灾难，很难。前两天，我看了犹太人的博物馆，我就很感慨，他们把每个小细节都找出来。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能说过去了就算了。

中共一直把知识人当作潜在敌人，绝对不予信任，你投降，它也不信，认为你口是心非，没有交心，所以一再要挖心，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反右就是第一次大规模整知识分子的运动。现在的共产党则是另一种办法，腐化你，只要你不推翻政权，做什么都可以。整个社会腐败，就没有精神力量了。

我为这次反右会议写了四首诗。如下：

### “反右”五十年感赋四绝句

#### 一

右袒香肩梦未成  
负心此夕泪纵横  
世间多少痴儿女  
枉托深情误一生

#### 二

未名湖水泛轻沤  
池浅龟多一网收  
独坐钓台君不见  
休将劫数怨阳谋

三

横扫斯文百万家  
更无私议起喧哗  
九儒十丐成新谶  
何处青门许种瓜

四

辱没冤沉五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人亡家破无穷恨  
莫叩重阍更乞怜

“右袒香肩梦未成”，陈寅恪咏“反右”句。“分明非梦亦非烟”，邓拓告别《人民日报》句，适可借用。

# 一九五七年

(开幕词)

吴弘达

作者简介：原右派。国际著名人权活动家。中国信息中心发行人，劳改基金会创办人、执行主任。劳改题材作家。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2007年匈牙利自由英雄奖章获得者。此前曾获国际多个人权奖项。

吴弘达 1957 年进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工程系。在“鸣放”期间，因怀疑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民主运动的合法性，1959 年被划为右派。1960 年以“反革命右派分子”逮捕。在劳改营 19 年期间，曾在 12 个不同劳改营中当苦役，包括北苑化工厂、团河农场、清河农场、营门铁矿、延庆钢厂、王庄煤矿，历经饥饿、关禁闭、刑求等肉身和精神的折磨。他的母亲因他入狱而自杀，弟弟亦因精神失常而被害。吴弘达 1979 年获改正。1985 年赴美访学。1992 年成立劳改基金会。1995 年回中国探访劳改营侵犯人权的情况时，被当局以“间谍罪”逮捕，被判刑 15 年，立即驱逐出境。

由于吴弘达的努力，中国非人道的劳改制度已受到国际的广泛注意，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议会、议院都对劳改制度提出正式的谴责。吴弘达并将“劳改”一词推介到英、德、法、意的词典，使“laogai”成为中国式集中营的代名词，意义等同前苏联的古拉格 gulag。

最近，吴弘达帮助王小宁、师涛控告雅虎导致中国异议人士入狱案，



吴弘达

影响巨大。师涛和王小宁案直接催生了美国“全球网络自由法案”，该法案对保护新生的网络生活、尤其是独裁国家的网络使用者，意义重大。

1957 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键的一年。1957 年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揭掉自己的面具，抛弃自己的信念，走向反面的一年。

如果我们说，自 1921 年共产党成立，它打着推翻三座大山，消灭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旗号，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文化传统的保持，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斗争，那么，这一场斗争到了 1957 年也结束了。1957 年以毛泽东为首，在周恩来、刘少奇及邓小平的积极拥护下，中国共产党转向了历史的反面。

1957 年中国共产党镇压了约 100 万名知识分子。当时来说，全国约 500-600 万名知识分子，即约 20% 被清洗镇压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地摧残文明、迫害异己的政治斗争。虽然，1957 年的前几年里有斯大林事件、有东德、匈牙利、波兰的暴动，但是，如果谨慎的分析，中国还不会走到反对共产党的道路上去，这并不是中国人民的性格比较保守或者老实。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中国的每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后期，老百姓困苦不堪，任由统治者盘剥、镇压一直到了死活不得的地步。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骗子打着“造反”“起义”“平天下”的旗号起来夺权。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宗、清末的洪秀全不都是这样吗？甚至还没有完全成功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金字塔型的统治架构。一旦他们成功了，不就是又建立了一个王朝。历史在中国这样重复地演变成了几千年。

1911 年清王朝覆灭后，经过 38 年的内战（记住，中国共产党叫喊的是反内战），经过 10 多年的抗日战争（记住，中国共产党是靠抗日而东山再起的），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还进一步趁势掠夺了全国的土地及资源，垄断了所有人的生命底线。这是按照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确实相信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确实认为消灭阶级，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是共同富有的必经之路，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保障革命的必需手段，那就承认 1957 年之前的所有政

治运动及政治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八年（1949—1957）中许多人丢失了性命，或者被列入“另册”，苟延残喘地活着。共产党王朝已完全建立。按照它的革命理论，应该给老百姓一点点恢复和平和幸福的生活。

1957 年中国共产党继续它的不可相信的运动。这一次是整肃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这一百多万右派分子几乎都没有想过反对共产党而实际上是支持和帮助共产党干革命的人。这从今天（50 年后）的结果可以看到，从葛佩琦、刘宾雁、朱鎔基、丛维熙等人的事例中都可以看到。不管他们再次成为党员或者开除出党，他们基本上保持着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立场，忠于党，为共产党服务。事实上，大多数的右派当年不知东南西北，成了“阶级敌人”，吃尽苦头，走完人生。这一百万人中真正的有几个反对共产党的？有几个林昭？

1958 年的 5 月 1 日在中国有一场闹剧。全国停业停课三天，响应毛主席号召全民打麻雀。全国人人动手，不知打死多少麻雀。这时右派分子已在 58 年 2 月份开始被处分。不论是送去劳改或者没有送去劳改，几乎没有一个再敢吭声。而且，右派的队伍，不断在全国各地增长。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位教授说，“我赞成打麻雀，但是全国麻雀消灭了，如果麻雀从缅甸飞进来，怎么办？”他就被立即赐给右派帽子一顶。打麻雀并不是毛泽东缺乏科学知识而造成的，而是“指鹿为马”的翻版。打过麻雀后，全国的“大跃进”就开始了。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这样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死掉。

邓小平只能宽恕右派，但不可能承认这是错误，给予翻案。因为他是当今的至尊，是毛泽东之后的专制制度的执行者。邓小平的行为是再好不过的对共产党政权的说明。

1957 年的反右至今已 50 年了。再过 50 年，不要说我们这样的右派分子已完全没有了，就是我们的子女也恐怕不剩多少了。但历史上永远记得 1957 年的这场反右派斗争。

一个人的死亡可以写一本书，可以成为一个使人难忘的故事。

一百万人的死亡，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不久就会消失了，但历史上将永远留下 1957 年。

# 反右——空前规模的文字狱

(前言)

陈奎德

作者简介：1946 年生于江苏南京市。1985 年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 年任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



1989 年，赴美任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教授。1990 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网评论员及编辑，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本次研讨会筹划人之一。他也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栏目主持人。

陈奎德的研究方向有西方哲学史、政治哲学、科学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国近当代文化变迁等，著有多本学术专著。

1957 年，中国大陆发生了反右派运动，迄今已经整整 50 周年。

反右派运动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因言治罪的文字狱。它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对抗现代文明的反智主义的极权道路。它是中国之后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的滥觞。

在这次反文明的野蛮迫害中，中国约有 100 多万知识分子中箭落马，被打入地狱。一大批从国外归来或在国内受教育的高级人才，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为“不可接触者”。他们或被劳改，或被流放到边远的地方，或被从自己的专业岗位上消失了。中国的

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不获使用。百万右派的遭遇，个个都可以写一部椎心沥血的伤心史，很多人没能熬到“改正”的日子而含恨死去，默默地消失了。从此，中国上下，鸦雀无声，噤若寒蝉，这种政治气氛，为一切荒谬绝伦、残酷暴虐的行为开了绿灯。从此，一系列政治运动连绵而至，中国进入暗无天日的时期。1957年中共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控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逆转”，也是对世界自由和民主资源的一次大摧毁、大破坏。

鉴于上述问题的重要性，鉴于北京政府多年来不敢面对历史并封锁真相，鉴于亲历历史者年事已高将不久人世，抢救和评估史实的工作已迫在眉睫，鉴于我们与中国大陆内外、香港、以及美国的原右派分子、反右运动研究者保有的长期联系与交流，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于2007年6月6日与7日两天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围绕如下议题展开：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什么？“整风”中确实有一次中国民主潮的兴起吗？反右是毛泽东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还是面对未必充分估计得严重挑战而紧急实施的镇压？运动发展阶段如何？运动中的典型案例？“右派分子”们的悲剧经历、心路历程？反右与“三年大饥荒”、与“文革”的关联？……

这是自反右五十年来右派首次大规模集结的国际会议。应邀与会的原右派、右派后人有林希翎、任众、铁流、姚仁杰、吴弘达、张先痴、程庆民、陆清福、陈端昭、沙宣和、魏紫丹、方能御、郭东海和章立凡、俞梅荪、黄肖路、黄观鸿、遇罗文……等，与会的还有著名史家、反右研究者：余英时、林培瑞、张轶东、姚监复、王友琴、胡平、陈奎德、金钟、余杰、邢小群、齐家贞、邵江……等。与会者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旨在抢救历史，澄清史实。会议讨论热烈深入，从各种角度，从多个层面，就事实与理论仔细审阅了五十年前这一旷古大难。本书就是这次赋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论文的结集。

（本书尽量收集和整理了本会的论文和发言，但仍有个别论文和演讲缺失，在此敬请谅解。）

## 历史图片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全国上下掀起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和建议的热潮。



5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向提意见的人士发出反攻信号。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揭开反右序幕。



5月25日，毛泽东对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当年的国庆游行，出现“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的标语。



成千上万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以劳教、下放等形式，送到农场、矿山等最恶劣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不少人有去无回，饿死、病死和被虐待死在劳改营。

# 历史的恩宠和我的报答

李昌玉

作者简介：1934 年出生于重庆。1949 年 11 月在上海参加青年团，1951 年 1 月“抗美援朝”参军，随后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1955 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小集团头目。1956 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8 年定为右派分子。1960 年后做中学语文教师。文革前“摘帽”，文革中以“翻案”之罪再次“戴帽”，劳改 12 年，直至“改正”。后在山东大学附中语文教师岗位上退休。2000 年学会上网，是活跃的网络作家。他由于受到中国当局的阻挠及抄家，不能出席本次会议。本文为作者为反右会议所写的发言稿。

我为什么要进入历史写作，特别是关注反右历史呢？首先当然是因为我戴过右派帽子，而且是极少数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人，我的感受更加深刻，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谁经历了也难以忘记的。但是，现在我知道，在右派中，我的遭遇其实是不很悲惨的。我在第一次摘帽之后结了婚，然后有了两个儿子。正因为我的儿子比较小，所以错过了最受歧视的年代，等他们读中学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我的右派“改正”了，他们因此可以顺利地读大学，一个还读了研究生，现在在美国。我和老伴都是中学教师，现在生活足以过得去。因此，我比许多右派，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要好得多。当时有超过一半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时间长达 22 年，文革对每个右派都是一道鬼门关，许多人饿死、砸死、打死、病死、自杀，四五十岁以后结婚的大有人在，这些人遭遇之悲惨，

简直是惨不堪言。我个人的苦难相比之下，要小得多，因此我早已不耿耿于怀了，可以说已经化解了。现在，我是要为历史作记忆，把历史的记忆流传下来。我的书名叫《历史大视野》就是不局限在反右一个方面，因为我 1934 年出生，经历了抗战全过程，视野当然要开阔得多，不过现在我仍然要介绍一下反右的问题。

我们是济南人。我首先从济南的历史说起。我们济南是解放军用攻坚战打下的第一座城市。那是在 1948 年的 9 月。那时，济南市还有城墙，高 14 米，厚 8 米。要攻下这么一座城市，在当时，解放军的武器还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必须付出重大的牺牲。而且，蒋介石 3 次飞临济南视察，准备了 4 个军空投济南，要在这里和解放军决一死战，但是因为驻守西郊机场的军长吴化文率部起义，使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完全泡汤。吴化文的起义，陈毅说，使解放军少牺牲了几万人。那么，吴化文为什么起义呢？是被围困得走投无路吗？不是，是因为两年前他就被周恩来策反，而充当周恩来联络吴化文的中间人，就是 1957 年打为中国头号大右派的章伯钧。章伯钧本来应该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可是后来打了他的第一号右派。他早不反对共产党，却在这个时候反对共产党，合乎逻辑吗？最近我查阅了 1957 年的《人民日报》，在批斗章伯钧的会上，有人揭发说，章伯钧野心很大，想要当总理，报纸还用标题标示。这样欲加之罪，什么人还打不倒！再说，在民主政治下，想当总统也没有罪，何况是总理。毛泽东对章伯钧的游说之功怎么能够一无所知？而且直接策动、负责联系吴化文起义的周恩来和陈毅两个人，对于章伯钧打右派竟然不站出来为他辩护，说一句公道话，正义何在？公理何在？恩将仇报，负义如此，还有没有人性人情？中国的第一号大右派就是惊天冤案，我们有责任把他说清。

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 1956 级的学生。我们入学的第二年就遇到反右运动。我们一百来个同学的年级打了 8 个右派，其中有一个朱玉标，过了 49 年，我才知道他的结局。当时，我们大多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思想单纯，无所负担。有一天，那时正是大鸣大放时候，三个同学上街，一个对朱玉标说：“朱玉标，你小子胆子大。你敢不敢说一句最反动的话。”朱玉标脱口而出：“打倒共产

党。”后来，这位逗引朱玉标的同学害怕了，向党支部汇报了此事，最后，朱玉标定为极右分子，在劳改地被秘密枪决。一句戏言，送掉了一个青年的命。这件事，我是过了 49 才知道的，今天听起来真是震颤而又震撼，匪夷所思。我作为朱玉标的右派同学是不是有责任把这件事记载下来？

我要说的第三个例子就是我的老师、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陆侃如。他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文学史专家，九三学社青岛市的负责人。他在九三学社传达、讨论毛主席提出的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制是否必要的问题。反右中说陆侃如造谣，假传圣旨，因此，他成了山东大学的第一号右派。22 年后，查了一下历史记载，毛泽东确实向民盟、九三的领导人，当面下达过这个指示，时间是 1957 年 5 月 30 日夜晚，在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的时候，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说的。陆侃如的右派问题当然顺利“改正”了，我写了《哑巴吃黄连的陆侃如》。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不可以记载？应该不应该记载？有人说，历史还是让后人去说吧！当我们这些见证人、知情人都死去之后，后人怎么知道呢？

因此，我们作为反右运动的见证者、经历者、受害者有责任有义务记载它。打右派是非常痛苦的事，谁愿意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做右派的生活吗？但是既然打了右派，当苦难过去，回首那血泪熔铸成的苦难，不也是一笔人生难得的财富吗？这样的历练和财富，这样的专利，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史无前例啊！正如打过右派的戏剧家吴祖光所说的，我们不是“生不逢时”，而是“身正逢时”。因此，我认为这是历史对我们的恩宠和青睐。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像众多退休老人一样，终日无所事事、悠游林下，或打打门球下下象棋，也可以游山玩水、周游列国，还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总之，我可以非常太平、非常安全地寿终正寝，但是我在良知上觉得自己还是应当报答历史对我的恩宠，这就是把我的经历、阅历和思考还原给历史，因此我被迫选择了这种在中国要冒犯政治风险、失去安全保障的生活方式。历史需要一代人一代人传承。记载历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最珍贵的遗产。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要使自己站在文明发展的前进行列，就应该珍重对

自己历史的记忆。共产党不是反复告诫人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没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没有二十四史，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呢？比我年长 17 岁的革命老前辈、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人。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道路快走完了，在这样的时候，应当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如今，我已是年过古稀的人，垂垂老矣，行将就木，心知天下兴亡，老夫无责。我只想恪尽绵力，写几篇文章，反思反右，反思这一百年的历史，报答历史对我的恩宠。我是以报恩的心情和态度来书写历史。

# 作为右派，我的生活与思想经历

任 众

## 作者简介：

1934 年生于北京，  
在矿山做过童工。  
1945 年 12 岁时参  
加过八路军。1953  
年入公安学校学  
习，后在北京市公  
安局工作。在肃反  
和反右派运动中因  
言获罪成为极右分  
子，被送到茶淀劳  
改农场。1979 年被“改  
正”。现已退休，住北京昌平区农村。著有回忆录  
《活过 爱过 奋斗过》。2007 年，他和尚存的右派分子共同发起“反右受  
害者索赔运动”，影响巨大。他是这一活动的联络人。



无数被打成右派的青年，被送农场劳改，耗尽人生的黄金年华，甚至生命。前左(亮光内)为任众，他和难友在劳改中。

很有幸能参加这个会议，向大家介绍一下一个特殊定义的群体——右派分子。

我有幸成为我们 61 个原右派分子联名上书要求索赔的联系人。我的电话、信件和采访特别多，有美国、加拿大、法国打的电话。美国有个陈友华先生，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他说到被子女不理解的时候，泣不成声。我跟他同时落泪。为什么？我们都面对过婚姻、恋爱、家庭、教育、经济，所有的冲击。我是二等公

民，每月 28 块钱，被监督劳动。我谈不上什么恋爱、婚姻、子女，谈不上！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剪断的风筝，爱飘到哪飘到哪。我觉得自己的命运，在共产党的体制下，是：画黑容易画红难，生命有路进无门。在共产党的政权之下，一个人的前程就是这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在划了右派之后，经历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不谈过多的痛苦经历，我只想说，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应该是一本书。写书的人很多，我也写了一本书，在 2006 年完成，书名是《活过爱过奋斗过》。

有一个右派比我的命运还坏。他是公安局的，叫孙诚，他写的一首诗登在《首都公安报》上：“世上多少不平事，反将不平说是平。一旦随我凌云志，扫尽不平为平生。”就为这么短短的诗，他被枪毙了。他是公安局后记处搞卡片管理的。他把人间的情感，写成这么一首诗。就被打成右派了，下放到农村。文化大革命当中，被轰回老家去。当地农村要找典型，找名牌，他就当了名牌，把他拉出去。

他说：“拉我干嘛？”

“先游斗，游斗后枪毙。”

“我是北京划右派的。”

“正是你是在北京划右派的，没错！”

到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原单位办公室的人去问，到那一找，他们说：“对不起，来晚了。枪毙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轻松”，说“枪毙”就完了，人就回去了。再没有人追究谁枪毙了他。

一个人死很容易，但找制造这个杀人事件的人，不行，没门。

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杀人作为阶级感情来随便杀。我们被杀的人，只要有不同意见，借机就可以杀掉。在中国要活下里，真的很不容易。

在大清县的集体屠杀，谁敢追究它的后台，为什么杀这些人。有一些是当杀的，结果不但不挨杀，还说他们是有阶级感情，是热爱毛主席的。他们还不吃官司。

我认为，从过去的毛泽东到现体制，还没有真正的改变。如果要改变这个状况，必须肃清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所造成的遗害。

我手上有一封信，它对在座的人是个鼓舞。这是一个山西的叫周弘达的人写的。他写：

我是 57 年被划为右派的，原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中校助理员。总政保卫部是公安部的第五局，是保卫党中央的部门，实际上是党中央的警卫员，毛以阳谋引出的毒蛇。划右派后，我始终以右派自居，无论走到哪里，所到之处，自我宣布我是右派分子，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接触的人，都说右派是好人，是说实话的人。为此，我满足，我以为荣。（5月20日）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没划右派的时候，怎么做人，说真话，一个个都划右派了。所以中国出现道德的沦丧，说假话，阿谀奉承，这个道德遗害，是几代人都很难扭转的。

我之所以愿意担当反右索赔的联络人，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有一种历史使命，承担起替受难人说话的责任，而且要把我们所受得的难，告诉后人，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造的冤假错案太多太多，必须让人们觉醒。我以为这是一个历史责任，我才愿意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的。我并不怕有什么后果，我知道这很危险，因为我毕竟是从北京来的。在北京时，国安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已决定不去了参加反右会议。为什么呢，如果我一旦出来，他们会截我的，所以我只能说些瞎话，对朋友也说，我不去。但实际上我已经签好证了，我是很欣喜地来参加这个会的。至于回去会怎么样，我不在乎！

各位。我现在想再说一句结尾语，我们写书，我都希望大家都写，把自己血迹斑斑的经历写出来，我总结的话就是：凝血成文史，留给世人知。

（本文根据录像整理）

# 作为右派我自 1957 年以来的经历

姚仁杰

作者简介：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当助教，1957 年 23 岁适逢反右运动，被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被开除公职，强制劳动教养，解教后被强制留场就业。到了文化大革命，再次被专政，被发配到四川凉山雷坝子农场劳改。1979 年被改正，回北大工作。现在是退休教授。



姚仁杰在会上发言。

反右运动是个大个问题，受害者这么广泛，时间那么长，我们北京大学受到一类处分，定性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处分结果是：开除公职，强制劳动教养。

我当时才 20 几岁，又有化工专业，公安局就利用我的知识，建化工厂，养活了几百个右派。这算是有立功表现，北京市公安局上报北京市委，我成为第一个被摘帽的右派。尽管 61 年就摘了帽子，但被强制留场就业。到了文化大革命，再次被专政，被发配到四川凉山，一个环境最险恶的劳改场——雷坝子农场。这文革十年所受的罪，比我戴右派帽子时在北京及在天津的清河农场所受的罪多得多。回到人民队伍，我反而更受罪。摘帽子是假，专政是真。直到中央 56 号文件，我才被“改正”。如果以 80 岁为寿命，这段经历就占了四分之一。当二等公民，什么权利都被剥夺。这二十年，我是占全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由于我适应能力比较强，所以熬过了人间炼狱二十年，四肢完整回到了北京大学，继续

二十余年前的助教工作。日以继夜地工作，从助教升到讲师，再升到副教授、教授。但这就完了，年龄到了，要退休了。他没有因为耽误了你二十年，让你晚二十年退休。我愿意再当牛，他也不要你。让出位子来，让给年轻人。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就过了。

右派作为一个群体，非常复杂，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是不科学的。还有，当时处理右派六类，李先念说没钱赔偿右派，但现在有了，随便抓一个贪官污吏就够赔这些右派了，但是，共产党不会这么做。因为该赔的，不止右派，毛泽东当政搞的冤假错案那么多，岂能赔了右派就完了。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社会一个公道，清算毛泽东的专制红色帝王的罪恶，让中国人不再受同样的灾难侵害。

（本文根据录像整理记录）

# 右派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遇罗文

作者介绍：1948 年生。其兄遇罗克因写《出身论》抨击当时的政治，27 岁时被当反革命处决。文化大革命期间，遇家六口中，五人坐牢。他两度入狱，共囚六年。他的自传《我家》是了解文革前后中国社会的著名读物。作者现已移居美国。



遇罗文

大家都知道魏巍写过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都知道？因为它占据在中学课本里好几十年，我小时候就学，到了我儿子上中学了还学，以至于“最可爱的人”就像“公仆”“为人民服务”，在许多人心里已经成了贬义词组。

当然，这么笼统地给一群成年人定性是非常不严谨的。即使按毛泽东的观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要分左中右”，何况更客观地分析呢。但是如果非要把 49 年以来有共性的成年人组，排出来谁最可爱，无论是工人、农民、官僚、共产党、共青团、军人、教师、演员、大夫、地主、资本家、等等，毫无疑问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认为右派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之所以说右派是可爱的，这要从右派的产生原因说起。

我一直认为，反右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既不是毛泽东的一念之差，也不是他突发奇想，而是蓄谋已久的。因为反右前几年的镇

反运动就消灭了大批有可能对毛氏政权不满意的人，反右只是这种政策的继续——方式有所区别，目的都很明确——剥夺这些人的说话权利。

假如反右只是毛氏个人好恶所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高层人物，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流那么心领神会地充当打手。

从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无论是反右倾、四清，还是文革中的抓五一六、一打三反，都可以看出这么一个规律：凡是那些为民请命的、敢说真话的、有独立见解的、民众喜爱的人物，都难逃厄运——躲过了这次躲不过下次。

所以，在毛氏政权下反右是必然的，顶多改换一下时间、名称，受害的依然还是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你想做一个好人，邪恶政权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好人。

其实这个道理在四十多年以前，在民间就有很多人明白了。那时候我还是个高中学生，正在办一份报纸宣传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一些真正关心我们的过来人总是用敬佩的口气对我们说：“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你们可得小心！”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多的，也是最高的溢美之词。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当初毛泽东怎么规定的右派标准。不过，事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总结出来，右派的品格无非五种：1、单纯，2、诚实，3、正直、4、有深谋远略，5、肯舍己为人。

我的父母都是右派，但是他们不具备后两项那么高的境界。当然他们也很了不起，他们培养了遇罗克这么了不起的儿子。他们是因为单纯诚实和正直就当了右派——这就足够了——大多数右派不是都这么当上的吗？

我妈实在是太单纯了。其实几年前他们刚经历过一场血腥镇反运动，那时我才四五岁，隐隐约约记得与我们家来往密切的苏大爷被判了死刑，他的女儿每天都来我哭诉冤情。我家又能帮上什么呢？无非是姥姥和母亲陪着哭，再不就提些建议买什么样的棺材。又过了两年，正是五反运动，父亲被关进监狱，我妈被斗得连寻死的念头都有了。对于这样一个流氓政权还不应该认清它的本质了

吗！单纯的人往往是健忘的，仅仅又过了两年，我妈就成了工商联的积极分子，又当这个代表又当那个代表。为什么？因为你把财产无偿地交给了当权者，它露出了笑脸。你健忘当权者不会相信，它知道你随时可能明白过来你是个受害者，于是要把你定成右派。我妈成为右派很简单，就是说了句“看不出来章乃器是右派”。这下当权者省心了，你再大的不满意它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你是阶级敌人，你连伸冤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我爸爸倒是没那么单纯，他对这个政权已经看透了，但是也躲不过这一劫。他可不想参与什么“帮助党整风”活动，什么也不说。于是多少人来动员让你说。还不说？选你当发言代表集中到一个地方让你说，否则不能回家。我爸爸一看实在躲不过去了，那就捡最无关痛痒的说吧。他只说“小汇报制度不好，人与人就变得冷冰冰了”，就被定为极右分子，立即送往教养所判三年，让你回不了家！

我的父母以及大多数右派都是非常善良正直的人，所以在人吃人的社会中，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也就更凸显他们的可爱。还有许多右派像储安平、马寅初、黄万里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不仅可爱，而且值得人们敬佩。尽管毛氏政权罪恶地抵制了他们的深谋远略，从反面证实了他们的英明，我依然觉得他们是林肯杰佛逊式的伟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只是时代没有给与他们机会，中华民族没有福分享受他们的才华。

但是最让我尊敬的，是许许多多在反右运动中，那些已经看清了当权者的险恶用心，为了保护无辜宁可牺牲自己的人。我相信这样的人很多，可是由于出版言论的限制，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我知道的也只能是身边熟悉的人。

我有个朋友叫米昭曾，他的父亲米先生当时是机械部干部管理学院的人事干部。反右运动中上级给他下达了右派指标，他不忍心这样迫害无辜，于是在大会上宣布：“上级让我定你们若干名右派，我觉得你们谁也不是右派。”这件事让周恩来知道了，就给米先生定成了极右分子，送去劳动教养。不久米先生就惨死在教养所。米昭曾陪同他母亲去教养所追悼他的父亲，在一大片坟地上，

立着数不清的砖头，每个死难者只有一块砖作为标记，砖上仅仅用粉笔写着死者的姓名和出生死亡日期。米昭曾留意了一下那些砖上的日期，绝大多数死难者都是很年轻的。在我的心中，米先生永远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我的另一位朋友，他也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是我哥哥遇罗克的难友，这使我有幸和他相识。反右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为了保护两位学生不当右派，自己却成了右派。为此受了二十多年的罪，以至差点命丧黄泉。他今天恰巧也在我们的会场，那就是程庆民先生！

右派还有一个可爱之处，就是他们很少去迫害别人。之所以能这样，除了多数右派本身的优良品格以外，毛氏政权剥夺了你们的一切权力从而成全了你们。换句话说，你们用二十多年的苦难代价，保持了人格的尊严。要知道，在人吃人的社会中，不迫害别人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这也是毛氏政权的一个损招。他们利用一次一次的整人运动，既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又强迫猴们参与其中，以至剥夺了群众讨还正义的资格。

有一次我家的小保姆向我发牢骚，说现在的户籍制度不好，对农村人不公平。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现在已经没有了资格说公平不公平。想当初你们斗地主分地分浮财的时候对地主公平吗？那时候你们怎么不提公平这件事呢？我想如果她要到国务院上访反映这件事，人家就会这么回答她。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两件事，第一，在流氓政权统治下，人们既是受害者也很容易成为害人者；第二，中国六十年来当权者欠债太多，彻底地解决某项个案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全体民众都觉悟了，明白了什么是正义，所有问题都受到重视了，那时候每一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就需要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努力。

# 反右运动的背景和导因

张先痴

张先痴：23岁被定为右派，劳教3年，后又因逃跑加刑判18年。1980年获释。现在是网上活跃的异议作家。



张先痴

最近看到网上对反右的争论，有的说反右是右派的一次起义。有的说，不是起义，而是年轻人的一种冲动。我想谈我的观点。我认为，“起义”的人很多，比如北大的林昭、林希翎、谭天荣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学生。他们提出很多有创意的新观点，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一些有相当高水平的研究家，像储安平这些人，提出很有见地的意见。

我是一个县里的小镇的职员，在县里反右的时候，已经是大鸣大放。当时号召我们鸣放的时候，据我所知，当时没有谁会在大会上发言。有时候领导反复启发，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仍没有人发言。充其量说，自来水龙头关上，下班时门关好。没有人在政治制度方面发表意见。但反右后有任务，就是必须找右派。他们按家庭出身，平常说的两句怪话，就把人打成右派。我当时还不够格当右派，所以我在我的书里，自我介绍时说，1957年给我划右派，那是绝对错的，我那时不够资格当右派。我已经劳教了3年，又加判了3年，又判刑18年。到了1980年8月份，这时距离我18年

徒刑满刑还有 4 个月，突然说我不是右派，把我放了。这时，共产党的一系列运动，劳民伤财，把中华民族搞成一塌糊涂这个现状，已经教育了我，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右派。将我的右派改正，也是错误的。

我们这些老右，有很多人是很悲哀的，共产党给他们点退休金，儿女也有碗饭吃，稍微好一点，不像过去那样。这些人非常胆小，我对这种人很同情。我不能要别人像我一样。我是过分胆大了一点，所以受的罪特别多。我受的刑罚，假枪毙什么都来了。我劳教逃跑，罪加一等。我不能要求别人也逃跑，也写文章骂领导人。但我觉得很悲哀。这次邀请流沙河来开会，吴弘达先生叫我转个信给他，我感觉这信中有句话写的很好，“在反右运动 60 周年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一起吗？”的确，我们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还有十年的寿命。但我想，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应该有勇气对付这个非常残暴的极权制度，因为这个极权是用谎言和暴力来压我们的。我这次出来，国安就叫我不要来。区长就来找我谈话了：“第一，你身体不好，眼睛不方便，希望你不要去。第二，你实在要去，你说话要注意，我们都是中国人。”一听这个“中国人”我就特别反感，我想，你判我刑的时候，你想过我是日本人吗？我说：“我 70 多岁，该怎么说话我自己知道。”

我不计后果，我要勇往直前，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我们还像胆小鬼，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我们应该像李昌玉先生一样，勇敢地出来写，出来说。

向吴弘达表示感谢，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谢谢大家！

# 人格要独立，首先经济要独立

铁流

作者简介：本名黄泽荣，打右派前笔名晓枫，“改正”右派后，闯荡京城，下海经商，取名铁流。他活跃的自由撰稿人，目前居北京。因积极参与右派受难索赔运动而受监视居住。



铁流

二十年前我曾在国内一家报刊著文写道：“民主自由只能植根于富饶的土壤，不能建筑在贫脊的沙丘”。当时有不少朋友批评我，说“这是富人的观点”，但我不仅不后悔，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提出：“若要思想与人格独立，首先要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的独立，便没有思想与人格的独立。”所以我提倡有能力有本事的文化人和各界知识分子不要去做共产党的官，当共产党的吏，要勇于经商办实业或做科学家、艺术家、实业家，决不要去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俗话说“端别人的碗，就得服别人管”，“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吃人酒饭与人担担”。任何统治者和老板都一样，我拿钱雇了你，你就得听我的话，为我做事。不听我的话不为我做事，就得像我们四川话说的：“盘海（螃蟹）夹豌豆一给老子滚”。两者所不同的是，老板（资本家）用的是经济手段，解雇或开除；统治者（共产党）用的是“专政手段”，送你去劳教或劳改。

随着世界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今天共产党对不听话和不服从管理的知识分子（反抗者除外）所使用的手段，已不再是简单、粗暴的“专政”手段，而改为经济腐蚀与政治打压的双重手段了。这就叫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对策：老子不怕你骄傲翘尾巴，不给你票子、房子、车子，穷死你狗日的。俗话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所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经济是基础，思想、人格是上层建筑。所谓“早上起来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没有经济基础，便没有上层建筑。万丈高楼从地起，这个地不能是沙滩啊！这二十多年来我就是不断用个人的实践，来证实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广大老百姓应该走的道路。当然，这条路对在座的朋友和我们一些老右来说不一定对路。这叫人各有志，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和可能不可能的选择，但我和我儿孙们却矢志不移地走下去，一定要成为家财万贯的富翁，至少是个不愁穿不愁吃的中产阶级。如果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多了，社会财富就会从公有制逐步逐步演化为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是多元化社会，是民主自由的温床。所以我认为，民主自由不会产生于公有制社会的“党天下”，只能产生于私有制社会的多党制。私有制不容许“一党专政”，谁搞谁垮台。比如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就是个证明。今天共产党之所以垮不了台，除了有“枪杆子”外，就是它的政权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拥有国家的一切财富和资源。如果广大知识分子都走自己开办实业的道路，整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何愁没有民主自由？共产党想独裁也独裁不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至今仍想跻身于官僚行列，混个司长部长什么的。其特点是在位捧，失位骂，千百年来均如此。

我是右派分子，而且是个被共产党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几乎被杀掉的右派分子，1980年末才从大牢里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当时是一身囚衣，一副可怜相，年龄已是“人到中年万事休”的阶段了。好在还没有关傻关呆，大脑还能转动，笔头还能写点东西，于是重操旧业，仍伏案做编辑爬格子。为了夺回失去的青春，耽误的二十三年岁月，也为了给新建立起来的家庭能有冰箱和彩电，只能“老马不死旧性在”写小说。可是“出师未捷”好在还未“身先

死”，一下变成了“清理精神污染”的“清理对象”，险些再次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此不再敢玩笔杆写东西，不能再让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爸爸。但每月工资不足人民币七十元，三口之家要生活呀！便告别文坛当记者去，大量写吹糠见米“短、平、快”的新闻特写与报告文学，见刊物就投，是报纸就寄，每月也能赠上三四百元稿费。很快家里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还第一个装上家庭电话。但过不了多久时间，发觉自己这种为稿费而写作的行为和商人做生意一样，为的是赚几个钱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文章，更不是什么“精神食品”，仅不过为了适应某种政治的需要在编造骗人的故事，就像卖假药的江湖郎中在扯谎坝里瞎吹瞎喊：“快来，快来，买我包治百病的神药！”深觉良心有愧。于是试图去写一点生活中真正的东西，这一写又带来了麻烦。我的一篇发在当时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青年一代》上的短文《小秦之死由谁负责？》害得教书的太太代我受过。真叫“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自此作家不敢当，记者不能做，要写稿挣钱就得当“宣传员”，就得作“啦啦队”，就得说假话，就得出卖人格和良心。此时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方针已深入人心，农村城市出现了不少“万元户”，而这些人要文化没文化，要智商没智商，但敢面对生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为什么不敢去“吃螃蟹”？何苦做这个前怕狼后怕虎，担惊受怕的作家、记者？今天肯定的东西明天又是否定的东西，况且笔下所写的那些东西也不过是“商品”，如不是商品，便没有地方发表还会受到打压批判。人活着总得讲点现实，陶渊明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其实是个小地主，才敢不吃皇粮；“举家吃粥酒常赊”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先生，总还拥有点房产和祖先留下遗荫。如果要想不当工具为写作而写作，就得有经济实力，不为一日三餐吃穿发愁。何况今日文学都是“商品”，根本没什么艺术价值可言。既然是商品，就得权衡它付出与收获的对等价值。如果爬一天格子挣的是一百元，而经商挣的是一千元，我为什么不去挣这一千元呢？除非是傻瓜。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与比较，决定“下海经商”，先解决“经济基础”，有了房有了钱有了车，再静下心来写东西。那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官方不出版自己掏钱印刷，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写作不再是生存所需，而是为了说真话说实话，把自己所经历过的苦难告诉世人留给历史。再有，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看不起知识分子，不论你本事再大也不过是依附于“皮”的“毛”，所以毛泽东极其轻蔑知识分子，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我们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只得作“毛”不作“皮”么？五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上为什么有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先贤大腕，除了他们有不屈不挠的民本位的抗争精神，追求独立人格不做犬儒的风范外，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纵是穷得叮当响的诗圣老杜，在成都西外浣花溪还有草堂呀！如果是个靠工资生活的穷光蛋，他能有“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的诗句么？我国三十年代为什么群星璀璨，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文人墨客数不胜数，请问他们中哪一个是靠吃皇粮的御用文人？哪一个不是拥有经济实力的缙绅？只有共产党打倒了国民党，毛泽东赶跑了蒋介石，中国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一切文人和知识分子依靠独立生存的条件，再加上各种频繁的政治运动，使中国文人和一切知识分子才逐步失去了（应该是被剥夺了）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才蜕化为没脊梁没有尊严的御用犬儒，或是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贱民。如果要回归历史，首先从经济上回归。如何借用、利用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时机与“发展经济的硬道理”去富裕起来，成为地主、资本家、实业家、科学家、文学家，为什么有条件不去富？一定要去当工具？今天的共产党已不是穷光蛋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好些党员已是超级的富翁和资本家。我们暂不去深究财富取得的合法性，但富总比穷好。正因为富了它才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进步，允许人异地而居，经商求学自谋职业；允许出国留学深造、旅游观光、合资办企业办工厂，也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厂。没有钱能行吗？纵有一天报禁开放，也得有钱才能去玩呀！富起来，特别是文人与知识分子富起来十分重要。如果我国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富人，民主

## 自由将是个什么概念？

我从 1985 年 2 月起搏击商海，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的公关策划、广告出版等业务，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兼程，几起几落复复杂杂的争争斗斗，终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有车、有房、有储蓄，不再为生计发愁，还送女儿来美国读书深造，并力所能及地支持一些朋友和公益事业，同时也借用一些时间写回忆录，留下近百余万字的底稿。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将不靠任何人甚至儿女，都会生活得很好，想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就去旅游，想到哪儿去玩就到哪儿去玩。2004 年，我逐步脱下红舞鞋退出商海，到去年 2006 年正式金盆洗手回归书斋，开始在境外网站和刊物上发表不为挣钱只为讲真话的文章。今年反右斗争五十年又与一些老右合作发起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连署的公开信，提出“开放言禁，反思历史；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向受害人赔偿经济损失”的合理诉求；此后在 4 月 6 日又发起几十名老右们聚会“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活动。尽管我们这些合法的、理性的、温和的诉求还未得到中共当局的回应（也许永远没有回应），但总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声音，给时代燃起一个亮点，做出了刘宾雁先生二十年前没有做成的事情。做这些事不仅需要责任、胆量，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串联六十一人连署签名，我坐着我的车整整跑了十五天，几乎跑遍连署签名的每家每户。他们名气比我大年岁也比我大，好些已不能走动。当然，我做这些事共产党不但不喜欢而且反感，但我不做谁做？谁又能做？知识分子追求的富裕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思想和人格的独立，去完成一种历史的责任以体现人生价值，于我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感！今天我们时代面临的悲剧是，富起来的人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没有责任，有思想、有文化、有责任的人又不富，甚而耻谈发财经商一事，仍保持着传统文化人清高孤傲的性格，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节”就是经济。十年前的 1997 年我就来到美国寻求发展，除自身语言原因外主要是没有寻求到很好的合作者，凡已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新老移民者，大多数都是在埋头挣钱，根本不关心祖国政治甚至回避政治，而所谓流亡的民主人士只热心于作职业的革命家，不想也不准备从实业做起。这样不仅在国

内被边缘化，在国外也被边缘化，甚而对国内政治形势常常作出误判。用某人一句话说，叫“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一天一天相去甚远。所以我认为二十一世的政治，不论国内国外都应从经济入手，先有自己一片实业的天地，在不为生计发愁的前提下再去宣传扩展自己的思想理念与政治主张。如果自己还是个穷人，就只能重复“杀富济贫，以暴易暴”的老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也是为今天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路！当然，我的观点立场很难为人苟同，但我却是这样做的，并将教导儿女们也这样做下去：既不做统治者的奴才，更不加入任何巧取豪夺的墨吏队伍；既不去充当工具端“铁饭碗”，也不做“职业革命家”，永远走自我奋斗的有独立思想、独立见解、独立人格的爱憎之路！

# 一个右派对反右运动过程的观察

陆清福

作者简介：反右运动期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被送劳改。他的妻子因为不与他划清界线，也被打成右派，还没有等到改正，就因为历尽沧桑而早逝。母亲也在他被劳改后不久，在乡下孤苦含悲而逝。他的自传《左右春秋》就是他人生劫难的记录。



陆清福在发言中。

1957 年的反右运动虽然过了 50 年，但是，许多右派还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挣扎。中国大陆的天空被红色恐怖遮盖住，自由民主的时代风一点都吹不进来，要求改革的呼吁往往被中国国情来拒之门外。

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初，中共在苏共的支持下，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就说：“我们就是要独裁……”，中共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并载入教科书。

中国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张旗鼓地实行红色恐怖。右派意识不是政治社会的派别，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的三反罪犯。在中国的新华字典里的定义是，政治思想上属于保守的或反动的。在中共的眼里，知识良知就是右派，这恰恰符合民间谚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事实。通观历史，真正的革命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哪次革命不是漫长积累的结果？为

为什么要花时间积累？因为秀才坚持不搞暴力的对抗。目前以右派为主的上书潮，难道不是秀才造反吗？

前段时间，布什到中国访问，他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遗憾的是，讲话被中国官方的宣传机构删掉了。不过，科学进步是官方宣传机构不可控制的，布什的讲话在网上传开了。

右派受管制告一段落，但精神管制还在。北大、清华为首的 15 所高校的知识分子最近也在声援右派上书。时代在进步，我呼吁政府顺应民心，彻底平反右派。

我虔诚地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美国，如果没有美国，大地将血流成河。我相信民主自由不会与我们擦肩而过，人的尊严将受法律保护，关统治者的笼子必将在中国大地建成，右派也将为建成这个笼子添砖加瓦。

(文稿根据录像记录整理)

# 章伯钧在 1957 年

## (摘录)

章诒和

1942 年生於重庆，安徽桐城（今名枞阳）人。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二女。儿时曾居於香港亲戚家三年，在培正小学读书，中共建政前随家人迁到北京定居。1960 年考进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其间被下放到四川川剧团艺术室工作。1970 年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并判有期徒刑 20 年，狱中诞下一女。1979 年 5 月，她的丈夫唐良友在成都因病离世，在秋天她被判无罪释放并返回北京。其后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2001 年，退休并开始写作。2004 年出版《往事并不如烟》等作品，引起文坛轰动。2006 年 10 月，她的《伶人往事》被中共列为禁书，引起知识分子强烈不满，谴责当局干预言论自由。



章诒和

本文讲述父亲（章伯钧）在 1956、1957、1958 三年间的情况，且以民盟为主。即使写民盟的反右，也是极不完整，或许永远无法完整。

## 发端——1956年

反右发生在 1957，发端于 1956。

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了。七年间，毛泽东胸怀大志，马不停蹄地搞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战争、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路行来，所向披靡。他从不知足，自有更大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使自己一手建立的政权，强大，再强大！提前实现国家工业化，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这是毛泽东于 1955 年 10 月 29 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把“我们才吐一口气”改为“我才吐一口气”，就准确了。

## 运动——1957

2 月 27 日开始，举行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章伯钧对毛泽东的讲话非常欣赏，说这是老毛 1949 年以后最好的讲话，是政治的，也有哲学的东西。

3 月 28 日，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上作党的工作报告时，说：“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好像孩子大了，保姆还要罗索他，那就要家庭革命。民主党派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以至在组织上全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需要的，不这样就搞不起来。今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这是合乎时代发展规律的。我们党内的工作，就是要当家作主，就是要自己负起责任来搞。统战部的大衙门是不会管民间的事了。老实说，过去统战部对农工党的一些是非问题上就搞得不好。

你们还记得以前统战部总派一些小辫子来和我们这些部长来谈问题，她们懂得多少？今天不来了吧？你们没有看到那些小辫子了吧……过去，什么事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常要跑统战

部。有人说我们是共产党的特务，我曾在民盟建议以后由我、罗隆基、史良等轮流来做这种特务。”

后来，整理这份讲话记录的人告诉我：“当你父亲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顿时全场气氛紧张。”我想那时父亲心中恐怕已经没有任何警戒线了。

整风运动原来是按照毛泽东思维逻辑和他铺排的轨道进行的。他以为经过七年的一系列运动，中国人都服帖了。治国关键全在执政党自身。当“教授治校”、“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共产党有术无学”等说法传到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甚至是赞同的，因为他希望党外能帮助中共整风。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 5 月 15 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决定把整风转反右。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 5 月 4 日至 15 日的时间里变了主意，决定把整风转为反右？我想，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毛泽东从大量的民主党派公开座谈会的言论里和同样大量的民主人士内部言论、私人谈话的秘密汇报里，感到事情并非合乎他的判断。中国第三势力的心未死！知识分子并不服气！民主人士的顺从也是表面的，他们的批评、直言、抨击和嘲讽，还赢得了众多的机关干部、教师、学生的喝彩。人们不仅要求党改进作风，还要求改变制度，撤销党组、取消党委制，民主党派要政治独立，民主人士要有职有权……。这呼声撼动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和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章伯钧早期说的那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言论，尖利无比，直刺他的敏感神经，挑起他的戒备心理，更加重他的猜忌疑虑。

5 月 19 日，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学生言论的激烈态度和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民主党派，也超过了章伯钧、罗隆基。

5 月 20 日，民盟中央在北京师范大学座谈高校党委制。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接着该报于 9、10、11 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

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

6月13日，章伯钧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说自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5日，农工民主党中央委（扩大）座谈会，开始批判章伯钧错误思想和言论。

6月15日、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社务会议，检查报纸的资产阶级的方向。

6月24日晚，农工民主党中央委（扩大）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章伯钧。

6月25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指示”中的第5条内容是：“本盟中央即日成立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及中央整风办公室，领导全盟整风运动。”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章伯钧看了《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一口断定社论是老毛写的！说：“这次讲话（指统战部座谈会发言）是上了大当。”又说：“共产党真会变哩！除掉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么它都会变。”

7月3日上午，章伯钧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安徽省代表小组作检查。

7月19日，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整风扩大会议，章伯钧继续交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章黄李等右派集团阴谋活动”。

8月19日，《光明日报》登出章罗联盟的各地人员名单，列举

其“兴风作浪”的事例。该报称“章罗反共联盟”，是全国右派分子的司令部。

9月20日-10月9日，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伟大的反右斗争。

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的社长职务和储安平的主编职务。

1月26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召开第十七次中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民盟中央一级的右派共59名（后为61名）。章伯钧、罗隆基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

1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被收拾得老老实实、也吓得战战兢兢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悉数到场。沈钧儒、李济深……相继发言。一致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爱戴，对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对民主党派内部展开整风的拥护以及进行自我改造的渴望。……

毛泽东在台上，听得舒舒服服，怎地不舒服？从此，中国进入了“中共独霸全国，毛氏独霸中共”的历史阶段。

3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的策划组织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全体走上长安街，高呼口号，列队游行。

对此，父亲慨叹道：“都下跪去了。”

（章诒和女士不能出席会议，本文由吴弘达代读，根据录像整理记录）

# 我在北大的右派生涯

程庆民

作者简介：1931年5月出生，重庆市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国际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反右期间被划右派。1986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数理室研究教授；1988年任中国软件技术公司总工程师；1990年任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国际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著作论文集有：《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信息场的数学模型》、《经济系统的平衡理论》、《广义系统理论的结构性定理》、《绿色和平工程》、《开发长江与三峡工程的瓶颈问题》。出版有《天空的梦》、《丹凤朝阳》、《祭红》、《盗火连者的足迹》等。

一个生活在谎言和阴谋中的国度，无论多么辽阔广大，都只能是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中国是不是这样的国度？中国人的心中自然会有一本帐。

具体说来，195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整个笼罩在毛泽东的谎言和阴谋之中。“反右”罪恶滔天，历史已是铁证。

在那个黑暗年份的三月，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通知我到数学力学系去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由我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是号召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我任北大数力系团委书记、党总支宣传委员）。我记得那一天的传达会上气氛活跃，群众听得入神，是一片祥和景象。但谁也不会想到，一个谈天说地、引经据典、论述“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亲切”讲话会是一个包藏杀机、诱敌聚歼的天罗地网。当时全国都在传达“讲话”，阴谋的罗网遍及宇内。

就北大数学力学系而言，听这次传达的约 200 来人，据我所知这 200 来人无不落入陷阱（包括我自己）。开始是“感激”和“轻信”，以为自己已生活在“尧天舜日”之下，“日暖风和民主气，莺歌燕舞自由声”。接着是推心置腹帮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就落入陷阱，人人过关又过不了关，“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挨不完的斗争，请不完的罪”。挨批挨斗、戴帽逮捕、甚至处决。小小一个数力系的教职工群体，打出几十名右派不算，就我所知，光是自尽身亡、判刑处决的至少有十条人命，而最后“落实政策”、“复查改正”，竟全部是冤案！这些冤死的孤魂，全是学术精英，包括世界著名的解析数论大师、概率论大师、拓扑学大师、固体力学大师，科学院士（学部委员），青年劳模，模范教师，学派传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北大、在北京、在中国本来不算是大单位，但在毛泽东的罪恶策划下，牺牲竟然如此惨烈，触目惊心。但这只是毛泽东犯下罪行的极小部分。

“……见微知著，历史已经证实：毛泽东是极端卑鄙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中国人民的叛徒、世界革命的叛徒、共产主义的叛徒、出卖祖国的叛徒、内奸、工贼，他用暗害领导人的奸谋，篡夺了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大规模迫害人民，长时期祸害国家，多渠道毁灭文化，他是败坏中国的罪魁祸首、愚蠢邪恶的阴险小人、道德沦丧的无耻流氓、五毒俱全的乱伦败类，不仅不耻于人类，而且不耻于狗屎堆。其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百死难赎、万年遗臭……。”

以上的话是我在北大的右派生涯中，经过反复批斗、反复检讨，最后忍无可忍，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控告毛泽东的匿名控告信。后被人揭发，反复考虑后，承认是我所写，被定为反革命“恶攻”罪，在北京市各区县轮流批斗了一年后等待处决，后因林彪事件延缓处理，“四人帮”被揭发后，我写信向胡耀邦书记（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申诉，得到彻底平反。

# 我不再需要中共给我“改正”

林希翎

作者简介：原名程海果。1949年13岁的时候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从部队转业，进入中国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是小有名气的杂文作家。1957年“鸣放”期间在人大和北大演讲，被中共视为“放毒”，随后被划右派。毛泽东亲自对她的案件作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因为“不悔改”，1958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即将刑满时，毛泽东在1973年突然想起了林希翎，她马上被提早释放。她的案件牵连了约15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邓小平执政后，大部分右派被改正，胡耀邦给她做过三次批示，要给她平反，但都被更高层的人压了下来，她是未被改正的少数右派之一。1983年，她移居法国，并入籍法国。



林希翎

亲爱的同志们，同学们，我这样称呼你们，是因为我们在劳教时，互相称呼同学。

今天能来出席这个会议，我首先感谢上帝，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上帝的力量，我不可能到这里来。我是个垂死的重病人，医生根本不让我出门。第二要感谢劳改基金会的组织，他们非常辛苦。第三，我要感谢陪伴我来参加会议的胡小姐。她也是个右派子女，

父母及两边的兄弟姐妹都被打成右派。她对我很好，没有她陪伴，我不可能来这里。在此我要向她表示感谢。

我自从登上北大讲台（1957年5月23日）后，我就很被动。共产党打我时说，“林希翎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其实当初是一个老战友刘秉彝来找我，他说北大的大字报怎么样怎么样。我当时忙得不得了，但出于一个记者、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好奇心，我就去了。到校园，看到图书馆正门写着：“继承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精神”。那个大字报，那个气氛，我从来没看过，就像《青春之歌》里的那样。那天晚上开辩论会，物理系的学生和法律系的学生辩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我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我这个人有个本性，血管里有父亲的因素，老祖宗是山东人，路见不平，打抱不平。法律系的正统派说胡风是反革命，物理系的不懂法律，叫我帮个忙，我很犹豫，我说我只听听，不发言。但主持人没经过我同意，就说请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青年作家林希翎讲话，我一点都没准备，就被推上了讲台，结果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法下台。

我从来没有想过当英雄，更不想当烈士。我们讲话，非得当英雄当烈士吗？老实说，我从来没觉得光荣啊、耻辱啊，我只觉得悲哀。这是我的感受。

我这里手上有人大关于我右派问题的原件——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林希翎，原名程海果，于1934年出生（实际上我是1935年出生，后来说我隐瞒年龄，成为一大罪状。实际上，当年我因为年龄小不让参军，我就说我16岁。后来我都改正过来了。）。本人成份：学生。1949年10参军。1953年9月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2月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做反面教员处分。1958年8月被逮捕，判决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72年释放，安排工作。1978年摘右派分子帽子。现在为金华武义县农机厂工人。

根据中共中央55号文件的规定和1957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林希翎1957年整个反右事情的言论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复查结论如下：

1957年5月23日至6月13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人大作了6次演讲、答辩，公开散布大量反动言论。她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她说加给胡风“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荒谬的。就是尸体烂了，也要恢复名誉。……（略）（结论是：根据以上复查结果，用1957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希望本人从中真正接受教训，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

有一点，我想讲，这个反右运动，什么左派右派，这个观念本身，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跟国际无法接轨。我们被打成右派，极右分子，被判无期徒刑。在国际标准来讲，我当年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我到今天还不承认。从意识形态来说，我是个左派。我从1983年出来，在西方的标准里，我是个左派。但到今天为止，中国共产党都不给我平反。他们还说他们是左派，真是贼喊捉贼。他们有什么资格讲我是右派。邓小平改革开放，他根本不敢谈政治。毛泽东有一点是对的，说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自从我出国以来，我也想过怎样组织这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87年，刘宾雁说，我们来搞个反右30周年讨论会。因为他在国内搞纪念反右30周年的活动，结果被打成自由主义，被开除党籍，被赶出来。到40周年，我到了法国，我在法国社科院也搞了个纪念会。45周年，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中心搞了个座谈会。50周年，在法国也想组织个会议，但没有经费，所以吴弘达先生组织这个会，我知道是多么的困难，多不容易。有人问我，这是吴弘达组织的，他拿美国的钱组织的。我说，这有什么，不管谁组织这样的会议，我都去。

因为中共要把这段历史抹掉，不要说后代，当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也莫名其妙，不感兴趣。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赚钱。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幸存者，有历史使命，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要把历史留下来。

国内的朋友发起要当局赔偿道歉的签名运动，这是宪法给我们的基本权利，我通过网络也签了名。中国共产党制造这么大规模的历史冤案，把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打成右派，研究这段历史的朋友

告诉我，有 300 万人。我希望关心历史的人都来把右派的故事集中起来，给未来留点证据。

另外，对反右运动的研究，尽量要在当代恢复它的真相，这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因为反右后，接下来的文革、89 民运、镇压法轮功……，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追究一切运动中的黑手，要他们道歉、赔偿。

中国共产党发明新名词很有能耐，什么改正、平反、摘帽，等级都不一样。中共说，你们改造好了，我给你们摘帽。我反对！别人我不知道，但我这个右派从坐牢 15 年到今天，从来没有认罪过，怎么改得好？到后来要改正，我才知道上访有多苦，翻案有多苦。半个世纪来，我到北京多少趟，他们从来都说是冤案，后来 80 年胡耀邦三次批示要改正，当时舆论都说可以改正，中国新闻社还拍了一部片，我把艾青、吴祖光、王军涛都拉到里面。现在片子找不到了，毁掉了。就是说，我是不可以改正的。人民大学说右派不能改正，但反革命罪应该平反，但反革命帽我还带着，虽然刑法已经没有反革命罪了。后来，我遇到很多老同志，李锐跟我说：“还要平反干什么？不平反更好。”我觉得也是，谁给谁平反？他们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平反。

胡錦涛当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巴黎。他来到大礼堂（林希翎当时以促进中国和平統一委员的身份与胡錦涛合照），我们照相后，我就过去跟他说：“您好，我是林希翎，我还活着……”他眼睛瞪得那么大，说：“哎呀，你怎么这样说呀。你回国会活得更好。”我能活得更好吗？到现在平反还没兑现。他跟胡耀邦一样，要求平反我们，但我不抱希望。为什么呢？如果平反以前的冤假错案，他们怎么维持统治呀？他们就是要继续这样干。

我每天上网看消息，看到国内人民维权的艰难。这个政权没有合法性。到胡锦涛为止，接班人都是一代一代封册封的，它不是靠能力上去的。我们的国家没有民主制度，这个极权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之前，我们的希望是很渺茫的，除非我们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走上民主之路。

过去我经常骂国民党共产党都一样，实际上共产党不如国民

党，现在国民党经过改革，台湾实现了民主化。这一关绕不过，跟国际接轨是绝对行不通的。政改就是要开放党禁、报禁，这前提就是要平反冤假错案，台湾的经验就是这样，228事件被平反了。

平反这个事情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自己不会享受到赔偿道歉这些东西，重要的是要中共向冤假错案的受难者认罪，否则一切都是假的。我们要在国际上呼吁，要给中共施加压力。在此我特别感谢法国的总统候选人，前天我在巴黎人权广场的讲话里，就特别感谢法国左派竞选人，他的竞选纲领里写着，在中国人权没有改变前，抵制 08 奥运。虽然我当初对奥运也欢欢喜喜的，我倾注希望，对中国有信心，但中国继续不断侵犯人权，开奥运有什么意义？即使全部奖牌都被你拿到，结果是跟希特勒开奥运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让世界人民知道真相，别让他们招摇撞骗。

（本文根据录像整理）

# 我的 1957 年

邓焕武(火戈)

作者简介：1957 年，17 岁时因张贴大字报欢呼、赞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讲话，被投入监狱。此后 20 余年，都在牢狱、劳改营中度过。现任职于浙江温州市师范学校。

我的第一场政治官司，发生在那令人难忘的 1957 年。因而，人们(包括好友)一出于这期间犯事，就以为一定是个右派。其实我是跳过了右派这一“坎”，直跨反革命“高坎”的。

这于当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革命，而是新生的“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这意味着，否定中共革命政权与体制的，已不是原有的“反动势力”，而是来自同一意识形态营垒中的异军凸起力量。这种相类似的反革命，虽然也曾有过，例如托洛茨基分子。但托派组织于 1950 年代初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已是一种断代的过气势力；况且它来自营垒的左面。这和新生的现代修正主义来自右边的性质，显然不相同。即是说，这后者不是那前者的继承者。比如，后者同社会民主主义能自然相通，而前者却绝无这种可能。

随着情势与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生的反革命越来越多，它像大潮上涨一样，如今已基本上淹没了斯大林主义体制这注定腐脆不堪的“孤岛”。

当年反右运动一开始，笔者便对中共教条主义领导大失所望；尤其对毛泽东的认识与看法，从衷心热爱迅速转变为憎恨与厌恶。即醒悟到：敬爱的毛主席，原来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当时内心痛苦之极烈，堪似面对亡国之耻一般，感觉如坠深渊。

在此不久之前，中共开门整风，号召社会各界大放大鸣时，我觉得中共与毛主席真是英明、伟大。正当我为此欢欣鼓舞之际，突然掀起反右派运动。这令我感觉是那样的不可思议，看到它的举措又是那样的荒谬无耻！作为初生牛犊般天真的年轻人，我是绝对想象不到，这竟然是真真切切的政治现实！

正当我处于傍徨与极度愤怒之际，读到了铁托的《普拉演说》全文。它好像把我推上了时代的瞭望台，让我觉得如察看到了东方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与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现在看来，当时在理论认识上并未达此境界。比如，只怪罪教条主义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而未涉极权主义制度本质。即，只揭露极权体制症候而未察极权制度病根。这是铁托主义的局限性之所在，也是吉拉斯与铁托之间分歧的焦点。可惜那时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不知道吉氏其人其事。因而，铁托使我信服地感到，只要克服了斯大林主义（现代教条主义）敝端，东方各国就可健康地发展。于是确立了一个基本观点——铁托是当代的列宁，铁托才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解释者。那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等忽视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新阶级”的社会性质——虽然比之其他东方各国，显得开明与开放，但极权政治制度导致的官僚主义现象照样不能避免，所谓的“工人委员会”自治组织，越至后来越趋于名不符实！如此等等，都为铁托身后的南斯拉夫严重政治危机与国家分裂埋下了祸根！

1957年6月下旬，我书写了第一批政治标语：“社会主义民主万岁！”、“反对现代教条主义！”、“打倒官僚特权统治阶级！”、“反对勒紧裤带建设所谓的‘社会主义’！”、“反对搞行政性农业合作化！”等10幅彩色纸标语。署名皆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同年7月初，我又书写了第二批标语，内容基本相同。两批标语均于夜深人静之时，张贴于温州市区街头。

接着的下一步行动是于7月中旬，我和同学周顺相一起，出刊了油印刊物《海燕》第1期。这一期共印100份，8开纸面共两版，红绿双色套印——刊头“海燕”两个大字与社论《创刊词》三个字套印红色，其他文字和花边（包括漫画、插图等）为墨绿色。我们二人废寝忘食地刻写蜡纸、一起印刷、分头散发，终于做完了这

件事。二人都觉得既紧张又兴奋。但我们未歇一口气地又分头从侧面了解各方反应，并在同学中寻找发展对象。并着手出刊第2期《海燕》。

与此同时，反右运动趋向高潮。不管全国性报纸或地方上报纸，几乎都充满反右信息与批判内容。那种强制性的单方面(只允批评不许反批评)的简单化、群氓化“批判”，除了强词夺理，根本不具说理性的批判力度。例如，什么“工人说话了”、“群众心声”等等，实际上全是套上假面具的官调，内容千篇一律，让人越看越乏味，越看越感到气愤！《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刊载章伯钧和罗隆基的“章罗联盟”如何如何，批判龙云、黄绍雄、章乃器、费孝通、冯雪峰、丁玲、葛佩琦、储安平等一大批大右派“劣行”如何如何。但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大学生右派谭天荣、林希翎以及《中国青年报》编委刘宾雁等人的有关揭批内容——谭天荣在北京大学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会”；林希翎被“揭”为“有棱角的青年”、“带刺的玫瑰花”(明明的优点被抹黑)；刘宾雁在《中国青年报》编委会上坚持全文刊登《普拉演说》，等等。这类被扭曲的信息，却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并且把他们视为当然的同志。因此我曾致信林希翎(当时从某处获知她的通讯处)，期望同她取得联系，可是挂号信寄出后，却如同石沉大海。

《浙江日报》揭批省长沙文汉(打成党内右派)、工商界巨子宋云彬……；《温州日报》揭批刘景辰(曹锟贿选时的南下议员之一，为人正直)、叶芳(温州“和平解放时的起义将领”)……。表面上看，运动好像轰轰烈烈，实际上生硬乏味，老百姓并不理解，也不热情支持。例如刘景辰老人上街行走，后面跟着一群十来岁的“红领巾”。一路上跟着有组织有节拍地齐声高喊：“右-派-分-子-刘-景-辰-。右-派-分-子-刘-景-辰-。右-派……”。对此，沿途不少成年人摇头叹息，但又不敢阻止。据知情的目击者说，再后边就跟着共青团与妇联的干部。可怜年近八旬的刘老先生(时为市政协委员)，哪能经受得住这般精神摧残与政治打击？很快就病倒了，之后一直卧床不起！

我们二人于8月间准备继续出刊《海燕》(第2期)之际，已经

感到某些压力——绘画会负责人陈垂平老师私底下先后问我们两人，“是否作了什么不当之事？”对此，我们矢口否认，于是陈老师当然也相信了。接着，母亲也异常发愁地如此盘问过我。

但是，我们仍坚持要把第2期《海燕》抓紧刻印出来。于是在8月26日晚间，我们赶了一个通宵，终于印刷了50多份《海燕》（第2期）——同样是8开纸面却有4版。主要内容有：社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与《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等。《章程》前言里明确宣告：“一旦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本联盟组织即行自动解散。”

与这同时，由我发展的同学周冀宁，答应和我一起干。因而，当日我把数份第2期《海燕》交给周冀宁收藏与散发。我们又投邮了10份《海燕》（第2期）。但没想到，当天（27日）晚上，我与周顺相就被拘捕了。三天后转为正式逮捕。在遭拘捕的当晚，我们被抄了家。因此第2期《海燕》，基本上未能流入社会。

当年我们都是20来的小青年，完全是初生牛犊一个——既无行动经验，又缺乏行动知识，政治上也是白纸一张。比如，那么一点大的中小城市，从事漫画创作的作者屈指可数，各人的绘画风格都过目可别。所以只要一看画漫，就可断定我是《海燕》一分子。其他行动方面也是如此，但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公安局侦破人员不相信本案仅为两个毛头小子所为，以为必有年长的主谋者。故而，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拖了一些日子才破案。

当年面对老练的审讯人员，我们二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在隔离侦审状况下，毫无经验的两人，都作了牛虻式的出卖（被诱骗而招供）。接着是，为了配合反右运动，公安局迅速结案，由检察院提起公诉，进入司法审判阶段。这年的11月中旬，温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在法庭辩论中，我据理争辩，反驳得该检察员无言以对，自行退庭而缺席。于是，迫使审判长宣告休庭与择日再开庭。

不想没过几天，竟然就押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召开宣判大会了，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周顺相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同时被宣判的还有10多个人，都是所谓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年龄

也都是 20 岁左右。其中一个 18 岁中学生，名字叫吴杰（相貌如电影《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他是一人作案——自制矿石收音机“偷听敌台”。吴杰就为此被判处 10 年徒刑！由此，可见“文革”前 17 年之一斑。

11 月底，我和吴杰等 10 多人，被押解到蒋堂农场杨堂下分场。在此鬼地方蹲了不到 3 个月，我被折磨得差点死去——粮食定量极低，又搞什么“以粗代细”与“以菜代粮”，实际上每月吃不到 25 斤粮食。可是整个冬天里，大多都在雪地里挑泥土修水库，体力消耗严重过损，即在极度饥饿状况下，强制地从事繁重劳活，这怎能持久？于是，水肿症候随之而至！先是脚指头麻痹，脚趾甲变黑，接着双脚发肿，双腿麻木沉重，行走日趋艰难，快步则跌倒；同时，脸部浮肿得双目似一线……

所幸于 1958 年 2 月（春节前夕），省公安厅劳改局下达了调动令，我和吴杰等部分犯人，被调到了浙江省第一监狱（地点在杭州余杭县的临平山南坡与紧靠沪杭铁路的临平镇西北边）。这里，虽说粮食也是定量的，但定额较高，且搭配得当，做到以粗粮换细粮，开饭时不分食，所以能够吃上饱饭。与此同时，劳动亦相对减轻一些，医疗条件亦比农场的好许多。那时，这对于我们犯人来说，等于来到“天堂”了。因此，我也是等于拾回一条命！但是，已缠上了伴我终生的疾病——风湿症关节炎！

# 不是阳谋，是叶公好龙

张轶东

作者简介：1931 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2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59 年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文革期间曾因言获罪入狱九年。1981—1991 年间为黑龙江省绥化师专（现绥化学院）教师、讲师和副教授。1991 年退休。有中、英、俄三种文字作译多种。2007 年出版的新作有《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和回忆录《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



张轶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感到有幸能参加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1957 年发生反右派斗争时，我是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不在国内，因此未能亲睹反右派的场合。但反右派斗争所引起中共的政策转向，也给我带来二十年的厄运，促使我思考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今年初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所出版的拙著《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的第二章“1957 年 不是阳谋 是叶公好龙”（第 48 页标题又改为“难忍批评 翻脸反右”），我阐明了我对于这个运动的看法：即无论从事实证据上，或者是从毛泽东一贯的出尔反尔上看，毛泽东根本没有过任何“阳谋”或“引蛇出洞”

的计划。这的确是由于算盘打错，形势突变而实施的紧急镇压。我的看法可能和许多人的看法不同。由于在该书该章里我已详述了自己的看法，我在此不再重复该书该章内容。我的发言只想作出三点进一步的阐明：

第一，我以为，不可低估赫鲁晓夫在 1956 年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秘密报告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其实，远从 1930 年的富田事变起到 1955 年的肃反为止，毛泽东一直是依靠高压和血腥夺得和维持他在共产党内、红区和国内的统治的。但是在那一时期，他的这种统治和统治方法，是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体制为依靠的，即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前苏联这个国家）中，有斯大林这么一个上帝。而在当时的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共产党中，都有一个小斯大林。

然而平地一声雷，1956 年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彻底推翻了斯大林这一尊神。这不只是否定了斯大林个人，而是从道义上、理论上和制度上都否定了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国家内有一个至高无上，集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领袖。于是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小斯大林们纷纷受到冲击。波兰的贝鲁特急病交加，没有回到华沙就死了。匈牙利的拉科西在该国人民十月起义中被推翻。我本人当时因为身在前苏联，对赫鲁晓夫报告所引起的震撼深有体会，这是当时在国内和西方的中国人所感觉不到的。

因此我以为：虽然毛泽东始终是一个暴君和血腥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方法在前苏共 20 大和中共八大前后是不一样的，即前苏共 20 大对于毛泽东统治方法的影响是转折性的，划时代的。中共始终强加于赫鲁晓夫的罪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连“半盘”都不够）。这是试图把斯大林和毛泽东作为个人区别开来。其实前苏共 20 大对于毛泽东的致命打击，还是从理论上否定了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和一个共产国家内，必需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领袖。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认为不但在整风中，而且从 1956 年前苏共 20 大闭幕后不

久，直到整风转向的 1957 年 6 月 8 日之间，在中国的确有过一个民主潮的兴起。而且这个民主潮的鼓动者就是毛泽东本人。据一些听过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人说，那篇讲话和 6 月 19 日，经过 14 次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要知道，在前苏共 20 大之后，毛泽东如果要继续在中国作为一个精神领袖的话，就不能继续照搬斯大林的那套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是必需提出新的理论了。他当时想的是作一个“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的自由化奠基人。应该说，1957 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一度昙花一现地存在过这种可能，尤其是当时存在着与台湾秘密谈判的这个因素。

无可置疑，毛泽东是非常讨厌知识分子的。但是毛泽东又是造反起家，依靠枪杆子取得政权的。他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知识分子只能动摇他的地位，但决不可能推翻他。真正有可能推翻他的，还是那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掌握党政军日常大权的中共中央第一线，何况去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还明显规定了对于他的权力的一些限制呢？因此毛泽东的确希望在整风中一方面压抑一下中共，另一方面扶植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尤其如果台湾问题通过这此谈判能解决的话）成为与中共相抗衡的第二政治力量，他就可以高居于这两者之上成为最高仲裁者，这就是和斯大林那种独裁者不同的“开明专制”君主了。应该说，这种“坐高观虎斗”的策略，往往是许多专制君王维持自己最高统治地位的策略。林彪死后的五年里，毛泽东也是用这种方法维持自己的最高统治者地位的。

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但他也会利用知识分子。他连蒙哥马利和布拉柴维尔刚果总理努马扎莱都会利用，何况那些傻乎乎的中国知识分子呢？其实对于“各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的这种建议，毛泽东不见得反感，可能还正中下怀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会是国务院易手，吃亏的只是中共。他毛泽东肯定还是中国的精神领袖，还是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民主党派中没有人能和毛泽东抢这个位置，而毛泽东则可以少受中共的约束了。

这种可能昙花一现而迅速消失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和台湾之间的秘密谈判失败。即使是在台湾发生美军军官枪杀翻译刘自然事件后，蒋介石先生也宣称自己“决不作李后主”。这样两大对称的政治势力对抗的局面不能形成，毛泽东也不能把中国变成一个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大南斯拉夫”。毛泽东只好回到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联盟（但这是暂时的，九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兴风作浪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对于他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要平定局面，就必需收拾他们了。要知道，在文革初期的 1966 和 1967 年，毛泽东对于关锋、王力和戚本禹等人，不也是这么作的吗？

我的这种分析，的确只是个人推理，而没有原始材料作证。但是，“阳谋”和“引蛇出洞”，不也只是毛泽东事后说的，而没有事前的原始材作证吗？毛泽东肚皮里的东西是不可能变成文字资料的啊！

第二，我想简述一下我当时在前苏联看到和听到对于中国反右派斗争及此后对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映。

正当六月份在中国发生反右派斗争时，六月末，在前苏联发生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集团企图用宫廷政变推翻赫鲁晓夫而未遂的事件。这就是说，前苏联在自由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而毛泽东在自由化尝试失败之后则是从“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一转为“比斯大林还斯大林”。中苏两国更是南辕北辙了。苏联官方表面“同意”中国的反右派斗争，但明显不同意反右后中共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苏联人其实是连 1955 年的反胡风也不同意。他们以为胡风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们以为中国对于知识分子搞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把苍蝇当作大象”和“大炮打麻雀”等。斯大林在大规模镇压中虽然逮捕和杀害了一些科学家，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知识分子。列宁有过“科学家是通过自己的专业走向共产主义的”（虽然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引用列宁的这句话怀疑思想改造而被打成右派的。

1958 年 3 月，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真理报》报道他在匈牙

利科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他说在十月革命后初期，许多旧俄知识分子对革命持对抗态度。他举例说有一位院士在党召开的会议上听得不耐烦，站起身来带上帽子走了。当时有的共产党官员要求收拾他。但党组织没有这么做，而是耐心等待他的转变。最后这位院士没有经过预备期就入党了！我当时很注意这篇报道是否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结果毫无音信。我在图书馆走廊遇见两位苏联同学时谈及此事。一位叫西马诺夫的苏联同学说：“哎呀！我的哥哥是我校（即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文专业毕业的。不久前他作为翻译到中国去了几个月。他回来后说在中国正实行一种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压迫。他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一天也待不下去！”这时另一位叫叶果洛夫的同学（他还是苏共的宣传员）对我说：“你们中国这样对待知识分子等于自杀！”他们都悄悄地对我说：“你还是讨一个苏联老婆留在我们这里吧！”

1960 年代中苏论战开始后，中国极力抨击苏联撤回专家一事。苏方则反驳说：“你们批评我们撤回专家，可是你们自己放在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专家们你们好好地利用了吗？他们不是回国后先挨洗脑，最大也不过当一个车间主任吗？”的确，从 1959 年夏天起，所有在苏联学习后回国的学生都要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集训两个月，挨洗脑，受批判，然后才分配工作。1960 年初，我虽然已回国工作一年，也被召回到外国语学院参加集训，受了两个月的“重点批判”，把我这个“最危险的人”当作“小鸡”杀给“猴子们”看。（关于这一经历的详情，在今年初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所出的拙著《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的第五章有详述）。1960 年代初，中共中央有明确文件，指示不可重用留苏学生。中共对于自己大力培育的知识分子都视若眼中钉，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如何呢？毛泽东 1966 年的“五七指示”干脆是想要消灭掉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打倒专家，学者权威。于是一切文化都被“大革命”掉了！

第三，我想补充一点我所知道的右派们的悲剧经历。

会议通知说：“在这次反文明的野蛮迫害中，中国约有 100 万知识分子中箭落马，被打入地狱。”我以为，这只是狭义的统计数

字，即仅指被打入右派者本人。实际上，直接受害者还有两个方面：

一是右派们的家属，尤其下一代。1980 年代初，我被从监狱释放并调入黑龙江省绥化师专工作时，适逢一些“改正右派”也调到该校工作。从与他们接触中我感到他们的遭遇比我还惨。学校的教务处长当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黑龙江农村，冬天全家人一铺炕，只有一床棉被。一位物理系教师被打成右派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娶了一个跛脚妻子，改正后妻子无法安排工作，他天天嚷嚷要在校园中找一棵歪脖子树上吊。另一位物理系教师的儿子在农村受刺激得了精神病上不了大学。还有一位俄语翻译全家下放农村，儿子发高烧，当地卫生院因为他是右派，对他的儿子不予治疗。结果成了哑吧！这样说来，反右的直接受害者应该决不是 100 万人，而是 100 万 X 2 或 3。

二是反右派斗争对当时教育的直接破坏。我的妻子 1957—1958 学年间正好是黑龙江省某县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她说当时她们班除了政治课老师外，其它各学科的老师都被打成右派了！有时正在上课公安局就来人把教师从讲堂上带走了，根本无法上课。我在深圳认识的一名俄语教授也对我说，他那时也是一名中学生，他们学校的所有教研组长都被打成右派，也根本无法上课。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摧毁，并非从文革开始。

我所提供的这些情况，在整个反右历史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看见在座诸位，多数是当年的受害者，但却都没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只想自己安度晚年，而是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愿我们共勉。

此外，由于明年是大跃进 50 周年，我建议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筹办“大跃进 5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尤其注意发动知情者和有条件的人士，对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再作一次调查和统计。 谢谢！

# 对张铁东发言的评论

姚监复

作者简介：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反右时他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因右派言论于1966年被指为“漏网右派”，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父母在文革中被害双亡。改革开放后复出，积极投身改革，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反思共产主义道路，寻求中国民主化之路。



姚监复在反右会议上发言。

主席，各位受尊敬的、久闻大名的、历史先知的受难者右派朋友，和其他的朋友，非常荣幸在这作评述。

第一个问题，从张先生从苏联了解的反右情况来看，很有新意。在那时打成右派的，大概有三种人：一种是张先生这样了解苏联情况的，还有东北的了解苏联红军罪行的一些人。第二种是从美国回来的。第三种是，民主党派人士。

第二个问题，就张先生文章里对毛泽东的三个观点，我同意一个，不赞成一个，还有一个，一半赞成，一半不赞成。第一个观点，打错算盘，难忍批评，翻脸反右，紧急镇压。我同意，毛泽东是这样。第二叶公好龙，我不同意。因为叶公从来不好龙，叶公是恨龙，不认为知识分子是龙，是蛇，是毒蛇，是什么不齿于人类的

狗屎堆。第三，是不是阳谋，是不是阴谋？我觉得即既是阳谋，又是阴谋。5月14日晚上9点，中央政治局开会开到凌晨1点。15号就出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右派最猖狂，让他们再猖狂一个时期。反动言论登在报上，为了让人民见识毒草，以便锄它……14号晚上开完会，15号出的文件。请问15号订了抓10%，为什么还下令大家去劝知识分子说话呢？这不是阴谋吗？至于是不是阳谋，我觉得1926年，有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有的地方打了XXX，上面有眉批。XXX是《毛泽东选集》里删掉了，上面的眉批是《毛泽东选集》改的。这里我念一段：“一部分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中产阶级右翼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因此，从1926年开始，毛泽东实际上把共产党变成一个现代的、半现代的清红帮，以农民为主体的一个革命造反派。到胜利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对知识分子憎恨。李锐告诉我，30年代的左派，内部杀了10万，40年代的整风，有资产阶级思想就被整肃。50年代，南方局和北方局的地下党，他们大部分是记者和文化人，大部分被整肃。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知识经济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这就是阳谋。

第三，应该肯定一下还有一些有人性的人。比如，科学院的党委书记张劲夫和秘书长杜润生，他们找毛泽东谈，建议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不参加群众性的反右，单独给我们谈。因此，中国科学院从外国回来的，没有一个是右派。

第四，我觉得要给反右运动正名。反右即是大灾难，大摧毁，大破坏，我们需要平反、道歉、赔偿。我建议改成57民主运动。我们这个运动可能比五四运动更伟大。我同意余英时先生谈的，右派分子是个光荣，我不摘帽子，它为中国的民主、人权、自由的呼吁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讲的内容，我们现在看看，中国过了50年，没有达到右派所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政治改革的内容，

没达到那个高度。所以，当时右派的言论，是符合国际民意，是真理，是规律。应该肯定这种精神。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我写过一篇稿子“苏共亡党 苏联亡国为什么没有千万人头落地”，讲苏共为什么亡党，讲了很多理由。最近我看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他在 20 大要揭露斯大林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现在我们承认错误，是请求人民的宽恕。如果到 21 大就晚了。如果人民提出来控诉，我们是接受审判。”所以他先道歉了，他从某种程度得到人民的谅解了。因此他的头没有掉，而且苏共的其他领导人都没掉头。最后，我建议中国共产党学习赫鲁晓夫的经验，从现在开始对反右一直到八九自己的错误，提早发出罪己诏。

（本文根据录像整理。）

# 评张轶东、张先痴、任众的讲话

邢小群

作者介绍：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深入研究，并发表大量相关著作。



邢小群

我想对张先生的讲话作点补充。

第一，张先生提到阳谋、阴谋的问题。我觉得，具体什么时间是阳谋，什么时间是阴谋，还是不好划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应该强调的——中共反右的集体意志、精神思想的统一，是后面的历次运动所没有的。反右运动的一个特点是，中央级的人是高度一致的。有关方面的人看过有关的档案材料，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反右。”“我们就是要下定决心。”他们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一块决定搞这场运动，大家统一思想。在建国初期，好像是朱德说过一句话：“打败了蒋介石，下一步我们就要收拾民主党派。”从这个逻辑上讲，中共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无论张先生，还是任众先生，他们都是右派当事人，他们的个案非常重要。他们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们以后的遭遇，每个个案连起来，才能构成历史。张先生提到，其中有家庭出身被注意，平常的言论被注意。这使我想起我曾访问过的一个友派作家梅娘，她在四十年代是非常著名的女作家，有南玲（张爱玲）北娘

（梅娘）的说法。她说在她单位农业电影制片厂，当时并没有什么言论，只不过她的精神思想，看不惯共产党进城后的那些作风，就被打成右派了。张先痴先生还说，他被枪毙过一次，逃跑过一次。我觉得，如果说说为什么被枪毙，逃跑之后的遭遇，这个作为历史、学术研究，是非常生动的案例和事例。

另外，任众先生的书《活过爱过奋斗过》写得非常生动感人。任众先生的经历，我也有些了解。他有些天主教的家庭背景，加上对胡风有些同情，到了反右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右派。任众先生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活泼的，能歌善舞。考电影学院都被录取了，但因为后来被定为右派，又被电影学院拒绝了。后来的遭遇是非常坎坷的，家破人亡，妻子离婚，现在还是独身一人。他的精神，他的正直、热情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我简单的提这个，我觉得作为右派当事人，你们的个案，更加生动，更加具体，更加有力量。

(文稿根据录像记录整理)

# 反右与劳改

吴弘达

我们今天谈的劳改，包括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种手段，它包括派出所、劳动教养、军事监狱、看守所、精神病院。1993年，我提出希望把 laogai 这个词变为国际通用的词。花了 11 年时间，2004 年，牛津词典首先记录了 laogai，所以 laogai 现在是个英文单词。现在在德文词典、法文词典、意大利词典，都能查到 laogai 这个词。这相当于 gulag（古拉格）的词意。Gulag 是用 5 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拼出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gulag 就是苏联的劳动营。现在也有中国的 gulag，中国的劳动营就是 laogai。

中共的行动与法律总是不合拍的。文件总是要落后于行动。《劳动改造法》1954 年才颁发，但 49 年以前就开始关犯人了，关了 5 年了，才有《劳动改造法》。1955 年开始肃反，拘捕不少人，1956 年，肃反结束了，大概有 20 万肃反人员被关，他们早已被送劳动教养，但 1957 年中共才颁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比劳教实施晚了一年多。

劳动教养法的出现，是因为反右开始后，有更大量的人被送劳动教养，于是，1957 年 10 月，劳动教养的法规就应运而生了。之后，第二批送去劳动教养的，是反革命右派。所以，劳动教养真正对待的人，第一批人，是被肃反出来的人，第二批是右派。到了 59 年、60 年，这时有大批人因为大饥荒，从农村跑出来，流落社会各地。那时，劳动教养就专门对付那些人，非常有效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施行劳教了。邓小平上台后，马上恢复劳动教养，1979 年颁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4 年又推出《劳动

教养试行办法》，对劳教适用范围订出了很多具体的条例，比如旷工、小偷小摸，等等。但当中有一条，是对付年轻的反革命分子的。目前，中国大概有 30 万人被劳动教养。

大陆现在停止使用“劳改”两个字，但大家都仍在使用“劳改”来代替以前的“蹲监房”、“坐牢”等说法。监狱仍然还是劳改。1993 年当我公开希望 laogai 这个词成为国际上一个通用的词后，中共在 1994 年 12 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一个决议，取消“劳改”两个字，劳改支队全部改成监狱。但是，在通过决议的时候，也作了一个说明，对犯人的劳动改造的基本功能不变。

上个月德国议会通过谴责中国劳改的决议案。德国的议会在通过这个决议案前，按照他们的惯例，先把有关的决议案通知有关方面，通知外交部，通知德国的人权部门，也通知中国政府。中国大使两次跑去抗议，说中国没有劳改了，已经用监狱这个词了。德国的议会要求去看看中国监狱的情形，中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中国现在有 40 所所谓对外开放的监狱，只是个橱窗。其他的不开放。我在 95 年回去劳改队看时，被认为“探索劳改队机密”。

到现在为止，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劳改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每年杀多少人。近年来，终于有个数，这个数字就是从中共一个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讲的，差不多 8000-10000 人。

1949 年来，中国处决犯人没有固定的刑场，明天要杀人了，就去临时选择一个地方。第二天，要杀 20 人、40 人，整个车队就跟着去了。杀完，清掉，算了。从 2004 年开始，最高法院要求用固定的刑场，所以现在基本在固定的刑场处决犯人。我收集了很多照片。刚才你们看到是枪毙一个女的。我们有大概几百张，有的枪毙 6 个，有 8 个，有把嘴勒住的……。中国现在规定要关门执行死刑，不准搞公开游行。其实在 1984 年时，中国就有文件不准游街示众。因为美国的《新闻周刊》报道了中国处决死囚的游街过程，还拍了照片，中共自己看了也觉得不妥。于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安全部发文，要求以后不准再搞游街示众。但 1989 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出现后，当局又大肆杀人，又开始游街，杀鸡儆猴。把人绑起来，嘴堵起来，游街，枪毙，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

的，中国的这种做法跟恐怖活动没两样，中国大部分的体育场都开过宣判会，中学生都被安排去看。运动员就在这个曾经杀过人的运动场锻炼。这种事情之所以在中国发生，跟中国人的素质有关系。我在上次讲 1957 年的事情时说，当年尽管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发生了波兰事件，但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中国还是封建王朝，还会承认毛泽东是个帝王。我们是王朝地下的臣民。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

2004 年、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个法案，开始建刑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四川的刑场（照片略，编注。），这是沙袋，这个犯人就在沙袋前面被枪毙。那边也没有人看。沙袋旁边是一排房，这就是刑室。有的人现在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方式——打毒针。这就是他们的房间（照片略，编注。）。这张是死刑车（照片略，编注。），是给死囚犯打针行刑。这个比较方便，可以先把器官解决掉。

这张照片，是 2005 年郑州训练所谓的法警，执行任务。

全世界的死刑越来越少，而中国在全世界杀人的人数，占全球死刑的 90% 以上。右边的一张，是一辆华西医科大学的车（照片略，编注。），它有两辆，是专门摘取死囚器官的。这是一例，这个病人获得心脏的交换，心脏来自一个枪毙的犯人。这个医生是牡丹江医院的（照片略，编注。），是全国第一例心脏手术的施行者，我们有非常详细的报告，犯人是经过多次选择的，犯人最后由 20 多名法院、检察院的武警押到医院里，就在医院后面的车间里，在地上打死后，心脏摘出来后，拿到前面的手术室。南方医院非常有名，全国第一大，每年差不多有一千的器官移植手术。我看到一位同事，他说他姐姐换过两次心脏，但都没有问过来源，大家都心照不宣。

最近十年二十年因为经济上的发展，很多的监狱和劳改队都进



郑州训练法警执行行刑任务。

行了改建。这是河北省沙洋市的劳教所，是新建的，外面看起来很好，但里面的条件怎么，大家可以想象。这几个年轻人，是在一个模范的劳改队里拍的。沙洋农场这里有一块地方，57年曾关了4000多个右派，但现在放弃掉了。老百姓不愿搬进去，认为那冤魂太多了。这是我们曾经流血流泪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忘记它。

一个专制的国家，一定想办法消灭反对它的人。当然可以枪毙他们，但不能枪毙全部的人，这就是劳改。苏联有古拉格，德国有集中营，中国有劳改，不管它改成什么名字，改成西方一样的名字，但它的性质是不会变了。

（本文根据录像整理。作者简介请看前面的介绍。）



河北省沙洋市的劳教所。

# 被杀的孩子

——纪念反右五十周年

张鹤慈

作者简介：作者的祖父张东荪和父亲张宗炳均为著名学者，他从小受他们的思想影响，中学时就常与一批有独立思想的同学议论时政。后来考进北京师范学院。1963年，张鹤慈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地下文学团体X社。不到三个月，成员相继被捕。罪名是：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图偷越国境。4，诬蔑党的领导，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又由于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所以震动了高层。张鹤慈被判劳教2年，后因文革爆发，又延期教养，留场就业，他实际上被“劳动教养”了15年。张家多人在文革中遭到整肃。张鹤慈现已移居澳大利亚。他是文坛活跃的时政评论员。



张鹤慈在反右会议发言

## 一 为什么会有反右？

反右的起因是整风，毛泽东为什么发起了整风运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说法相反，根据却是一样的：都是根据毛泽东做的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传达、和后来公开发表后的作了180度转弯的报告。一个以宣布停止阶级斗争的报告，变成了一个鼓吹强化阶级斗争的报告。

为什么毛泽东在短短的几天作出 180 度的转弯？一种解释是毛泽东开始时的整风，是真心实意的。后来在那些领导内行的这些外行的工农干部的压力下，不得不转向。甚至在文革中，有些右派也自欺欺人的相信，毛泽东的整风和文革一样，是为了整肃官僚，而这是由于刘少奇等人的抗衡，破坏，使整风才变成了反右。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右派敖乃讼，才华和人品都很出众，关了十几年的牢的他，也会真诚的相信这样的天方夜谈。半年后，清醒过来的敖乃讼，自我了断，告别了人间。

另一种解释是，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整知识分子的阴谋。

第一种解释我当然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是领导内行的外行。工农干部当时所受到的压力，毛泽东一点也不比他们少。这些工农干部是毛泽东统治的基础，他们的基本利益怎么可能有冲突？

后一个解释我也不同意，虽然我对毛泽东是全面的否定，但我也不认为，毛泽东从开始考虑整风时，已经是作出了彻底整肃知识分子的决定。

49 年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铁血后的万马齐喑，使毛泽东误解了中国的形势，认为自己已经是万民爱戴的圣君贤王。他想学习唐太宗的虚心纳谏，但他的本质却是朱元璋的痞子流氓。

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作出了开放言论，欢迎批评的姿态后，他没有听到希望听到的万民称颂，被扯下了嘴上封条的人们，是对小和尚，大和尚一起的批评。

对敲打一下小和尚他不会很在意，甚至是有一些幸灾乐祸，他也希望给他的追随者一些压力，在他看来，这也只会拉大他的属下和他的距离，只会进一步的增加他的皇权。批评他的功臣显贵虽然可以被允许，条件是必须在高呼他的万寿无疆之下。后来，他又等了十年，这个场面到底让他等到了。

对他的动机，我是倾向于：毛泽东的整风，开始是一次别出心裁的尝试，这里的为国，为民，和为自己是混合在一起的。朕既是国家，国富民强和君王圣明对毛泽东在当时可以是同义词，当有人指出大和尚头上的虱子时，当这个社稷，人民和朕的混合变成不可能时，何去何从的顺序当然是毛泽东的这个朕字了。

大跃进也是同样的情况，开始的出发点也是勉强的说是为国为民，但当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需要有人负责任时，当彭德怀的挑战威胁到毛泽东的这个朕字时，国家，人民就统统的滚到一边。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十分勉强，几乎是没有办法再说得过去了，更何况对天怒人怨，只有朕而没有国家，百姓的文革。

从毛泽东给江青的谈到老虎和猴子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的矛盾心理。整风开始时的毛泽东是老虎心态，他那时候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不是说他开始有了对阶级敌人的怜悯心，而是他认为，经济敌人已经全部被打翻在地，已经没有能力和胆量反抗了。而整风并没有按他的期望进行。整风时意见中的外行，小知识分子等提法，触动了毛泽东内心深处自卑的猴子心态。

本来在虚心纳谏的假面具下，是想听阿谀奉承的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恼羞成怒了，没有多久毛泽东就顺水推舟的把整风变成了阳谋。

整风开始没有多久，毛泽东的杀心已起，相当早的就布置了诱敌深入，连哄带骗的撒开罗网，狠狠的教训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读书人。

## 二 到底有多少右派？

正式作为右派被处理的，中国官方的数字是 55 万，有学者提出是 150 万到 200 万。基于我对这个学者的信任，也基于我对官方数字的不信任，我倾向于后一个数字。

在中共为右派改正后，剩下 96 个右派。就是说，57 年中共认为有 55 万或 200 万右派。79 年中共认为只有 96 个真正可以算作是右派。

那么，到底哪一个数字准确？到底在 57 年，中国有多少右派？

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右派。

当年的定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

真正反党的人，真正对共产党有比较深刻认识的人，是不说话的。如 57 年我在清华二校门看到的。控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滥杀无辜的那张小字报，就是匿名的。

右派的数字，肯定大于 96 个，也肯定小于 55 万。

右派中，有不少是根本不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些人，主要在党内，他们之所以成为右派，是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当他们发现自己碗中的肉，发出狗的腥臭时，他们表达了对挂在门口的羊头的疑惑或愤怒。

反对社会主义也要加以细分。从政治上明确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可以算作政治右派，思想倾向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可以算作思想右派

政治右派除了储安平，罗隆基和一些激进的年青人，如 56 年几个到我祖父家，居然想让我祖父出山的北大学生。明确的想引入西方民主的，人数不会太多。

储安平在 56 年鸣放高潮时，到我家，当时他可真是意气风发，谈起鸣放的动态如数家珍，连北大的大字报每天的数目都一清二楚，当时的储安平，不能说对共产党是想取而代之，但可以说是倾向于分庭抗礼。

这些人可以算是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人。

而思想上的右派，从对 49 年后现实的极度不满，到对一些具体事，具体人的批评，牢骚。人数相当多，这些人占据了右派的绝大多数。这些人，内心深处真正明确反对共产党的不多，但对无处不在的党领导的反感，是基本相同的。

剩下的一些，是在中共要求各单位打右派的百分比的命令下，糊里糊涂的倒霉蛋。

57 年的反右，是给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最后的致命的一击，在经过土改，镇反，肃反，胡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下，元气大伤的士和士气，又被引蛇出洞的阴谋彻底摧毁。

反右，是基本彻底地断绝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联系，受

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储安平等，除了出卖灵魂的人，无一例外的都被打翻在地，当时的大学生，中学教育也是在 49 年前，也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这也就是在中国历次的民主运动中，右派是所有的反革命中，素质是最高的道理。

中国的革命永不间断的需要鲜血的祭祀，历次运动中，祭坛上献出的，总是最优秀的年轻人的生命和青春。

这是一次比秦始皇狠毒万倍的焚书坑儒，数量是万倍，狠毒也同样是万倍。秦始皇只是一次性的埋葬了儒生的尸体，毛泽东是长时期的活埋了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灵魂。

### 三 反右在现代史上的定位

都熟悉皇帝的新衣的故事，现在我换一下结尾：

当一个小孩子大声叫到：“皇帝什么也没有穿！”侍卫一刀就劈了这个孩子。赞美皇帝新衣的声音，从已经是铺天盖地，变成了震耳欲聋，其中又多夹杂了清楚和愤怒的，如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对这个已经被劈死的孩子的谴责，侍卫的一刀，就是反右。被杀的孩子，就是右派。

49 年开始，是中共主动寻找敌人的时期，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就是镇压，整肃敌人，和制造敌人的运动。而反右不是中共主动的出击，反右是在 49 年后，民间怨气压抑了太久的一次爆发。

反右是中共建国后，对社会上的敌对势力的最后一次征战。从反革命，地主，富农，资本家，到知识分子，几乎是一个不拉的被整肃过了。以后的征战不是慢慢平息，而是越演越烈。不同的只是整肃的对象转移到了党内。

战场转移到党内，是毛泽东弄死了几千万人后，心惊胆战，疑神疑鬼而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的党内厮杀。毛泽东怕的不是那些饿死的冤魂，他怕他的皇冠掉下来。大跃进搞得天怒人怨，他的心里一清二楚：他的帝王的合法性受到威胁。

之所以造成三面红旗的悲剧，重要的因素就是反右。杀了说真话的孩子，就没有人再说了。

领会了毛泽东的言者无罪，50 万甚至是几百万的右派，成为悬挂城门示众的人头。反右后的神州大地，人们已经不是只不敢说真话了，人们已经是不敢不说假话了。

粮食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几十万斤，就敢在《人民日报》上登，孩子们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就敢放在报纸上。要知道，几十万斤的粮食，放在一亩地，是可以装成麻袋平铺在地上的。

光着屁股的皇帝，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来走去。正如毛泽东年轻时的诗：“那个虫儿敢吱声？”

在 57 年的反右后，中国居然是“那个虫儿敢不吱声？”中国人已经是到了，我让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想听什么，你们就得说什么了。

反右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逆向淘汰，弃金留沙。教育，新闻，出版这些有关国家元气的部门，是反右的重灾区。学校，报社，文联等，剩下的最好的人，也只是明哲保身，就是这样的人也是寥寥可数。基本上都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和为虎作伥的恶棍。民主党派剩下的是共产党派进去的打手，多数本身就是共产党兼民主党的党痞。

反右毁灭了民间的正气，反右倾毁灭了党内的正气。文革的到来，就是自然而然，通行无阻了。

还原历史的真实，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今天，还原历史的真实，就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既使是对于中共已经否定的文革，已经改正的反右，今天在大陆依然是禁忌的话题。

为什么？

#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两大政治目标 ——“反右”动机之研究

章立凡

作者简介：1950 年生，中国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曾发表《风雨沉舟记》、《都门谪居录》、《长夜孤灯录》、《乱世逸民》、《毛诗漫品》、《甲申再祭》等文史作品，并在多种大陆及海外报刊发表时评、散文和撰写专栏。结集作品有《君子之交》、《君子之交如水》；合著或参与撰稿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编有《章乃器文集》、《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他是 1957 年“大右派”章乃器之子。



章立凡在发言中。

**【提要】：**对毛泽东在 1957 年发动“反右”的动机，历来有两种诠释：一是认为开始锁定在党内整风，中途转为反右，但不是“引蛇出洞”。二是认为事先已锁定党外目标，是“引蛇出洞”。

笔者认为：1957 年的政治风潮，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党内“整风”，后有全国“反右”。从前因后果上看，整风的目的未必纯为“引蛇出洞”。由于“反右”的创痛太惨重，以致很多人忽略

了“整风”的目标。需要从中共党内、党外两条脉络，分析谁是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 1949 年的《共同纲领》，新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阶层各党派联合政府。1954 年宪法公布后，副总理以上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政协副职。摒弃联合政府共识，建立一党执政体制，是毛的既定政治目标。

新政权成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经济工作上曾存在分歧，1953 年演变为“高饶事件”。1956 年毛在合作化问题上与领导层再度发生分歧，导致了刘、周支持的“反冒进”。同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几度放风“辞职”，同时试图重施“整风”故伎，恢复其在党内的个人权威。

1957 年毛泽东发动整风，鼓励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党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进行批评，引起党内各级官僚的恐慌，形势濒临失控。毛因势利导，将“整风”急转为“反右”，大规模整肃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消灭党外民主，民主党派沦为改造对象。毛转而在党内发动“反右倾”，清算“反冒进”。至此，他同时达到了整肃民主党派和重树党内个人权威的目标，为一党执政和个人独裁扫平了道路。

## 引言：对毛泽东“反右”动机的不同诠释

多数研究者毛泽东在 1957 年发动“反右”的外部因素，肇端于 1955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不久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至于国内因素，可分为党内动因和党外动因两种。大体上有两说。

一是李维汉说。认为一开始锁定在党内整风，中途转为反右，但不是“引蛇出洞”。他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 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

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 5 月 15 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sup>1</sup>朱正的《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大体采用此说，戴晴虽未采信李维汉的说法，但认为对曾经是小知识分子的领袖而言，“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sup>2</sup>

二是李慎之说。认为事先已锁定党外目标，是“引蛇出洞”。他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针对第一种观点说：“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性还更大些。”

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是领袖早有成算在胸。除了李慎之引用的那一段，他事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还说过：“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此话是否“引蛇出洞”最早的版本，待考。）。发动“反右”时他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中解释说：“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

<sup>1</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34 页。

<sup>2</sup> 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2 页。

李慎之的观点可视为对毛泽东说法的诠释。但他注意到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把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的举动，认为“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对八大是不会高兴的”；还评述了毛在“反右”后清算“反冒进”，“直接孕育了大跃进”的史实等。

对于上述二说，笔者总感到有言犹未尽之处，需要从事件的历史渊源、本质与表象进行科学的逻辑分析。1957 年的政治风潮，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党内“整风”，后有全国“反右”。只有把“整风”研究透了，才能搞懂“反右”。历史的内幕和人物的心态都是复杂的，从前因后果上看，整风的目的未必纯为“引蛇出洞”，只因“反右”的创痛太惨重，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风”也是有目标的。需要从中共党内、党外两条脉络，分析谁是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 一 重树党内个人权威是短期政治目标

### 1. 江山定鼎，分歧出现

从历史上看，“整风”必整人，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只是整人的一部分，真正要整的目标在高层。具体来说，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联手，整倒了王明，整服了周恩来。仔细分析“反右”前后的历史事实，毛泽东选择 1957 年春天发动“整风”，是袭用“延安整风”的故伎，重树“八大”前自己在党内的个人权威。

辉煌开国的荣耀渐渐淡化之后，毛泽东逐渐感到他“熟习的东西”正在闲下来，而以往所不熟习的经济工作，却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指挥自如。党内高层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例如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与刘少奇就发生分歧。

薄一波在谈到这一分歧时曾说：“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先当富农。……毛主席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少奇同志的主张则与其相反。

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主席在 1952 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 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sup>3</sup>

毛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制定的“新税制”也十分不满，据薄一波回忆：毛声称“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并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sup>4</sup>毛认为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提议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3 月作出决定：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此外还撤销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将政府工作分解为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等方面，由被指定的领导人分工负责。

毛又在同年 5 月针对刘少奇等重申自己的个人权威：“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sup>5</sup>这些分歧后来成为“高饶事件”的诱因。在 1953 年 6 月 13 日开始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发动了对主持制定新税制的薄一波的批判，于是才有了高岗、饶漱石“射薄批刘”、取代刘、周的密谋。但陈云、邓小平等的姿态令毛戛然而止，并最终抛弃了高、饶，高岗因而自杀。

## 2. 摆脱斯大林，遭遇“反冒进”

领袖与实际治理国家的领导层都希望摆脱苏联模式，但诗人气

---

<sup>3</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 页。

<sup>4</sup> 同上，第 234、235 页。

<sup>5</sup> 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0、81 页。

质的毛更喜欢打破一切常规和官僚化的管理制度，来一次浪漫的飞跃；而务实的领导层则主张使工业化进程变得更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国力。毛泽东的躁进思想与政治局的稳进战略发生了矛盾。他本人虽仍拥有巨大的威望，但其激进的乌托邦理想无法在上层推行，分歧在 1956 年几乎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毛把这归咎于党和政府的官僚化。

毛泽东 1949 年后在党内批评得最多的就是官僚主义。这个名词到后来发展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由于“一边倒”的影响，苏联模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苏式计划经济的推行和秩序的重建，企业的管理广泛采用了苏联的“一长制”。随着分工的日趋精密和责任制的推广，在体制中出现了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层制”管理结构，而官僚主义的弊端和腐败现象也日渐凸显，尤其是在基层和中层。机构变得日益庞大和臃肿，权力过度集中造成运转不灵，效率低下。权力的腐蚀也使以往充满活力的革命者正在蜕变为循规蹈矩的官僚主义者，命令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腐败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也在悄悄地滋长，共产党的社会理想要求缩小社会差别甚至消灭社会分工，而实现工业化则必定会扩大差别和分工。这些都是与毛泽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非斯大林主义思潮抬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地震。1956 年 4、5 月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两次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认真提出脱离苏联模式的问题。非斯大林化思潮显然在毛心中重新燃起民族主义的火焰，但他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则透露出一种希望成为继任导师的心态。在意识形态上，他针对斯大林在遗传学领域抬高李森科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的做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急于探索一条比苏联更高速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以为通

过“一化三改”改变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力会飞速发展。他盲目偏重于多和快，主张利用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开展了对坚持务实态度的邓子恢的批判，引来了 1955—1956 年间的全面冒进，并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周恩来自 1956 年 1 月下旬开始，就不断地对冒进的形势进行抵制，要求“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sup>6</sup>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 6 月 20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前刘少奇曾将这篇社论稿批交毛泽东审阅，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制。事后毛曾抱怨说：“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周恩来、陈云在主持敲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方案时，将冒进时提出的过高指标全部降了下来，毛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被束之高阁。如果不是周恩来、刘少奇等的抵制，毛泽东在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灾难很可能提前降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政治报告报告中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此时正值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当口，“老大哥”苏共也历来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重申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新党章将原有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除了（据说是根据毛本人的提议）。毛泽东在会前以退为进，提出将在“适当时候”不当党主席，“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sup>7</sup>，于是在新党章中为他预设了名誉主席的职位。

毛泽东在“八大”当选连任党主席，却继续作出后退姿态，进一步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sup>8</sup>，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不想当

<sup>6</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532 页。

<sup>7</sup> 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111 页。

<sup>8</sup> 毛泽东：《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2 页。参见芷水：《毛泽东不赞成“终身制”》。

了。到 1957 年 4 月 10 日，他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再度变调：“我辞去国家主席之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sup>9</sup>此后就不再提辞党主席了。1957 年 4 月 30 日，毛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 1959 年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终其一生，皆连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再也没有辞职的举动。接班人问题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心病。从“八大”前夕提出不当党主席，一变为“两个主席都辞掉”，再变为让出国家主席而留任党主席，直至十年后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并废除这个职务。虽然事态的发展有历史背景上的阶段性，心路历程却历历在目——“党是领导一切的”。

应该说，到 1956 年“八大”时，毛泽东已明显感到自己的主张在党内很难推行，需要重新树立个人权威。从他的性格和历史经验上看，发动一场群众政治运动来排除障碍，显然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但运动需要有主题和相应的能量源，而最合理的选题，就是针对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最反感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发动一场“大民主”，以释放出足够的能量。

## 二 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是长期政治目标

根据 1949 年的《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这一表述是基于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达成的联合政府共识。1953 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以 1954 年宪法为标志，确认中共的领导地位，将部级以上党外人士转任人大、政协副职。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摒弃建国时的联合政府共识，建立一党执政体制，是毛的既定长期政治目标。

1949 年筹备新政协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对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的“左、中、右”有详尽的分析，对政治

---

<sup>9</sup>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 667 页。

盟友的亲疏好恶及政治盘算一览无遗，而八年后“反右”的一些主要目标人物，皆已列位彀中。报告透露的长期目标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

此外，刘少奇在 1949 年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信中也谈到：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 134 人，其中党员 43 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 48 人，中间人士 43 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 12 人，在进步人士中有 15 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 21 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sup>10</sup>

### 1. 联合政府成立，党派改造开始

1949 年 9 月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联合政府色彩及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尊重。中央人民政府除毛泽东出任主席外，六位副主席中有张澜、李济深、宋庆龄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56 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共产党人士黄炎培、郭沫若担任了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及部长职务。

这种安排在中共党内也引起了不满，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sup>11</sup>

---

<sup>10</sup> 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沈志华：《关于 1949 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

<sup>11</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 页。

各党派在新政协的代表名额分配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共。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也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方针是“以进步为骨干”，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共产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共产党人被公开安插进民主党派。此外，中共中央统战部还提出“应当按照中央规定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合乎我党党员条件的入党，以便从民主党派内部密切党与非党的关系。”<sup>12</sup>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应中共的要求，“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不在工人、农民和人民武装部队（包括军事学校和机关）中进行党派活动。”<sup>13</sup>一些党派（如民建）撤销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变成由国库支出。

新政权成立后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对民主党派造成相当的影响。例如民革主要是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政治势力，但与旧军政及地方势力渊源较深，在土改、镇反运动中受到的触动比较大。又如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家为主体的政党，“五反”运动中，中共统战部一度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很多会员遭到斗争甚至自杀。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触及了很多民主党派内的高级知识分子。

但民主党派对于中共出台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权。例如黄炎培曾主张“江南无封建”，对土改政策提出质疑；梁漱溟因反映农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泽东的责骂时，陈铭枢当场要求毛为梁的观点定性；统战部提出民建发展组织应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章乃器表示不同意；对于出兵朝鲜、粮食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民主党派中也有相当多的负面意见。

---

<sup>12</sup> 《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1956年3月3日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决议）。

<sup>13</sup> 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李维汉同志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3月21日。

## 2. 过渡时期总路线出台，联合政府格局起变化

1952年“五反”期间，习惯于用政治、军事思维规划一切的毛泽东，开始考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53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原来设想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同年9月7日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的讲话。从第二年起，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就开始了。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原先的《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并增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政府机构的调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复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被取消，改设咨询机构性质的国防委员会；政务院改称国务院，增设国防部，担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国防建设及军事行政管理职能。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也令人瞩目：毛泽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国务院的十名副总理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部由中共高层人士出任。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至此，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领导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联合政府的色彩渐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而在1949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

1956年年底，“对资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亮出底牌说：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需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方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给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

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sup>14</sup>

### 三、“整风”急转“反右”——因势利导的运动战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不久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这警惕也分为两种：一是对党内接班人否定前任功绩的警惕，二是对党外政治力量问鼎权力的警惕。

#### 1. 内外形势动荡，党外批评出现

自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民主党派的政治批评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共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民主党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1952提出“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于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

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

---

<sup>14</sup>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7页。

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理“三反”、“五反”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中共划定的民主党派发展方针表示不满，对政协的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sup>15</sup>

毛泽东历来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sup>16</sup>1957年1月，他在党内会议上透露出“引蛇出洞”的意图：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sup>17</sup>

## 2. 发动党内“整风”，引出党外批评

在1957年2月27日的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的党内外人士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这篇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的真实内容，已被他本人在四个月后改得面目难辨。但有幸聆听者都认为，这是毛生平最富于民主精神的重要讲话。讲话的内容被迅速传达到全国，掀起了

---

<sup>15</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20、821页。

<sup>16</sup>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

<sup>17</sup> 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股清议之风。在 3 月间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再次重申“不能收，只能放”，鼓励批评，并宣布年内开展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讲话中首次强调了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显然从匈牙利、波兰民众的“大民主”中，找到了释放能量、重建个人权威的灵感——把下层的怒火引向上层。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声称：“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sup>18</sup>从毛泽东这番话中，可以毫不费力地寻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源。他还宣布：将在下一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整风必定整人，这一点领教过 1942 年延安整风的党内干部大都心有余悸。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有抵触情绪，毛只好一路游说。刘少奇这一时期正在外地视察，在上海对党内干部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低调讲话，除对毛的观点进行诠释外，对社会分配、等级制度造成的差别也表示了不安。但刘力图淡化矛盾，认为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属政治性质的“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他主张以温和方式化解批评，“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试图分散批评的焦点，认为“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sup>19</sup>

---

<sup>18</sup>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24-326 页。

<sup>19</sup> 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4—306 页。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这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主张“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开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他宣称：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毛提出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对民主人士有职无权表示同情，说“现在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一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sup>20</sup>还指定邓小平负责，向党外人士征求这方面的意见。

值得玩味的是，在这次会上，毛以退为进，首次对党外放出了辞去国家主席的口风，以试探各方反应。领会意图比较到位的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二老，立即上书刘少奇和周恩来，恳求顾念大局，万不可让毛公引退。这话通过党外人士的口说出来，分量当然就不一样了。

### 3. “整风”失控，转舵“反右”

毛泽东的竭诚邀请，重新激发了党外老朋友的参政热情。5月4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指示，组织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展开批评。其实经过土改、“镇反”、“三反”运动，在地主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影响力的民革、民建等党派已改造得差不多；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之后，文化教育界人士也多已缄口不言；只剩下民盟、农工等党派还有待改造。

但闸门一经打开，批评的洪流便奔腾直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的“大鸣大放”，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如果批评之火仅烧到毛点名的高等教育、普通

---

<sup>20</sup> 《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957），第222页。

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几个国务院部级单位，甚至国务院本身，或者出几个“小匈牙利”，似乎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但形势很快“出线”，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的言论固然“出线”，但“出线”更多的当属《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文章：“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于是他对“老和尚”提了意见：“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储安平的这番言论，是在向毛泽东重申 1949 年建国时的联合政府共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民主党派人士鸣放，尚能坐而论道，不失雍容气度。青年学生却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抨击时弊不遗余力，“出格”就太多了。学生们的言论不受党派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约束，广泛涉及前辈们尚未问津或不敢直道的领域，并结成各种社团，编印各种刊物，还主动与民主党派人士联络，寻找“领袖”。以致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形容当时的校园气氛说：这好像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

毛泽东本想利用“大民主”手段来冲击官僚体制，却产生新的两难境地：“大民主”危及到党的一元化领导，或许是他始料所未及；青年学生有与民主党派人士合流的迹象，也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麦克法夸尔等西方学者认为，毛在党内的巨大压力下改变了主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袁永熙当时曾透露：“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

在党内权力制衡关系中，毛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中央局和省级干部。应该说正是这些人的呼吁，促使他将自己放出的“魔鬼”收回瓶中，全党“整风”开始转为全国“反右”。毛的英明决策，使被“大民主”烧得寝食难安的各级领导如降甘霖，得到从中央到基层的一致支持。他的个人权威也开始重新树立。

## 四 两大政治目标同时实现

### 1. 昔日政治盟友，今朝改造对象

作为群众运动大师，毛泽东善于利用形势实现自己的目标。“整风”急转“反右”之后，很快把“右派”书生们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反右”的过程及毛的有关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仅分析“反右”造成之民主党派政治地位变化。

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点明：“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sup>21</sup>毛泽东将打击重点放在成员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同盟，并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中，罗织出“章罗同盟”这个名词，以影射民主同盟：

8月2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这些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友党”也变成了整风对象。这个文件提出要“改造组织，使左派和中左取得领导优势，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各民主党派随即对“右派分子”实行了组织清洗，这些人在各级政府、人大中的职务不久也被罢免。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58年7月18日提出的《改造民主党派五年工作纲要》（修正稿）中，将民主党派定性为“半反对派”，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它们在这一方面对我党的辅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加强了”。并制定了具体的“组织整顿”步骤，以实现“壮大左派、团结中间，孤立右派”的目标。

1959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37%降至22.8%。<sup>22</sup>《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在“反右”以后相继被收编，某些专题新闻的审批权由党

<sup>21</sup> 毛泽东：《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1957年6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第503页

<sup>22</sup> 赵向阳：《艰难的跋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中央专门机构行使。

1957 年后的民主党派，只是作为“政治花瓶”存在，“互相监督”变成了“单向监督”。三十二年后，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发【1989】14 号文件，将中国的政党制度定位在“多党合作”；48 年后下发的中发【2005】5 号文件，最终明确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与共和国建国时的“联合政府”已经是不同的概念。

## 2. 重树个人权威，清算“反冒进”

“整风”急转为“反右”后，毛乘战胜之余威，挥舞“整风”和“反右倾”的大旗，重树在党内的个人权威。他对周恩来等在 1956 年发动的“反冒进”一直耿耿于怀，再三表示不满。在 1957 年 6 月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周迫于“反右”的严峻形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放弃了“反冒进”的提法，承认 1956 年的经济“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9、10 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借“反右”之余烈，再次将锋芒指向“反冒进”。指责“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

毛泽东在 1958 年春先后主持召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批判“反冒进”，以确立“大跃进”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在南宁会议上，毛指责说：“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周恩来、李先念等“反冒进”的倡导者受到严厉的批判，被迫作违心的检讨，毛还产生了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为总理的想法。毛重提他对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社论的积怨，认为这篇由刘、周审批发表的社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sup>23</sup>

毛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所谓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论

---

<sup>23</sup>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 页。

点。他强调，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并举出列宁回答别人批评其独裁时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此言一出，与会的地方大员纷纷附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sup>24</sup>在这样的气氛下，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已被束之高阁。

### 3. 重提“阶级斗争”，发动“大跃进”

1956 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本已宣布：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认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但是“反右”导致了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理论重新登台，在 1957 年 10 月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围绕“八大”决议中国内主要矛盾提法重新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sup>25</sup>这就推翻了中共“八大”确认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断。他在 1958 年春又提出国内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论点，将“右派”和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列为第一个剥削阶级，将已交出生产资料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列为第二个剥削阶级。重提阶级斗争理论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日益向左倾斜。

毛在这一时期不断阐扬他的“不断革命论”，主张“革命就是要趁热打铁，一个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湖南人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如 1949 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

---

<sup>24</sup> 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6、117、121 页。

<sup>25</sup>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75 页。

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sup>26</sup>毛平生熟读兵法，习惯于用军事家的思维方式指挥一切，他坚信：“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sup>27</sup>为此，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重新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导权，为 1958 年的“大跃进”灾难开启了绿灯。

## 五 半世纪后细论得失

通过 1957 年的“反右”，毛泽东重新树立了党内个人权威，中共实现了一党执政，一时成为政治大赢家，但在五十年后反思这段历史，政治得失未必尽在当时。

### 1. 外毁游戏规则，内促权力斗争

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必备的两只车轮。致力推行工业化，抵制实行民主化，这就无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以 1957 “反右”为标志，开始了一段跛行的历史：共和国的民主建国理想和联合政府共识被摒弃，走向一党体制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

“反右”也导致国家法制建设的倒退。中共中央于 1958 年 6 月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规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sup>28</sup>

<sup>26</sup> 丁望 编：《毛泽东思想补遗》卷三，香港明报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62 页。

<sup>27</sup>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 24 页。

<sup>28</sup> 赵向阳：《艰难的跋涉》，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9 页。

在公开宣布“党政不分”和政府机构向党负责的同时，法院和司法部门也被明确规定，“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任何借‘审判独立’，抗拒党委对具体案件审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sup>29</sup>刘少奇称，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后来刘身为国家主席，却病死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毛泽东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sup>30</sup>刑法、民法、诉讼法的制定工作因此停止了。到1959年，国家监察部、司法部同时被取消。监察部的职能由中共中央监委行使，律师制度也告消亡。

1957年“反右”消灭了党外民主，也使政治斗争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党内。1959年的“庐山会议”重创党内民主后，历经“七千人大会”到“四清”，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国性内乱。

从运动手法上看，“反右”与“文革”的共同特点，是毛泽东通过“大民主”，重新树立了个人权威。毛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认同民主是现代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方式。正常的游戏规则一旦破坏，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如果说“反右”是党外民主的失败，那么两年后的庐山会议则是党内民主的失败。综观内外成败，毛泽东胜之不武，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惨败。“反右”在某种意义上是“文革”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破坏规模和烈度更加广泛和严重。

挑动群众斗群众、干部整干部、群众斗干部、干部整群众，是毛泽东的惯用权谋。“反右”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包括部分党内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而“文革”的打击对象则是党内“当权派”。“反右”的受益者后来也往往成为“文革”

---

<sup>29</sup>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sup>30</sup>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

的受害者。“反右”与“文革”都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参与（近年已有人开始“右派”与“造反派”的对比研究）。但无论是“右派”还是“红卫兵”、“造反派”，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往往都逃脱不了流放、监禁、入另册的命运。

## 2. 赢在政治权谋，输掉历史地位

综观“反右”前后的历史，我认为这场政治运动的最初动因在党内，借助清议“整风”的短期目标也首先是针对党内，但也隐含“引蛇出洞”的长期战略意图。“整风”的失控才导致了“反右”的大逆转，尽管卷入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从未想过要推翻共产党，而是要求政治改良，实践执政前的民主诺言。但对毛泽东而言，“大民主”是一把两刃剑，既可用于党内，又可用于党外，剑柄则操之于己。“蛇”被引出“洞”后，是“放蛇咬人”还是“斩蛇七寸”，完全根据形势需要而定。

毛泽东作为一个擅长运动战的谋略大师，其思维模式往往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猴气”十足，随时可以拆掉重来。重树党内个人权威和整肃民主党派，都是他的战略目标。毛并非一貫料事如神，从“整风”“反右”到“文革”，他虽有战略目标，但失算之处也不少，而从战术上变数甚多，“兵形似水”，一网不捞鱼，马上有第二网、第三网，足以左右逢源，转败为胜。这两个战略目标他都达到了。

毛泽东是个充满矛盾性格的人物，自称兼有“虎气”和“猴气”，似乎生来就是一位秩序的破坏者。但作为一位农业社会的魅力型精神领袖，他却从来没有勇气否定过自己。毛的乌托邦思想和矛盾性格，使他的革命事业最终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反文明盲动。

熟读典籍的毛泽东，不仅欣赏法家的霸术，在政治实践中更偏爱兵家之诡道。从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变脸为“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被恶搞的不止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还有他本人和中共的政治信用。

毛本是极重视自己历史地位的人，当初自创了“阳谋”二字，竟永留一个比阴谋还要糟糕的名词于史册，殆非其始料所及。毛泽东言而无信，在政治道德上开创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民无信不立”，此后半个世纪间，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痼疾，并随着经济起飞而愈演愈烈。

### 3. 因循党派史观，难脱历史债务

“反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并鼓励了一种贬低知识的社会价值取向，公开宣扬“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蒙昧主义。大批“翘尾巴”的知识分子被降职降薪，派去从事体力劳动。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脑力劳动成为危险的职业，到后来竟然推演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结论。干部的选拔日益注重阶级出身的标签，而忽视知识才能的考核，形成一种淘汰精英的人事机制。对知识的社会价值的贬损还导致了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下降，使之日渐沦为社会的贱民。

“反右”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精神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打断了民族的脊梁，使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强权面前日益萎琐。从此，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外行指挥代替了科学决策，群众运动式的冒进蛮干代替了稳健有序的建设。在这种氛围下，即使是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也不可能正常进行。

反右”给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长期的损害，1957年的“反右”消灭了党外民主，引发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导致1960年代初的全国大饥荒；1966年发动的“文革”，更将全国人民推进一场长达十年的政治、经济双重浩劫，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推迟了二十年。

自“反右”历经“文革”迄今的五十年间，公权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监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起飞，也造成中国大陆的贪腐横行，以致毛泽东反特权反腐败的平等说教，如今仍被某些人怀念，但特权腐败现象的泛滥，正是消灭了民主监督的恶果。由于毛泽东的偶像地位仍被愚蠢地维持，“反右”这一摧毁民族精神、斫伤民族元气的历史罪案，至今未得到应有的清算。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意识形态僵化、腐败低效和官官相护等现象，与 1957 年群众所批评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一脉相承，并正在危及中共的执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个人和中共既是“反右”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成为其自身历史行为的长期受害者。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按照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清偿历史债务不仅是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党的本份，也是其合法性的标准之一。当今的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既然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也摆脱不掉其遗留的历史债务。

历史既然是科学，从来就不是“宜粗不宜细”的，对毛泽东搞“凡是”行不通，对邓小平搞“凡是”也同样行不通。因循鸵鸟式的党派史观对待历史，则难于接受教训且有所作为。

（本文在作者 2004 年发表的《“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对李慎之先生迟到的商榷与纪念》一文基础上，根据新的资料和研究作了增补和修订。2007 年 5 月 28 日 完稿， 2007 年 8 月 5 日 修订。）

# 对张鹤慈、章立凡发言的评论

姚仁杰

大家好！我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本来要考虑是不是要来，但考虑到吴弘达先生的盛情邀请，我决定还是要来。真正最后下决心，是北京大学的党委居然事先知道了我得到了邀请，对我进行劝阻，这一劝阻，我就下了决心，决定要来。

张鹤慈、章立凡都不是右派，但他们的父辈是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刚才作为右派的后代，来研究反右，我觉得很有意义。我现在感到很困惑的是，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什么是反右了，因为这段历史几乎被掩盖。所以我非常赞成这次会议的发动，就是不能忘记反右。

照我看，反右斗争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次运动以后，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退化到封建法西斯主义。封建法西斯也不是我给它戴的帽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作的评论，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封建法西斯。我觉得反右运动的前一段，是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刚才两位谈了一些观点。有些我同意，有些我觉得不全面。但是，走极端化我不同意。觉得毛泽东深谋远虑，早就策划好了。我觉得这是对毛的一种神化。就像现在觉得毛很会打仗，就像有些流行的话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把他神化，所以我说不对。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毛选很多带政策指导的文章，并不是原始发表的文章，很多是事后经过多次的修改的，这说明他当初并没有估计到当时的情况。

我亲自参加过整风运动，我当时在北大当助教，23岁。我是全系学习成绩最好的人，但既不入团，又不入党。所以当时被他们当作青年知识分子典型代表，邀请参加整风运动座谈会，所以整风的

过程我基本知道。我当时参加了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一个是“肃反工作座谈会”。当时毛的思路是有的，但情况已经大大变化了。建国短短几年，不断地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社会上的矛盾激化出来了。整风表面上看，毛泽东要实行民主，要我们帮助党整风，我就是响应号召去的。我觉得多数右派，是被再三动员被骗去的。我本来可以不去的，但被一再邀请，就去了。我去发言，态度也好，发言也好，但没想到，一两个月以后，我被第一个打成右派。我的一个罪名是，说我收买学生，威逼党委书记处，宣布姚仁杰是个好人。

当初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殊不知，很多民主党派上层人士提的意见最尖锐，储安平的“党天下”，就直接向毛泽东提意见。但是，真正说真话，毛并不怕，毛早就对民主党派控制在手心。毛泽东执政几年，已经形成一种意见，最后这种意见，变成与他的政策无关，而是干部执行有偏差。让大家对干部提提意见，这样就显得他这个领袖是开明的，光荣的，伟大的。北京大学后来编了一套《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的。右派们不仅仅说“家天下”、“政治设计院”、“民主党派有职无权”，毛泽东最恨的是，大学生研讨“三害”根源，为什么会出现“三害”，要探根溯源，要讨论思想根源和制度根源。所以，毛泽东最后处理右派分子时，头面人物右派，都没有被很严厉的处分，包括章伯钧。但年轻右派，包括我这种年轻助教右派，是被警察抓走的。他们一天就从北大抓了 120 多人，我们坐了三部卡车，浩浩荡荡开出校园。摘帽时，首先是民主党的派头面人物先摘帽子。而年轻人，整整二十几年，像我就是，牢底坐穿了，我跟公安局打交道打了 22 年。毛死后三年，把我们当错划的右派改正，我才又回到北大去教书。22 年，要是活 100 岁，整掉了五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平均 70 几岁，那就整掉了三分之一。年轻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希望，而这些希望，要反对专政。所以，毛对真正有威胁的年轻人整得最厉害。

当时林希翎从人民大学两次到北大讲话，我都参加了。北大戴帽右派一共 755 个，当时全校师生员工不到一万，几千个学生，包

括教师，就倒在这，还有 805 个所谓的不戴帽子，内部控制的右派。加起来是 1553 人。这比例有多大？！15%！

还有，我同意他们关于数字的观点。究竟被打倒的右派是 55 万，还是 200-300 多万？我个人倾向 55 万，但有个前提，这 55 万是指，把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总数，连高中的也算知识分子的话，全部大概有 500 万。500 万知识分子，打掉了 55 万，就 10% 以上。到 79 年改正的数字，也是这个数目，55 万。也就是 99.99% 都改正了，除了留了几十个，上层留了“章罗同盟”，下层留了林希翎。所以根据这个我觉得符合事实。

为什么会出了个 200 万，300 万的数字？是因为 57 年，58 年的反右以后，历次运动，包括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住都往右派数，要是这样也包括进去，那二、三百万并不多。如果说 58 年就反了 300 万，我觉得跟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总数不符合。所以我刚才说，整风是反右引出的，看来毛整风是假的，而抓出来大量的年轻右派，消除他的心头之患，是他最终的目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反右斗争是没有赢家的一个悲剧。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我们要进城赶考，反右斗争是共产党进城赶考，得到的一个负面的成绩，这个政绩是以整人开始，以害人告终。这次我跟我们党委书记说我要来参加反右会议，就将了他一军，我说：“毛泽东当时做的，难道你们觉得对吗？”他们说：“不对。”我说：“既然不对，你们为什么要替他背这个历史黑锅？”

(本文根据录像整理)

# 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胡平

作者简介： 1947 年生于北京， 七岁随母入川， 66 年高中毕业， 适逢文革， 参加文革两年半， 下乡插队五年， 73 年底返回成都， 又当了五年临时工， 78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 主修西方哲学史， 获哲学硕士学位。 79 年投入民主墙运动， 于民间刊物《沃土》 上发表《论言论自由》 长文， 80 年参加自由竞选， 被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 毕业后两年未分配工作， 83 年分到北京出版社， 85 年转至北京社科院， 87 年 1 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 88 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至 91 年）。 现居纽约， 任《北京之春》 主编。



胡平在会上发言。

## 阴谋阳谋之辨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 1957 年，而不是在 1966 年发生。”

这一见解可说与我不谋而合。我在 87 年 1 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过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毛并非一开

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毛确实玩弄过“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李维汉所说，毛在 5 月 15 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已经在暗中布下反右斗争的天罗地网，但对外却仍然积极鼓励大鸣大放。事实上，最尖锐的右派言论还都是在 5 月 15 日以后才放出来的。如：5 月 18—19 日，北京大学开始贴出鸣放大字报；5 月 21 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5 月 22 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5 月 23 日，人大学生林希翎演说批评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5 月 24 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5 月 30 日，葛佩琦鸣放发言被篡改为“杀共产党人”，登在报纸上；6 月 1 日，储安平批评中共实行党天下；如此等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可以被看成一个转折点，它恰好说明反右并非毛的初衷。

李慎之认为毛早在 57 年 1 月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决定要“引蛇出洞”。毛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不过依我之见，毛的这段讲话只是表明他事先就估计到会有错误言论出笼，但并不表明他当初提出双百方针，鼓励大鸣大放的本来目的就是诱敌深入，就是为了搞一场反右。

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被毛后来批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的《文汇报》，本来在 1956 年 5 月就已经“自动”停刊，

原班人马被转去北京办《教师报》；然而到了夏天，中央又决定《文汇报》复刊，要徐铸成任总编辑，贯彻双百方针，并特地强调要“有职有权”。若说早在 56 年夏天毛就开始“引蛇出洞”，准备反右，显然是很勉强的。若说早在 56 年夏天毛就在“放长线钓大鱼”了，这条线岂不是也太长了吗？

还有，丁玲、陈企霞早在 55 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可是到了 56 年却又悬置起来，重新审查，大有平反之势。胡风集团也有类似的情况。55 年批胡风，一大批文化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可是到了 56 年春，若干胡风分子却又被放了出来。不错，等到反右运动起来后，丁玲、陈企霞和那些被放出来的胡风分子又重新被收进网中。但问题是，像这样抓了又放，放了又再抓，何苦呢？可见中共的想法前后是不一致的，起先的想法是放，中途却变了主意，所以来又抓进去了。

在鸣放期间，费孝通发表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共鸣。单单是文章的标题就表明，在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感觉中，相对于此时的“乍暖还寒”，此前的政治气候有如严冬。事实上，经过先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民主党派早已被边缘化，有职无权，知识分子则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既然如此，毛泽东有什么必要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尤其是，毛何苦还要亲手把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手再扶起来，并亲手把武器交给对方，放手让对方再来攻击自己一阵，然后自己再还击，从而把对手再一次打翻在地呢？

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当初，毛摆出开明姿态，营造宽松气氛，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参与鸣放应该是别有所图。毛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说到底，就是想利用党外整党内。这和后来毛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思路很类似。试比较毛的两段讲话。一段是毛在 1957 年 3 月 2 日的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另一段是毛在 1967 年 2 月 3 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讲的——“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不是很相似吗？

## 流产的文革

毛凭什么以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可以为他所用？这固然是因为他当时极度自信，自以为功高天地，万民皆心悦诚服。但也不尽然。毛之所以敢于发动党外力量，也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外人士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依附于共产党的，谅必不敢造次。假如“他们的子弟”由于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要学匈牙利，”毛说，“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的如意算盘是，正因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长期受冷遇，如今突然受到重视，想必会感激涕零，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知恩图报，于是正好为我所用。

在当时，毛认为对自己权力形成掣肘的主要来自党内，党外根本没有那份力量，所以他想利用党外整治整治党内。毛决不是对党外更信赖，他当然知道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更不可信，他只是想利用一把而已，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用完后该收拾的还是要收拾的。这就是为什么早在 57 年 1 月毛就会讲出“让他们闹够”，“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些话（见前述李慎之所引毛的讲话）。毛多次在党内高层中讲“不要怕放，不要怕放出毒草”，“毒草除掉可以当肥料”。毛的意思并不是说“放”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让牛鬼蛇神出笼，以便聚而歼之。毛是希望“放”出对他有利的东西，毛是把放出毒草看成是在实行放的方针时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因而不要因噎废食。

1957 年 3 月 10 日，毛召见徐铸成。徐小心翼翼地问毛怎样才能把报办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谈到了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这实际上是暗示知识分子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可是，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并没有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随着鸣放的深入，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锋

芒所指，不仅涉及到毛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毛的政策，甚至涉及到毛本人。毛想利用党外整党内的计划完全破产，于是毛决定狠狠地整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反右。所以朱正要说“整风一反右”是流产的文革。

不妨再引用一段李志绥的回忆。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 57 年的 5 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我们知道，毛是最不肯认错的，而这句话却是委婉地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 一个后来人的思考

今年是反右运动 50 周年。余生也晚，反右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我常想，如果我早生 10 年，定然在劫难逃。以我的个性，不用共产党反复动员，也是要发言，要提意见的；以我的思考能力，讲出的话多少会比一般人深刻一点，不打成“反动”才怪；就算我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比较缜密，不容易让对方抓住什么把柄，那多半也无济于事，反右斗争的风暴一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有，以我的出身背景，即便在鸣放期间守口如瓶恐怕也不行，因为你架不住别人对你平时言论的揭发，因为你很难掩饰住你对那些右派言论的同情和对残酷斗争的反感，所以到头来还是很可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间，我开始了解到反右运动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 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 57 年右派言论中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我从文

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

反右运动无疑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我当年苦思的问题是：从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究竟应当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争取自由民主，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原则与策略。

不少过来人事后总结道，当初他们的错误就是对共产党太轻信了。这种总结未免肤浅，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是容易滥用，自由民主正是要求人们对权力怀有戒心。如果你对权力一味信赖，以为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自我克制，那本身就说明你对自由民主还缺少深刻的理解。然而，这决不是说装聋作哑，缄口不言就是正确明智的选择，因为那等于是自我阉割，向暴政屈服。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去给党提意见，这是幼稚的；不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默不作声，也不可取。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问题在于，任何美妙动听的诺言，除非当它不再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双方面的契约，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约束力。西哲说，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统治者的口头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被称为宪法的一纸条文上，宪法必须铭刻在广大公民的心中。当毛泽东许诺言者无罪时，我们用不着费尽心机地去猜测他有没有诚意。或者说，我们必须假定他没有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自问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究竟有多少人充分领会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因而当统治者试图压制言论自由时，究竟会遭遇到多大程度的抵抗？这种抵抗是否足以阻止住权力的滥用？如果你发现现实状况还远不能令人乐观，那你就会知道，你眼下首先要做的是，还是向共产党提意见，而应是向人民阐扬言论自由的原则。既然毛泽东讲了要实行言者无罪，既然宪法上也写有言论自由，这正好为你阐述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话头、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言论自由原则，努力使之深入人心。却匆匆忙忙地就去兑现言论自由，就去放言无忌地批判共产党，那么只要共产党一翻脸，我们就必然会整得很惨。挨整之后，我们只去怪共产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归根到底，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的原则还没有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故而还不足

以构成对共产党滥用权力的有效约束。我打过一个比方，屋子漏雨，你不能怪老天爷下雨，因为老天爷总是要下雨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想办法把屋顶修理好。不是总说自由民主要靠争取不能靠恩赐吗？什么叫争取？争取与其说是面对统治者，去测试统治者的雅量或容忍度，不如说是面对人民，争取人民对自由的理解、领会、支持与捍卫。

应当说，共产党在当年能够赢得反右斗争的胜利，那其实跟当时大多数民众是否真心拥护共产党没有多少关系。不错，共产党为了发动群众斗争右派，他们把右派的观点简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复辟旧社会”。在当时，也许确实有不少民众认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他们就很容易站在右派观点的对立立场。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将当时民众对共产党的拥护程度估计太高了。如果共产党不是意识到右派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传染性也就是赢得人心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有一部分工农都已经走上街头群起抗争，共产党就不必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打压，去反右了。更进一步地说，就算多数民众真心拥护共产党，这和他们赞同、附和以及参与对右派的迫害其实是不相干的。因为反对右派的观点和侵犯右派的言论自由根本是两回事。问题不在于当时的右派是否处于少数，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具有保护少数的观念。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懂得、从而采取“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立场。这也再次说明，争取自由，首要的不是尖锐地抨击时政，尖锐地批评统治者；也不是为民请命，代表多数老百姓去讲话；甚至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启蒙，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特定的主张或意见告诉大家，去赢得多数的赞同。真正重要的是，首先要让大家学会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宽容和对异议者权利的保护。简言之，是让大家理解和掌握言论自由原则。

## 重申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原则有两个特性。一、言论自由原则是对共产党专制

制度的釜底抽薪。有些原则一时间看上去和共产党专制制度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由于共产制度的巨大灵活性，它完全可以把这些原则统统吸纳而仍然不改其专制性。像资本家入党物权法，放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却堂而皇之地载入党国的文件和法律，同时又不妨碍共产党继续专制下去。言论自由则不然，一旦有了言论自由，共产专制就不复存在。二、有些原则，例如三权分立，多党制，对共产专制也有颠覆意义，但是党国可以公开地否定它们。言论自由却不同，言论自由原则是共产党在公开场合下也不得不承认的。这就是说，提出言论自由原则，能够对共产专制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而共产党还拿着你无可奈何。

不过这后一点是很没把握的。在一党专制下鼓吹自由民主，不管你表述得多么机智巧妙，多么无懈可击，遇到反右这种大风暴，还是免不了被一锅端。在研读 57 年的右派言论时，起初，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使我感到，这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很可能引起了一种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们给当局的镇压提供了藉口，它们刺激当局放弃容忍转而压制；而一旦镇压机器开动，那些比较温和的，当局原本想压制却发愁找不到藉口的言论也会受连累。八九民运也有类似的情况，运动后期，民运中的激进派占了上风，导致中共上层开明派失势，强硬派得逞，民运遭到残酷镇压，温和派也被一网打尽。不少人总以为，在民运中，谁最激进最大胆就最优秀最高明。没有比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看法更误事的了。

鲁迅说中国人性好折衷，你说要开窗户，大家都反对，等你说要拆屋顶，他们就觉得开窗户是可以接受的了。常见人借用鲁迅这个比喻，说激进派客观上能起到保护温和派帮助温和派的作用。其实未必。这种事切不可一概而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派确实能起到保护温和派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正好相反，激进派常常不是保护温和派而是连累温和派。这就是为什么温和派常常要主动地批评激进派，要和激进派作出某种区隔。在民主墙时，《探索》的魏京生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邓小平，《四五论坛》的人赶快写大字报反驳，倒不是他们真的反对魏京生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被当

局一锅煮，他们担心当局对激进派采取强硬手段，到头来把整个现有的活动空间都给压缩了。

温和、激进都是相对的概念。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为具有一般智力和勇气的常人提供一个他们既容易领悟，又不害怕公开坚持的原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能够维护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又能够为民主的扩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说来，50 几万右派都是因言治罪的受害者，然而在整个鸣放期间，却少见有人把言论自由的问题专门提出来大作文章以及致力于这一观念的广泛传播。试想，假如在那段言论较为宽松的时期，有人，而且是有很多人，全力以赴地宣讲言论自由原则，给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讲，也给共产党干部和工农大众讲，用对方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反反复复，不厌其详。既然这种宣讲暂时不涉及对共产党的任何具体的、直接的批评，共产党恐怕也很难马上就公然禁止；而一旦言论自由的原则比较广泛地深入人心，共产党想翻脸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1979 年初，我在民主墙发表了“论言论自由”长文，竭尽所能地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深信那是最好的时机，当局最难压制而公众最能领悟。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因为发表这篇文章而招致任何麻烦。只是来自公众的反应太微弱。我不能不感到，和我们经受过的巨大苦难相比，我们吸取到的教益未免太少了。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言论自由。由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心态的变化，有些过去适用的原则和策略现在还有效，有些就已经失效了。我们需要找出新的策略和进路推动我们的事业。在反右运动 50 周年的今天，我愿意再次唤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原则的重视，以便早日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 1957 年的非官方杂志《广场》

邵 江

作者简介：1985 至 1989 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因为参加民运，在 89 年到 91 年期间被逮捕入狱。目前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和媒体，比较政体和国际关系，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



邵江在会议上发言。

中国有很长的印刷文明。但到 19 世纪前，一直没有杂志产生，有的只是官方的邸报，邸报是传递皇帝和官员之间的公告和宣文的。这个印刷时间是从唐朝开始的。到了宋朝后，有名的学者可以读一种特殊的邸报，这种邸报是刊登朝廷秘密的，这有点像中共的大参考。

欧洲的杂志的含义，是从阿拉伯文来的，原意是仓库的意思，引申含义是储存思想的仓库。在欧洲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它开始形成一系列的特点：文体混杂、文本公开、影响公众舆论、固定出版，侧重评论时事，而不是报道新闻。

中国最早出现杂志是 1820 年，出现在澳门。中国人自己办的杂志出现在 1896 年，甲午战争以后，同时出现了 3 份杂志。当时的报纸杂志没有区别，有梁启超、康有为的《强国报》、《务报》，还有章太炎作主编的《苏报》。在辛亥革命中，刊物主要是介绍新思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加强了报刊审查，限制了报刊的发展。但新文化运动期间，报刊发展非常迅速，主要是《新青

年》、《新潮》，非常有影响，传递民主科学人权、自由思想，这些对中国现代化影响巨大。包括 57 年的很多学生，都去寻找五四的思想资源。

在 49 年后，共产党全面建立了极权制度，它吸收了清朝灭亡和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经验，严控媒体。共产党从 20 年开始，杂志就变成提倡暴力革命的机器，和枪杆子一道，成为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武器。中共夺取政权后，实行自上而下的权利，建立极权和巩固极权的制度。它的方法有：军事统治、政治运动和极权模式媒体，及对报刊的控制。军事统治，主要是 47-53 年之间，由军管会来控制媒体，政治运动主要是洗脑及增加恐惧，要公众服从新的政权。这些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思想模式、意识形态模式。

57 年的两件事影响非常大。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有一个是匈牙利的公民抗战。秘密报告是不能传到社会的，但一些高校师生还是得到了报告内容。匈牙利公民抗争进行了 11 天，中共封锁消息。但当年很多院校有东欧和苏联的学生，他们之间有争论。苏联支持其政府的行动，东欧相对同情匈牙利公民抗争活动。中国一直敦促苏联镇压匈牙利事件。在苏联血腥镇压后，中国定性该事件为反共反革命事件。但中国大学生逐渐了解了这个事件，并同情匈牙利的公民运动。

57 年，政府在基层组织开展引蛇出洞的鸣放运动，并选择部分在官方媒体刊登。在北大，一些学生并不满意官方控制的鸣放，有些人希望帮中共改善统治的方法。也有对制度不满的。还有部分学生经历过肃反运动。所以很多学生质疑“三害”的来源。5 月 18 日，大字报出现，变成了一个论坛。从此，大字报成为一种特殊的媒体。从 57 年后，甚至到现在，它实际上突破了中共控制媒体的传播方式。

5 月 19 日后，中共控制的媒体不太可能客观地评价这些大字报的作者、支持者的异端思想，所以北大党委还组织了学生会的一些刊物，如《浪淘沙》、《红楼》、《啄木鸟》等，来谴责学生的异端活动，还调动宣传机构宣布，北大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反革命分子控制。大字报有个问题，传播范围有限，容易覆盖。所以，大字

报的作者为此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强大的围剿，反击官方的压制，他们就组织社团“百花学社”，还创办了杂志《广场》，超越中共对传媒的控制。

《广场》的特点；第一，它是五四遗产。五四运动后，北大留下两个有象征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红楼，它是中共第一个马列小组诞生的地方。另一个是北大民主广场，它是当时五四运动集合和组织的地方。《广场》的名称来源于北京大学民主广场。5月30日成立大会的时候，张元勋建议这个杂志为《广场》，他说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的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广场》，对着干。《广场》的封面是一把火炬，象征五四的火种，封面题字复印了鲁迅先生的手迹。《广场》刊登与官方形态不同的大字报，印500本。包括政论文、诗歌和散文。政论文至少有7篇，同时组织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广场》的增刊，但因为官方镇压了，秘密报告最后没有出。

《广场》宣布绝不受官僚主义者的左右，面临中共和它动员的大众的压力，《广场》必须协调内部可能的分裂，保持内部的共同行动，反击官方的打击。这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共同组织起来的集体公开的抗争，警示大众不要变成抬轿手，吹鼓手，和无头脑的人。《广场》的宗旨是：我们的《广场》是真正的广和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是真善美，无论是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来放开嗓子唱。促进法制的建设与改造，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作为《广场》的总目标。具体目标是充分揭发“三害”事实（当时中共宣布整风，要整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编者注。），并逐步把重心转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认识，“三害”问题不但是作风问题，而且涉及国家制度问题。提出舆论自由、取消出版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以使《广场》和“百花学社”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和长久独立的组织，并影响全国。从《广场》的名称、标志和目标看，《广场》颠覆了中共执政以来对“广场”的定义。中共执政以来，广场是一个显示极权、力量和公开忠诚表达的场所。《广场》宣布：“我们的《广场》是真正的“广”的

“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我们的《广场》又是火葬场！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对《广场》的成员而言，这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这实际上是表达个性自由和思想交流的空间。

《广场》的第二个特点，是抵抗极权暴力的语言倾向。中共控制了所有的媒体，向社会灌输它的意识形态。《广场》和他们的支持者称，他们张贴的大字报、组织辩论、社团、创办《广场》事件为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取代官方命名的整风和鸣放运动。还有，《广场》定位为独立的民间社会力量，而不是服务于统治者的群众团体。中共对民主的定义是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声称民主是有阶级属性的。《广场》对民主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认为民主实现过程必须经过自己争取，民主必须来自奋斗。王国乡写：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搀和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另外，《广场》强调公权和民主超越阶级的属性。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公民权利，实现这种权利是实现民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公民权利不需要权利者的支持，和表述对权力者的效忠，然后按照领导的意图、可能接受的情况去演说和行动。《广场》认同五四运动的宗旨，它认为五四跟官方宣传的是不同的。张元勋说，五四运动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五四，我们的五四是叛逆，不是驯服。谭天荣说，五四是当发展受到阻碍时的一种革命。陈奉孝说，五四运动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学，今天的问题是缺乏民主精神。北大应该恢复五四的精神，就是兼容并包各种思想和学术自由。在中共建政的初期，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容辩驳的禁忌，《广场》的大部分成员对这个词是没有怀疑过。张元勋说，我没有怀疑这些名词，因为当时没有被镇压，对于这些名词没有反应过，当时

不认为这些口号有本质问题，只是在执行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偏离了社会主义，是后来的中国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清了它的本质。

《广场》的文章和油印的小报强调社会主义应该包含人道、平等，跟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应该保障公民权利。张锡锟明确指出“三害”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问题。他质疑，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上，是个骗局。说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一切东西是不可取的，这是他质疑的。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严重程度不同的官僚主义，这种制度的形成是依靠思想懒汉，在这种体制中，压制人民的体制和执行者，是“一些人在以白骨搭成的梯子往上爬”，他说明，“一些人一说到制度问题特别小心，硬要加上具体的制度，制度的环节。这样一来可小心翼翼地说小制度，很小很小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涉及到权力、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将继续付出巨大代价。

中共控制所有的媒体，许多异端是在中共官方语言生成介入转换的，它倚仗官方语言，扩展异端。《广场》和它许多油印文章成功突破了思想封锁，转换和创造话语，恢复和评定五四的传统和重新标定社会主义。

第三个特点，《广场》实现杂志的潜力，实现杂志传播的定义。《广场》恢复杂志最初的特点，并为杂志创造出新的特点，在极权的残酷反对下，杂志容易大量复制，传播多元。在北大运动过程中，大字报、油印小报互相交映，丰富了《广场》的内涵——移动大字报的功能。

杂志还有一种功能，公民抵抗运动。抵抗权力的肆虐和暴政，维护人的尊严。

《广场》的现实意义，就是解构极权主义的组织原则和宣传模式。其最大的意义，就是民间自主反击极权专制，这是对极权主义专政的威胁。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数十年的真实意义，就是以人民的名义为权力者服务。在当代的中国，意识形态兴趣只在于服务于权力和党，这个制度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广场》有两个遗产，一个提出公民自主、独立思考、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中共的暴力意识形态的宣传。从长远来看，《广场》所提出的公民自由、独立思考、非暴力抵抗极权主义，也将对新极权主义提出挑战。

(文稿根据录像记录整理)

# 家天下党天下和反右运动

## ——纪念反右运动 50 周年

党治国

作者简介：1936 年生于陕西韩城党家村。1954 年以陕西省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 年打成右派，当农民两年，矿工十年。文革中判刑 20 年，10 年后平反。1989 年出版《理论信仰现实》。1994 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误》。1996 年从西安市社科院退休。退休后仍奋力笔耕，写论文、评论、随笔等百余篇，代表作有《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传统的力量——长篇文学评论》等。反思中国历史的思想性兼故事性五卷巨著《资识通鉴（<资治通鉴>选评）》，200 余万字，已完成二卷。2004 年受洗皈依耶稣基督。他这次未能出席会议，本文是他提交给会议的讲稿。

中国的反右运动，历来已久，文字记载，已有 2800 多年历史。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右运动，就是周厉王姬胡先生发起的“监谤”。《史记》载：周厉王姬胡残暴苛虐，奢侈骄傲，周国人民对他多有埋怨。召公（姬虎）极谏：“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厉王发怒，征集一些卫国的巫师，监视人民的不满言论，报告厉王，将不满者杀掉。这些因言贾祸的人，就是最早的右派分子。此后不满言论大为减少，但是诸侯却不再来朝贡了。厉王 34 年，对舆论的控制更加严厉，国人都不敢说话，道路以目。厉王很得意，告诉召公：“我能够消除不满言论，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不过是阻塞了言论的通道而已。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

多。人民也是这样。所以治水的方法，在于疏决导引；治理人民的方法，在于使他们说话以宣泄不满。……如果封住他们的口，能维持多久？”厉王不听，国人无敢言者。这样过了三年，到了公元前841年，周国人民相约反叛，袭击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国（今山西霍州东北），14年后死在那里。厉王出逃后，由召公、周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掌朝政，史称“共和”。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反右派运动则是从前844年开始的。

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始于夏禹的儿子夏启。夏启之前的黄帝、唐尧、虞舜，直到夏禹，是“天下为公”时代。那时没有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流传下来的美谈反而是：“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间，舜有总章之访。”（《文中子中说》）合宫、总章是黄帝、虞舜办公的地方，他们在那听取、询问民众的意见，尧则道旁筑室，以采民言。甚至夏禹也有“闻善言则拜”的美好记录。

夏启开始的家天下，具有天然不合理性。直到西汉时期，人们对天下为公的传说记忆犹新，见之于许多大臣上奏的表章中。可以设想，民众对周厉王暴虐骄奢的怨言，少不了拿天下为公说事，从根本上否定周厉王统治的合法性。对于周厉王来说，这实在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怪不得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右派运动，导致了自己的流亡至死和周朝的衰落。

孔子“五十知天命”，深知天下为公之不可复，于是为家天下制定了“君君、臣臣”的伦理规范。君主制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民才能像臣民。如果君主不像君主，就莫怪臣民不像臣民了。随着家天下的日益巩固，用天下为公否定家天下的人日渐减少，务实的臣民们就用“君主不像君主”来否定昏暗暴虐君主的统治合法性。对于君主来说，这当然最可怕。于是这类言论，就成为统治者压制打击的对象。

在中国文化中，以右为上，以左为下。好不过的事情或文章，称为“无出其右”，荒谬的事情则称“左道旁门”。而在英文中，右 right 又作正确解，左手 left-hand 则含“不合理”之解。金克木先生《读黄万里先生〈治水吟草〉率题一绝》云：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

沙塞巨川。

黄万里先生《敬和金克木先生惠诗》云：

贬左面南尊右冠，中西同义释非难。常人惯作雷同调，异曲惊天震百川。

“南冠”词出《左传》，原指楚囚，后成为囚犯的代称。金克木先生的诗，指出右派实乃囚犯中的以言肇祸者。黄万里先生的诗，则指明所谓“右派”，实际上恰是正确的一派。（他在诗后注释：按中西文，右字皆兼作正确解，中文左作错误解。）专制统治者压制的，永远都是正确言论；他们从来不害怕错误言论。当一种言论的正确程度超出了统治者所能容忍的限度时，言说者就会受到打击迫害。所有的右派受迫害，都不是因为“犯了错误”，而是因为“犯了正确”。

站在“天下为公”的高度，所有家天下的君主都会受到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暴虐的统治者，还会在君主制的范围内，受到“君不君”这一层合法性质疑。于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针对这两类质疑，经常性的反右斗争就成为专制政权的需要。

公元前 178 年 5 月，汉文帝刘恒发布诏令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鼓励人民发表意见的旌旗，在木板上书写批评政府的‘诽谤之木’，目的是上下通达，招徕劝谏之人。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之罪，使得众臣不敢尽情讲话，皇上也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样又何以招徕远方的贤良呢？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对“妖言”罪，公元前 187 年（高后元年）就废除了一次。现在再一次废除，是前一次的废除没有生效，还是废而又复，或者竟是吕雉不过借废除“妖言”罪之机，演出过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由于吕雉称制在大臣心目中缺乏合法性，后者的可能性很大。何谓妖言、诽谤？刘恒的诏书，有比较具体的说法：“人民诅咒皇上，或者互相约聚在一起谩骂皇上，官吏就认为他们犯了谋反的大逆之罪；如有其他不满言论，官吏又认为他们诽谤朝政。发生这类事情，都由于小民的愚昧无知，判处死刑，朕认为极不可取。从今以后，对这类事情一律不理，不追究。”这一年是刘恒执政的第二年，他要废除的当然是吕雉时代打击得非常严

厉的“妖言”、“诽谤”罪。可知昔日“妖言”、“诽谤”的矛头，直指吕雉政权的合法性。刘恒身为刘邦少子，又实行开明政治，不存在统治合法性危机，正可以通过废除这两项罪名，巩固其执政地位。对比 1957 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文革期间的《公安六条》，可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确实没有实质性进步，常处在汉文帝之下。

家天下对于天下为公，是第一类不合法性；暴君统治对于君主制，是第二类不合法性。世界政治史表明：与农业文明对应的，只能是君主制；与工商业文明对应的，必然是民主制。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中国人逐渐认可了家天下的君主制，第一类不合法性在中国人心目中日渐淡出。“妖言”、“诽谤”的矛头，主要指向第二类不合法性，即暴君的统治。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反右运动，都出现在暴虐君主统治时期。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固然是一次相当规模的反右派运动，明清时期频繁出现的“文字狱”，无不是残酷苛虐的反右派运动。由于家天下的接班人制度（由皇帝指定太子），不可避免地会选定一些饭桶或混蛋，成为昏暴的统治者，从而引发国人的“妖言”和“诽谤”。这就是昏暗、暴虐的专制政权必然要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在君主时代，不断发动反右派运动，是昏暗暴虐的专制政权奉行不悖的基本原则。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储安平先生用“党天下”三个字，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它的本质。“党天下”是家天下的继续和发展，不但垄断了一切权力和经济资源，而且垄断了真理。在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党天下之缺乏合法性显而易见，因此反右派运动就更加是它的基本原则。家天下的反右派运动，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党天下那样的规模，据官方发布的资料，1957 年竟打了 552,877 名右派分子（实际上要多得多），创下了中国也是世界历史的纪录。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之所以能把事情做绝至此，原因并不是策划这一运动的毛泽东和具体领导这一运动的邓小平、彭真等人，个人品质特别苛刻凶狠，而是别有深层原因在。

古代的家天下，虽然时有暴君出现，总体上还是比党天下温和得多。《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本意，并非君主垄

断一切土地资源，而是在王权统治的土地上实行王道。在中国文化中，“王道”的内涵是相对和谐的社会，以西周为典型代表。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西周相对和谐的礼乐制度不再适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天下大乱。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体现王道的井田制被否定，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建立于其上的恒产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于是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出现了，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长达 500 年的“百家争鸣”时代。恒产制度、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百家争鸣的局面，被嬴政建立的皇权大一统制度中止了。然而已经发生的变化，很难全然抹煞。此后，在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虽然统治者曾多次祭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法宝以侵犯私有土地，但在正常条件下，一般都能尊重臣民的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不会轻易侵犯。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在这种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回旋余地。一些高世之士可以隐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回乡耕种那“将芜”的田园。隐居也好，“归去来”也好，私有的土地和财产是必要条件。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知识分子，只要不采取有组织的对抗或执意传播独立思想，一般尚不致成为反右派的对象。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则不然。反右运动的背景，是 1950 年消灭了地主经济后，1955 年又通过农业合作化，消灭了富农、富裕中农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接着又在 1956 年通过工商业改造，消灭了城镇的私有财产制度，从而实现了全社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土壤被铲除了。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期，以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为前提。滑稽的是，1957 年，在铲除了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基础之后，毛泽东却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由于中国人太缺乏幽默感，毛泽东这一恶意的搞笑，竟然酿成了千古悲剧。问题并不是阴谋、“阳谋”，不是“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也不是向右派赔偿道歉。凡是党天下，包括瑞金和延安时期，反右派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区别只是不断地改变方式而已。打“AB 团”是反右，延安整风是反右，戴右派帽子是反右，“反右倾”是反右，打倒走资派是反右，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反右，清除精神污染是反右，反自由化是反右，禁止某些人或某些内容的著作出版也是反右……。只要反右派运动的土壤还在，它就会一年又一年变换方式地继续下去。

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化，不过是半瓶醋，一句“千夫就是反动派”，就是最好的注脚；对西方文化，则是“三个蛤蟆跳下水——不通不通又不通”。但他竟然以“伟大导师”自居，被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顶礼膜拜，视其为无所不知的“上帝”。不是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了，而是因为广大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恒产，沦为“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的可怜人。孟子接着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士”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少数杰出人物，人们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苛求知识分子。当反右派运动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失去了生活源泉，被毛泽东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为求生存而无可逃遁。除了极少数下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决心的志士仁人，绝大部分除了乖乖就范，除了低头认罪，除了真心的或者违心的检讨，别无选择。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度指责，特别是对那些忍受了 22 年煎熬的右派分子求全责备，未免有失厚道。

我在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反驳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的发明，要害是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笔者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变成有产者。参加革命，因为神往“有了政权就有一切”，阿 Q 是其形象大使。掌握政权后，热衷的并非民主，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占有一切，使自己先富起来。现在中国虽然涌现出一批“有了一切”的富人，但没有一个人拥有一寸土地的所有权，这就使他们的财富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上，绝非“神圣不可侵犯”。

在中国，不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制度，反右派运动就不可能停止，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毛泽东说：“民主是手段”。在消灭了私有财产、全社会无产阶级化了的中国，诚然如此。对于共产党来说，民主可以是打倒国民党的手段，可以被用来开展反右派运动，可以利用“大民主”打倒刘少奇和走

资源，当然也可以在工作中用来集思广益，表现为民主作风。最近有一个共产党官员俞可平著文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则是手段说的延伸。任何“好东西”，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而一个活着的人，却不能说：“心脏是个好东西”。心脏无论好坏，都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人就会死亡。对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来说，民主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不管你认为它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都是非实行不可的制度，没有选择和商量的余地。中国的经济无疑已开始进入工商业文明范畴，必定要建立自己的私有制基础和民主制上层建筑。这种必然性，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显然，如果不改变这种畸形社会的所有制基础，一味从愿望出发，以为可以在政府垄断一切资源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种制度下，民主当然也可以被当作手段，通过扩大民主，促进私有制的逐步重建，以打造制度性民主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民众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

历史毕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发展变化着，我们庆幸地看到，大陆和港澳的资本家，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民主诉求，逐渐认识到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共产党内也出现了一批资本家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自己的利益或理念出发，加入推进民主进程的行列，与下层民众的维权运动合流。不必计较这些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和财富转移是与官僚勾结的结果，重要的是重建私有制，而不是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国度里寻找公平。因为即使不公平的私有制，也不会比消灭了私有制的制度更坏。即使那些靠官商勾结致富的人，一旦成为大量财产的主人，他们的财产就会受到极权政治的觊觎和威胁，从而迫使他们做出明智选择，把民主作为追求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民主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潮流。不仅暴虐的专制政权如今已经丧失了合法性，任何专制政权都从根本上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只有到了民主制度建立的那一天，像梦魔一样缠绕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反右派运动，才会真正进入历史博物馆。

# 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 以北京大学为例

王友琴

作者简介：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文革研究专家，著有《文革受难者》等书。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王友琴

## I 题目和方法

从“反右”到“文革”，从 1957 到 1966，相隔九年。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本文从受难者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和分析。（以下“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词都将不再带引号。）

从北京大学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反右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更为深重的迫害，被“斗争”和监禁，受到肉体和心理的戕害，有一批人被害死。另一方面，在反右中担任领导和积极分子角色的学校负责干部作为群体，在文革中也沦入被“斗争”的地位上，其中有一批人也被迫害致死。

受难者的遭遇指示出一条明晰的轨迹：相隔九年的这两场大规

模“政治运动”（这是反右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使用的称谓），总的来说就是群体性迫害及其发展。这种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迫害手段的更加野蛮，特别是所谓“群众专政”方法的普遍采用和校园暴力的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是迫害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不但在人数上增加，而且被迫害的群体种类也越来越多。

从受难者的角度切入反右和文革历史，不但出于对人的生命和权利的尊重的基本价值，也因为只有了解受难者才能认识这两个大事件，因为对人施行迫害是反右和文革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本文所用的材料，来自我在过去十多年中对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和仔细阅读，也来自我对大量经历者的调查采访。关于这两种资料来源，余英时先生曾在给我的《文革后难者》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孔子将其分别称之为“文”和“献”（“文献”是后来才变成一个词的）。在方法上，本文依然还是对“文”与“献”的探索的结合。由于大量受难者的资料从来没有被记载或报道，两种材料来源中，调查寻访尤其重要。

对于接受笔者采访的人，笔者深怀谢意。感谢他们为记录历史真相提供帮助。

## II. “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更深的迫害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在同书的1982年部分（那时“右派分子”回到学校办理“改正”即撤销原处分）说，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716个右派分子（890页）。两个数字不同，是因为后来又“补划”了17人。因前一次的数字分别说明了学生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人数，所以引用在这里。另外，据文革结束后的《人民日报》：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种处分的人842名。因为没有公布所有被“划”的人的名单，现在不清楚715和716之差别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 8983 人，教职员人数是 1399 人。北大总人数的 7% 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 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1957 年 7 月 9 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在文革后，这个讲话印刷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在北大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划右派”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执行的。非常恐怖的是，他制订百分比划取右派分子。也就是说，不管如何，一定要从人口中抓出某个预先确定的数额的人来作为“阶级敌人”打击。而且，这百分比是他一个人相当随意地决定的。

“反右派运动”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是权力当局以发表言论为犯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的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学校当局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这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第三，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学生被学校直接送去“劳动教养”而不设结束的期限，以至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达近二十年。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个坏身份。

文革中，北大的新权力当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具有了比原来的中共北大党委更进一层的权力，他们在校园里就建立了庞大的“劳改队”，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在学校里“劳改”，而且把他们剃了头发，对其中的女性则剃去半边头发，有专用名词称为“阴阳头”，命令他们在胸前悬挂写有罪名和他们自己的画上红叉子的牌子。后来，又在校园里建立了关有数百人的监狱，也就是被俗称为“牛棚”的地方，因为那里被关的人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在“牛棚”中，被关押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常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及心理上的虐待。在北大文革造成的 63 名受难者中，有

四人是被红卫兵学生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连“揭发”“批斗”“定性”这些“革命程序”都不曾有过，残忍野蛮，达到了新的高峰。

“右派分子”在文革前已经遭迫害九年，再加上文革十年，文革结束后又过了两年才得到“摘帽”和“改正”，全程长达 21 年。在笔者的采访中，有一名受访者，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同情“右派分子”，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右派表情”，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是长期受到迫害和压抑后形成的，明显到使人能觉察得到，连摘掉帽子或者“改正”以后都依然还在。

这种“右派面孔”表情，是长达 21 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形成的。这种表情可能因人们对苦难的司空见惯态度而被忽略，而大量的迫害事实也一直被排除在官方准许的发表物之外。下文是对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进行具体的描述。

## 1、被判死刑观察

在北大的 716 名“右派分子”中，就笔者了解到的，有五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反右时就有一名“右派分子”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北大学生发生身体冲突而被判处了死刑（因事实上并无伤害人身的事发生，文革后平反了）。一共有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 716 人的近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几乎每一百人中有一人。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北京大学一个学校来说也是非常高的比例。

五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中文系学生林昭（1954 年入学），1968 年被处死；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55 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 被处死；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56 年入学），1970 年被处死；历史系学生沈元（1955 年入学），1970 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54 年入校），1976 年被处死。其中林昭为女性。五人中三人在 1970 年被处死，是在文革的“打击反革命”运动高潮中。

林昭在上海被判处死刑，时间是 1968 年 4 月 29 日。那是“五一节”前，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见《解放日报》报道语。）。这是文革的庆祝节日的方式。

顾文选和沈元在北京被判处死刑。1970 年 2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 55 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沈元也在这份材料中（可见于笔者收集的这一材料照片。）。55 人中北大“右派分子”占了二人。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制造更大恐怖，如古语所说的杀一儆百。这份材料发出仅仅两个星期后，1970 年 3 月 5 日，他们被处死。

任大熊 1970 年 3 月 28 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1957 年他把北大图书馆英文《工人日报》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大清洗”杀害无数俄国人的报告，翻译了一些段落手抄后贴在学校阅报栏上供观看。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再被判处死刑。从笔者收集到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到，判处任大熊等 13 人死刑，没有援引法律依据，只写着：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所谓“一·三一”指示，指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 号文件。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同时，判决者判处他们死刑，甚至未声称他们有何反抗革命的行动。仅仅因为他们的“右派”言论或者思想，就可以把他们判处死刑。

由于未能对全部 716 名“右派分子”的下落作追踪调查，笔者对他们中在反右后离开北大人的文革遭遇缺乏全面了解，特别抱

憾的是至今仍不了解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下文记述的是留在北大校中的“右派分子”的遭遇。

## 2、在北大被迫害致死

笔者写有《63 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63 人是北大总人数的 0.5%，即每 200 人中害死一人。63 名受难者中有四人，英语教授吴兴华、历史教授向达、中国革命史教师许世华和图书馆学教授王重民，都曾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降薪降职处分。

吴兴华和向达都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牛棚”和“劳改队”。1966 年 8 月 3 日，吴兴华在北大西门内办公楼前“劳改”时，被强迫喝了水沟中从附近化工厂流出的污水中毒昏倒。红卫兵斥责其为“装死”。当天夜间吴兴华死亡，时年 43 岁。死后还被剖尸，不是为了医学目的，是红卫兵要证明他“对抗文革自杀”以罪加一等。

向达在 1966 年 8 月遭到残酷“斗争”，曾在毒日头下跪在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被斗，幸好没有从上面摔下来。9 月底他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他们的寝室的门被反锁，连夜间出门上厕所都不准。向达有肾病，排不出尿，全身浮肿，却不准送医院救治。他在 11 月 10 日去世。

他们是名教授，反右时受到的惩罚是吴兴华从三级教授降为五级，向达从一级教授降为二级。他们在文革前夕的处境，比起其他“右派分子”来算是有很大特权的，但文革一开始，他们首当其冲，被革命的铁轮无情地碾碎了。

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王重民在颐和园后山上吊自杀。他们的死其实不能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自杀”。他们是在遭到长期的迫害、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重大创伤之后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上文写到的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原因是 1957 年 5 月 25 日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述了他在 1955 年的“肃反运动”

中被冤枉监禁的遭遇。那天还有西语系学生周铎讲了他看到的公安局刑讯逼供的事情。结果二人都成为“右派分子”。周铎 1957 年被送去农村劳动，1961 年才被准许回校上课，1962 年毕业后在北大工厂劳动。文革开始后周铎一直在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袖子上戴了一个黑袖套，上面写有白字“右派周铎”。1968 年，周铎被关进了北大“监改大院”，最大的校园“牛棚”，位于现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馆的位置上。

同关“牛棚”的一位教授说，周铎挨打最多，裤子上总是沾满鲜血。红卫兵看守经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最疼。他们还常拿周铎寻开心，没事就大叫“周铎，过来。”然后用棍子打他的脚。他们打一棍，周铎的脚缩一下，他们又打一下，周又缩一下。有一次骡车拉东西来。饮骡子的时候，红卫兵命令周铎和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像骡子一样套上车拉着在院子里来回跑，他们看得哈哈大笑。周铎看起来像鲁迅写的“狂人”，样子可怜极了。

周铎后来转入西语系的“牛棚”。一个管牛棚的红卫兵学生每天踢开门进来（从不用手推门），全体“牛鬼蛇神”起立，这个人每次进门以后，首先就转向周铎，甩开膀子狠打周铎几个耳光。周铎在 1969 年被放出了“牛棚”，和他同住在那一间“牛棚”的西语系教授说，听说他不久后就死了，但不知道确切地点和时间。

### 3、被判刑

北大数学力学系王信中、程庆明、刘品馨是 1949 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都留校任教。1957 年中共北大党委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王信中写大字报批评当时人整人的风气。他因此被定为“极右派”，送劳改农场。

程庆明当时是该系的中共总支委员和共青团书记，在划定“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不同意把两个学生划上，被指控为“包庇右派分子”，以此为由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共产党籍，降职降级降薪。

文革中程庆明因和朋友私下议论文革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他曾经被绑在学生宿舍的一个双层床上，双脚离地，遭到毒

打。1969 年，他被作为“拒不坦白”“抗拒从严”的典型，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的“斗争会”上被逮捕入狱，一年多后判刑 12 年，送到山西监狱服刑。毛泽东死亡两年后，1978 年底他在刑期快满时被释放。

刘品馨（1931—1996）对两名同班同学被划为“右派分子”心存疑问，她没有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写在了日记中。文革中日记就可以成为定罪的根据（在这方面，请参看我的《摧毁日记的革命》）。刘品馨遭到长期“斗争”，不但在打人斗人的高潮 1966—1969 年被“斗争”，而且在 1973 年“反回潮”中还被揪上台“斗争”。她曾经被揪住头发打耳光（这样的暴行当时可以在北大当众发生不被制止）。遭到这样的残酷折磨后，刘品馨精神失常。1978 年底程庆明出狱后去看望，她已经丧失记忆不认识程了。她从未恢复健康，在 65 岁时去世。仅仅由于在日记上对“右派分子”表示同情，文革让刘品馨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在北大，很多根本不认识她的人听说了数学系的一名女教师因日记获罪。刘品馨的悲惨遭遇成为强有力的警告，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北大人都停止了写日记，而文革前在北大写日记的人相当多。

#### 4、“中右”也变成“牛鬼蛇神”

除了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 年北京大学还有未戴“帽子”而受各种处分的人 842 人。在文革中，这些人很多“升级”成为“牛鬼蛇神”遭到“斗争”和“专政”。

化学系教授傅鹰（1902—1979），1952 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在全校的会上作为正面典型发言，1957 年被划为“中右”（即比他右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文革中成为“牛鬼蛇神”。显然，划分“阶级敌人”的标杆在不断左移，越来越多的人被圈进去了。傅鹰遭到长期监禁和“斗争”。他先被关在化学系男生宿舍。白天由该系女生看管在校园里“劳改”，晚上由该系男生看管。连他因年老夜间多次上厕所也遭学生斥骂。后来他被关入学校“监改大院”里。那里一个当看守的女学生有个棒子。“监改大院”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她的棒子打东方语言

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按照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但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为此他也挨打。

傅鹰侥幸活过了文革，但是文革中北大的教授被害死的有10%。

## 5、高比例死亡率

尽管还未能了解所有七百多名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下落，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亡的比例非常高。

1952年燕京大学外文系有五名英文教授，除巫宁坤外，另外四名在“院系调整”中并入北大。其中两名男教授胡稼胎和吴兴华，都在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两名女教授俞大纲和赵萝蕤，自己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但是她们的丈夫，俞大纲的丈夫曾昭抡及赵萝蕤的丈夫陈梦家，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巫宁坤那时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送去“劳改农场”，受迫害最重。

如果说在1957这个燕京大学英文教授群体是“一网划尽”，那么文革就真成了俗语所说的“一网打尽”。上文已经写到其中之一吴兴华教授在1966年8月3号被强迫喝脏水而死。三个星期后，1966年8月25日，西语系红卫兵在40楼前召开“斗争会”，俞大纲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她的丈夫曾昭抡（1957后被派往武汉工作）在武汉大学遭到长期“斗争”，在1967年12月9日死亡。赵萝蕤教授的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1966年9月3日上吊自杀身亡。赵萝蕤被“斗争”，还遭到殴打，连文革前不久毕业留校的女助教都动手打她。她一度精神失常，后需长期服药控制。

胡稼胎的二儿子胡功管（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编导）和三儿子胡功范（四川峨嵋银行职员）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二儿子并被送到北大荒劳动。他自己成为“右派分子”后从二级教授降为六

级，不准上课，先在校园作体力劳动，后到北大哲学系翻译资料。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抄家”、“游街”和“斗争”。因为他早已是“右派分子”，而不是新的革命对象，所以“斗争会”上他总是“陪斗”（当时“斗争会”频繁，所以专门术语也发展繁多）。1966年10月他突然瘫痪。妻子把他送去北医三院。医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哲学系给医院的公函上写的是：该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请给予一般治疗。他没有能得到什么治疗就出了医院，1968年1月去世。

就这样，燕京大学留在北大的四名英语教授，文革中被迫害死亡三人，唯一幸存者的丈夫也被迫害致死。

### III. 反右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被“斗争”而死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文革中不但“右派分子”首当其冲惨遭迫害，在北大领导了反右的负责干部也遭迫害，有的被害死。

1957年领导北大反右的，先是中共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江隆基（1905—1966）。他在1959年被调往兰州大学任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文革中成为最早的受难者之一。中共甘肃省委在发动文革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把江隆基作为该省的重点对象。6月17日，他遭到“斗争”，跪在高台桌子上，头上戴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6月22日，他再次被“斗争”时下跪、戴高帽子、被拳打脚踢和“游街”。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亡，时年61岁。

江隆基192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对“革命”和“斗争”经验丰富。他在1956年被定为“高校行政一级”，是当时中国高校中级别最高的人之一。他显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是他被“斗争”后，没有申诉也没有等待，很快就自杀，显然他理解革命的本性更为透彻。他是一个被“打倒”的群体中的一个，就像“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一样，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如果不想继续被打被侮辱，只有自杀。学校领导人是

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无一例外被“斗争”。他们遭到学生红卫兵的殴打折磨，有一批校长被活活打死。（请参看笔者《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江隆基被认为在北大反右不力，国务院于1957年10月派陆平（1914-2002）到北大取代江隆基当第一书记。陆平在江隆基已经划了五百名“右派分子”的基础上，进行“反右补课”增划了二百名（“补课”本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用语，却被用到了反右大迫害上。人类的学校史上，哪里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迫害课程？）。这样，北大的“右派分子”就从北大总人口的5%增加到了7%。此后到文革前，陆平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两个职务（江隆基只任副校长）。大学校长从教员中产生的传统也就此被彻底打破。文革开始，毛泽东亲自下令向全国广播北大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并把北大称为“反动堡垒”。陆平成为全国闻名的“黑帮”，遭到长期的“斗争”和关押。他曾经被吊起来拷打。北大学生还用高瓦数电灯强光照射他的眼睛不准其睡着，说这样可以扰乱他的神经，迫使他“坦白交代”。

中共北大党委副书记、教务长崔雄昆，也是“反右派”的领导人之一。文革开始后，由于他曾经在1964年反对陆平，他成为“左派”并进入新的北大权力机构核心，而没有像其他北大领导干部那样被指控为“黑帮分子”。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整肃。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中担任领导人两年多后他也被整肃，结果，1968年10月他在校内红湖投水自杀。

由于文革把整个教育系统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结果，那些在1957年领导了“反右斗争”并在此后执掌北大的干部，除了极个别人，都被“打倒”了，有的也被迫害致死，他们的遭遇就像九年前由他们经手“划”的“右派分子”。

他们当然不是受到了“右派分子”的报复，因为文革中“右派分子”处于比他们更恶劣的处境中。也不能说他们是受到了“恶有恶报”的“报应”，因为还有大量和他们一样在领导反右的人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们被迫害，就是因为毛泽东发动和规划了文革，

把他们这一个群体列为文革的打击对象。

他们先扬后抑的经历，甚至形成了一种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戏剧性效果，不过并非出现在舞台上。遗憾的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分析他们的遭遇并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包括他们中最有学识和写作能力的人。

翦伯赞（1898—1968）是这样的人之一。他在 1937 年加入共产党，历史学教授，1952 年起任北大历史系主任。1957 年反右时他相当积极。笔者检索《人民日报》发现，在反右高潮中，从 1957 年 6 月 15 日到 10 月 19 日，四个月中该报有九篇报道，述及翦伯赞在历史学界、社会科学界、文物界的一系列反右会议上用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该报上还有他写的两篇反右文章，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是为了革命》（1957 年 9 月 23 日），另一篇是《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1957 年 10 月 4 日）。两篇文章攻击历史学界的两位重要教授雷海宗和向达。二人后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雷海宗 1962 年去世，时年 55 岁。向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可见上文。

1965 和 1966 年，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多次点了翦伯赞的名字，把他作为学术界文革的重点对象。指控翦伯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为革命研究历史》，竟与上述他 1957 年指控右派的文章标题同出一辙。罪名很快升级，1966 年 12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题为《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从 1966 年 6 月开始，他在各种规模的“斗争会”上被“斗争”，最多时多达一天被“斗争”六场，“斗争”方式是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即身体被强制成双臂后举大弯腰。他被“游街”、抄家及驱逐出原住房。分给他和妻子的一间小黑屋（在蒋家胡同三号院内），是在两排房子接缝处加出的，原来用于堆放煤块等，面积极小，到处漏风。他们在门口放一煤炉做饭熬药，附近的孩子常来往他们的锅里吐吐沫和丢脏东西。

1968 年 11 月，在正式宣布刘少奇的罪名并将其开除出党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毛泽东说，要把翦伯赞等作为“反面教员”“养”起来。他被从“牛棚”中释放，被分配到条件较好的住房。一个月

后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婉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翦伯赞夫妇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时期。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计算比官方公布的反右划取“右派分子”55万人还多。

应该说，翦伯赞的死实际上包含有抗议的意味。但是在他简短的遗书中，他没有抗议他所受的迫害，相反，他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对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他死时文革已经开始两年），对1957年被他指控为“右派分子”的向达之死（他死时向达已经被害死两年多），对他当了积极分子的反右和当了打击对象的文革，对于发生在他周围的迫害和死亡，他作为历史学教授却没有写下片言只语。是他不敢写，还是他不曾思考？或者，是因为在他看来太难说清楚？

也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活过了文革的和翦伯赞身份地位相仿的人，也没有能提供他们的内心经历和对这一段历史作出必要的解释。他们对历史的记载、解释和评判的缺乏，只能使他们的后人意识到反右和文革的强大效果：不但摧残了一批人的生命，而且摧毁了他们原本应产生的思想。他们没有写出什么这个事实本身也令人震动和悲哀。

## IV 分析和解释

### 1、北大案例的高度代表性

北京大学反右划了716名右派分子，北大文革造成了63人死亡。其他高校也相仿。清华大学反右划了571名“右派分子”，清华文革造成了58人死亡。清华58名文革受难者中，至少有二人是“右派分子”。北京农业大学反右划了143名右派分子，全校有13.4%的教授、副教授，4.7%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北农大有30人被害死。

各大学受迫害人数呈现明显的均匀现象，显然是因为反右和文革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而北大因其“最高学府”的特别地位，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是打击对象，有大批师生员工遭到残酷迫害，另一方面又是迫害样板，中共中央

多次发出内部文件或者通过公开报刊，把北大的做法介绍给全国效仿。这种情况使得北大作为一个案例极具代表性，因而也更值得分析和解释。

## 2、反右和文革是大规模群体性迫害

在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反右和文革，都造成了一个数字巨大的受难者群体。也就是说，二者都是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笔者看来，这是二者主要的也是共同的特性。

反右和文革都不是针对个别人的。“右派分子”后来和别的“敌人”范畴并列为“地富反坏右”，又称“五类分子”。这是一个“类”，而不是个别人。这个“类”人数众多，可以百万计数，到了文革，在已有的“五类分子”之外，又加出了多个种类。例如，1969年的北大一份题为《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该年7月上旬到9月2日，在北大的教职员中，清理出了“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地富坏分子”共102人。这份报告由毛泽东批示“照办”后发给全国学习，编号为“中发[1970]17号”。也就是说，在全国各地都要抓出这些“类”的“阶级敌人”来。在北大，三个月“清理”出的“阶级敌人”数字占教职员的2%还多，在全国显然会制造出一个极大的绝对数字。

除了立“类”之外，还制定百分比，以确保每一类都能填够配额。北大的“反右”，先是按照5%的比例划的。“上面”嫌5%不够，北大就进行“补课”，增加到了7%。

在苏联档案中存有一些关于杀人和关人的命令。1937年7月30日的一份，列出各个加盟共和国要杀的人数从100到2,000，同时还另外列出了数倍于此的要逮捕入狱的人数。这样的命令非常恐怖：不但在于数字大，还在于其随意选定“敌人”的数字。同样，毛泽东以百分比来划“右派分子”，也是同样恐怖。

## 3、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级与扩大

上文已经描述，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

更深处，在 1957 年还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关进了“牛棚”，甚至连反右的积极分子也被置于死地而丧生。一方面，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另一方面，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

不仅事实表明如此，从两次“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中上，也可以明显看出。1957 年，他创立了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他把公民分为两种，“人民”和“敌人”，至于谁是“敌人”一类，则是由他规定的，比如“右派分子”。按照当时的宪法，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是毛泽东说他们是“敌我矛盾”，他们就成了“敌我矛盾”。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毛泽东一个人规定的。在文革中，毛泽东进而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说，要把原来的革命更推进一层。在不断叠加的革命中，受难者越来越多越来越苦。

本文第三节叙述了反右积极分子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是一个明显的事，但是对此事实的解释，却并不一致。有的人以此证明文革的“荒唐”，非逻辑，打击了不该打击的人。这一说法似是而非，首先因为这多少等于肯定了反右。另外，看施害一方，他们的革命就是迫害，他们在逻辑上和行动上相当整合，在基本方面并不自相矛盾。

从理论到实践，文革领导人的改变意向是清楚的。江隆基和陆平这些领导了 1957 反右的人，即文革前的大学的领导们，在文革中全数都被打倒。如笔者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 20 名大学领导人之死时指出，这些人从未担任大学教员，由他们担任大学最高领导，已经改变了历来由教授学者中产生校长的传统。但是江隆基和陆平自己上过大学。文革开始，毛泽东就指控学校系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接着他派送了他的警卫部队中的迟群、谢静宜等没有受完中学教育的人担任清华和北大的负责人，直到他死亡。在这种暴力迫害的同时，毛泽东一步一步改变了教育体制。

还有一种解释离开事实更远，即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在文革中“造反”，反对迫害过他们的人。实际上，文革领导人对镇压右派分子颁布了一系列明确规定。从北大案例可以看出，文革中“右派

分子”是受苦最多的群体之一。至于反右积极分子被“斗争”，决非出自“右派分子”的报复，而是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指挥。

#### 4、这是一种什么犯罪？

杀一个人，就是犯罪。杀害了数字如此巨大的人，侵犯了如此多的人的自由、人权，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残酷惩罚了那么多人，当然更是犯罪。

但是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记述和判断却有很大不同。在反右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那一边，他们称之为“伟大的革命”。直至今天，在反右和文革的同情者眼中，注意的是当时作为驱动力量一方的“理想主义”和高昂欢乐的情绪，他们回避提及受害者一方的苦难，更不承认这是一桩罪恶。

在毛泽东死亡两年以后，邓小平和胡耀邦为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平反”，在人道方面的功劳应该被记入史册，当然也是因为发生过的迫害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为这个庞大的受害者群体的悲惨生存状况作出了一些实际性的改善。但是，在说法上，他们仅仅称此行动为“平反冤假错案”，似乎这些都是个别性的案例。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而且他们自己也并不真如此认为，否则不会给 99%以上的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一起都平了反，而不是只给其中的一部分人甄别。

对于反右和文革的反对者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应该把它们称为什么样的罪恶？显然这是一种巨大的罪恶，然而既有的关于罪恶的名称，谋杀，盗窃，投毒，诽谤等等，却难以被用来指称这样的罪恶。反右和文革罪恶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这些罪恶，但是这些名称只有很小程度上的适合，因为这些罪恶杀害和迫害的人数，都不可能与反右和文革相比。普通的罪犯，即使是惯犯或系列杀手，也不可能危及如此巨大数目的受害者。只有战争会危害如此多的人口，但是战争主要由军队持武器进行，而且战争是两军对垒的冲突，相当不同。

在现实中，没有名称的罪恶就可能不被认为是罪恶。反右和文革的的罪行不但需要得到记录，而且需要命名。

在抵抗和清算希特勒纳粹的漫长过程中，一位名叫 Raphael Lemkin 的学者，用其毕生精力创造并推广了一个关于罪恶的新词 genocide。在 Lemkin 和其它人的长期努力之后，“群体灭绝罪”成为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罪名。“群体灭绝罪”是指蓄意全部或者部分消灭某一群体，包括杀害该群体的成员，造成该群体成员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该群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毁灭其全部或部分的生命，强迫这一群体的儿童离开他们等等。这种群体，是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等理由划分的。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行动，就属于典型的群体灭绝。在那里，被迫害、监禁、罚作苦役以至被杀害，最重要的“理由”（加上引号，因为这仅是作恶者一方如此认为的）是该人属于“犹太人”这个按照民族划分的群体。

这个模式是否适合反右和文革？在人数上，显然是的，在群体性方面，显然是的。不同的是用来划分这些群体的“理由”和名称。

## 5、历史的审判

在反右 50 年后和文革 40 年后，在书写和传播技术如此便利的电脑网络时代，已经有条件来做历史的审判，也就是通过历史写作来审判罪恶。

这种历史的审判是有意义的吗？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在北大建立了一个“梁效”写作班子，发表了大批文章，主要内容是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其中一篇文章题为“略论秦始皇暴力”（《人民日报》1974 年 1 月 21 日），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谴责的秦始皇大加赞美，并把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镇压反革命”直接等同，也就是说，要从历史的高度来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体性迫害与杀戮。

现在回头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影响很大的“梁效”，也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能和秦始皇一样大规模“焚书坑儒”的统治者，毕竟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也只出现过一个。是什么力量起了阻挡作用呢？应该说，在秦始皇后两千年来人们把

“焚书坑儒”当作罪恶来记载和谴责，这些历史评判尽管以现代标准来说还不够深刻，却多多少少起了作用。

这个历史的纵向观察告诉我们，通过历史写作对罪恶做出审判，在文字上、学术上对历史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虽然不能像在司法系统中审判罪恶一样有力，但是并不完全无用。所以，对反右和文革做出历史的审判，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

# 从“反右派”到“大饥荒”的必然性 ——对河南“反潘杨王集团事件”的案例解析

姚监复

我不是右派，因为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只找过支部书记说过一句话，我说，毛泽东思想不准确，毛泽东说不要考试，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每星期都考试。我说，这个毛泽东思想说不要考试不也是毛泽东思想，应该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没定我是右派，但写到我的档案材料里。文化大革命时被查出来，支部书记作证，过了十年，我算是“漏网右派”。完了，我的支部书记也分到一起，又把我 64 年说的一句话揭发出来，我说，建议毛主席和江青离婚。第二天，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最后，红八月的时候，一个晚上，我妈——一个小学教员，被打死了。我父亲是国民党的上校，但是是起义军官，是遣返对象，第二天就上吊死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我非常感谢金钟先生出版的、王友琴编的《文革死难者》，他们的名字和很多死难者的名字在一起。我的意思，不是讲他们的苦难，而是让苦难不要再现。

2004 年 3 月 5 日，我有机会和中共领导人一起去见赵紫阳。赵紫阳对我说：“我担心知识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结合起来形成特权阶层，工农边缘化，会不会左派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煽动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复员军人、没安排好的离退休干部，用经济内容为口号，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因此我希望文化大革命不要再出现，反右派不要再出现，我不想以暴易暴，去用复仇的办法解决过去的问题。我希望理性地思考，言明和解，承认错误，赔偿，最后和解。南非能够做到，中国也会做到。”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反右和巨死亡。二十世纪，有三次巨死亡，希特勒一次，斯大林一次，毛泽东

一次。这巨死亡，河南省是个关键。因此，我想找“潘杨王集团”三个人，杨觉在我们那，94岁，他说我不能讲更多的了。我就找王庭栋，当时的省委副秘书长，他的资料很长，我做的记录。

我讲的情况，摘自我记录的材料里（“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谈：1958年的河南省‘潘、杨、王事件’”）。其中提到：

1、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企图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打成“右派分子”、“极右分子”。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二书记吴芝圃公开说第一书记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一拍手，就定了。第一书记被撤销，吴芝圃变成第一书记。然后就批判“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批评内容里面有一条：潘复生认为，右派分子不能超过参加运动人数的2%，不应在县以下开展反右运动。吴芝圃揭批“潘杨王”以后，又来了一个反右补课，全省划了7万右派，占全国55万的14%，全省干部的15%。县以下单位、中小学、工厂、农村也都划右派。全省上下在反右后，噤若寒蝉，唯左是从，毁掉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

2、吴芝圃批判“潘杨王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行，创造性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在河南创造了人民公社。

吴芝圃以极左路线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政治上、组织上批倒斗臭以后，又从党内到党外、从省委到基层、上上下下批判潘杨王的农村政策，包括自养牲畜、自留地、包工包产、自由市场、小块废地种树个人所有等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认为潘复生用“小农经济优越论”，反对统购统销的“右倾错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吴芝圃创造性地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在河南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吴芝圃带领河南高举人民公社是天堂的旗帜，带领河南人民，后来是全国人民跟着毛泽东、吴芝圃走向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人间地狱。

3、吴芝圃在河南公开批、层层批大小“潘杨王”，干部人人自危。造成全省性长期性从上到下的层层说假话、浮夸风。

1958年粮食实际产量281亿斤，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实

产 194.9 亿斤，吴芝圃高估为 450 亿斤。浮夸风下高估产，又高征购，1958 年征购 80.8 亿斤，1959 年征购 72 亿斤，两年多征购 60 多亿斤。信阳地区 1959 年产粮 20 亿斤，估计为 72 亿斤，超额征购粮食，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反右派、反右倾后，吴芝圃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得势的后果，是经济上的大失败、社会上的大混乱，最后是善良无辜的农民的巨死亡。

#### 4、反右派斗争、反潘杨王集团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信阳地区有的县非正常死亡超过 10%。河南省很多人都认为，大饥荒跟原来的政治运动有关系，跟“反潘杨王事件”，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有关系。纪登奎告诉我，省委常委会上，讨论时举手表决：赞成河南今年粮食 300 亿斤的举手、400 亿斤的举手，500 亿斤的举手，然后根据你举手来决定你是右倾还是正确的。所以最后大家都不说真话。

5、董必武为书记的中纪委调查了信阳（饿死百万人）事件后，毛主席批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民主革命不彻底，看来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然后吴芝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跟 10 个县委书记定为反革命，报给邓小平，建议枪毙。把责任推给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县饿死这么多人，枪毙 50 回都也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

1962 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问“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主持会议的金明说：“看来人聪明一点。”毛泽东说：“不尽然，猪一头撞到南墙上，过不去，它知道会回来。有的人不知道会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毛泽东又把责任推给吴芝圃，吴芝圃又推给地县，第一书记又开会批判下面的基层干部。

还有一个问题，邓小平有没有责任？我发现官方的《毛泽东传》里透露了一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问题”的事，这是 58 年 11 月毛泽东指定吴芝圃总负责起草一个新的四十条，代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史

向生负责。毛泽东把吴芝圃放在比四个省委书记还高的位置搞这个材料。这个材料的内容是，超高指标，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后来根据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最后，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这个纲要四十条起草，最后，叫“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这说明邓小平是参与和负责了大跃进的设计的。

河南 1957—1958 年反右派斗争和反右补课，1958—1959 年反右倾斗争，使极左路线在政治、思想上占了统治地位，贯彻到经济工作农村工作上，形成五风盛行局面，河南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走在全国反右倾的前列，冒进得最远，对人民危害也最烈，所以，反右派与大饥荒、巨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这是中国有历史的连续性与必然性的苦难的历程。

吴芝圃，这位曾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把中国的好农民带领着进入了走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人民公社，却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地狱之门。面对成百上千万活活饿死病死的亡灵，作为应永远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从内心感到羞愧、忏悔和罪恶感？为什么从大跃进、反右、到文革，我们认为口号是崇高的，目的是残酷的、卑鄙的，后果是惨痛的，但所有人的良心到现在都是平静的。为什么至死也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份像样的良心终于发现的深刻的检讨和“罪己诏”？难道，过了半个世纪，一个郑重的党、一个严肃的对待自己严重的错误、过失的党，对自己领导下的政权造成上千万人无辜死亡的罪恶，不能作一些认真的反思吗？那样的话，你是严肃的、郑重的党。这样不作反思，能良心平静地告别世界，去面对冤魂吗？对得起那些“听话、相信党、遵纪守法”、活活饿死而不抢粮库的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和他们的后代吗？

那些为人民牺牲的烈士，难道是让人民在自己的政党的领导下活活饿死？怎么对得起牺牲的烈士？为什么人民政权的领导人，像吴芝圃式的第一书记们把人民带向苦难的死亡深渊，最后可能在他们的墓碑和史上，说他们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那些死难者的人，连名字都没有。这是为什么？要是用革命的名义的话，这些人应该愧对烈士的英魂。

我们必须反思历史上的教训，马克思说过：“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对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8页）

最后，我再讲一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出现很多可笑的事。我曾经写过笑话，一个就是“永远健康，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在群众大会上，允许他们在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2003年在一次与贵州客人聚会时，我谈到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的故事，大家哄堂大笑后，朱厚泽说我：“是你编的吧？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怎么不知道这个口号？”我讲：“这是1967年夺权高潮后一段时期的流行颂词。那时你在那里？”朱厚泽说：“那时我在劳改。”我讲：“可能你没有权利同革命群众一起祝福统帅、副统帅和省军区司令员的健康。”一位县委书记说：“老姚讲的是真的。我们县当年几万人开群众大会时，在祝福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后，我们大家都喊过：‘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的口号。”县委书记又补充一句：“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祝福县革委主任的口号。”我赶紧问：“比较健康之后，祝福什么健康呢？”县委书记说：“敬祝县革委主任张三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几万人同声祝福领导“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想万寿无疆的，也就83岁，永远健康的，也没有永远健康，

摔到温都尔汗。我们上万右派分子，受了各种苦难，还能活着，非常可贵。会议给我们准备了条件，希望大家都能写下这些东西，留下来。我祝愿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右派分子，和像我这什么补的右派，或其他什么派的分子，大家都能健康地活着，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我们不会万寿无疆，也不要永远健康，祝同志们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本文根据录像整理记录。作者简介，请参阅前文。）

# 性格决定命运，然后相反并且循环

## ——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在1957年前后

齐家贞

作者简介：父女两人同为政治犯，在狱中度过漫长的苦难岁月。现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文坛活跃的作家，著有自传《自由神的眼泪》。现居澳大利亚。



齐家贞

### 一 问题的提出

人们习惯于把若干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然后说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人来说，五十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时间长度。

1957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全名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的进攻”（简称“反右”）的那场运动到今年五月，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无论全名还是简称都极具中国专制特色：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号召全国人民来反击占人口百分之零点一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然后强行剥夺这些人的正常工作，要他们去劳动改造。

五十年来留下了一些反右的文字：右派数量的统计，右派个案的描写，运动前后历史档案的解密，阳谋还是阴谋的争论……比较

遗憾的是，这么多文字里面，几乎没有看到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性格弱点对这场运动的影响，运动又加重了这种性格弱点，并继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夸张地说，这场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此后的五十年间，这个阶层在整体上几乎没有再发出像样的不同声音。使共产党政权从此更加肆无忌惮轻而易举地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发生最荒唐可笑的文革浩劫只是时间问题了。

反右是当时中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政治镇压；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这种迫害和镇压，当然主要源自外部原因，但也并非没有其自身的因素。本文主要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来探索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和必然，旨在总结历史经验，避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蹈覆辙。

## 二 纵向分析

###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

精神上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翻开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的文字史，很少看到“独立”“自由”的思想火花。近代虽然有过 1920 年胡适等七人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有过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储安平的《客观》、《观察》周刊，有过 1947 年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有过五十年代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做学问态度，但这些声音从未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调。

组织上需要皇帝，渴望被领导。这一点是上一点的自然顺延，也是必然结果。“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人生选择。他们脑子里都有一篇向皇帝表明心迹的《出师表》，内心深处祈望皇帝能“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然后委以重任，他们愿意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道德上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意识。中国传统文文化中虽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做人标准，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奉行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一旦“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通，或在官场上遭遇挫折，多数人会激流勇退，标榜“出污泥而不染”，从此退居山林，不问政治，消极遁世做隐士，静待下一任明主“三顾茅庐”。

49 年以前的国民党政权虽然也是极权制度，但还给知识分子一点说话的空间。其它党派虽然不能执政，但可以不受执政党的领导。骂政府的话虽然难听，但鲁迅的书还让你出……当时的储安平已经看到，“国民党的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很难看到这一点，他们坚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做得好，因为当时共产党在这方面信誓旦旦。

49 年开始随着共产党由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所作所为开始逐渐背离它原来主张宣传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到 57 年前，它的一系列针对外部敌人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肃反；针对内部对手的高（岗）饶（漱石）案、潘（汉年）杨（帆）案、胡风案；针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喜饶嘉措大师批判、虚云大和尚批判，已经开始使人恐惧、寒心。但当时共产党的政权尚不巩固，还不能一下子走到极端，还需要一点门面。应该承认，57 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点言论自由的，不过空间已大大缩小。敏感的知识分子们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不开心，憋着一口气，他们开始小心翼翼，说话谨慎，他们需要而且必须见风使舵，窥测方向。

57 年共产党居然让知识分子说话了，皇帝赏脸了，而且是鼓励、纵容知识分子说话，说不满的话，难听的话，这让知识分子们兴奋不已。3 月 24 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歌颂共产党的开明开放政策，希望共产党创造一个让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说话的社会环境。没想到共产党不给知识分子面子，甩手一个大耳光，费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信号弹。这次是名副其实的“蜜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几个月，以致关于这场运动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争论了几十年。

当然也应该看到，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尤其是一些大右派，大多在早年受过儒家启蒙，后又受到西方民主的熏陶，超时代超朝代的普世价值比较符合他们的思想和期望，这在极大程度上与共产

党的理念是相左的。

57 年后的状况比较清楚了，经过这场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集体鸦雀无声。只有极个别的如林昭，“每当想起那惨烈的 1957 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如写《新人口论》遭批判的北大校长马寅初，59 年仍敢《重申我的请求》：“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后果更为惨烈，林昭被从肉体上消灭，马寅初的观点一直到中国人口爆炸成灾后才被承认。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无论是五十年前还是五十年后，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反复强调自己公开和骨子里都不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那个未被摘帽的“五大右派”之一的罗隆基说得更明白：尽管我是资产阶级，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对我有什么好处。

而费孝通则在《认罪书》中坦承：“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从此永远老老实实跟着党走”。

许多右派当年遭遇厄运一开始虽觉冤枉，但经反复批判斗争，教育洗脑，后逐渐自觉对不起党和人民，自觉应该彻底改造思想转移立场。因此，当有一天党给他们摘去帽子时，他们从心里感激涕淋，为回到革命队伍欢欣鼓舞。直到有一天上面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他们的激动达到了高潮。他们从未把自己看作独立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关系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的说法完全认同。这跟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建国初期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甘心成为共

产党的附庸，其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成为共产党的部长，享受4至6级待遇，不仅有住房小车，还有勤务员厨师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发出独立声音的权利。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章罗）之所以还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声音，既有“五四”以来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影响，也有他们个人人格的作用，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专制面目也是一步步暴露的。

### 三 橫向比較

在西方，我们常能听到“我思故我在”，“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类独立自由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出现过，中国知识分子似乎缺少这方面的传统。即使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春秋“诸子百家”、唐代“贞观之治”，也只是统治阶级一时的宽宏大量；百家争鸣，所争所鸣多为不同的治国谋权之道。在中国，知识分子相信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做人准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前苏联有七十多年的共产极权统治，东欧这样的历史也不短。但对比苏联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写《日瓦格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捷克写《玩笑》的昆德拉，中国巴金在《忏悔录》中的“说真话”要弱了很多，刘宾雁表现的“第二种忠诚”使我们感情上动容落泪，理智上却无法认同；同样是剧作家、异议人士，中国高行健的《绝对信号》、《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剧多满足于形式技巧方面的突破创新。捷克哈维尔的剧本也注重形式革命，但他的《备忘录》《越来越难集中精神》等更关心思想内容和对大众的启蒙。前者是在法国，是在获诺贝尔奖后才发表《没有主义》的思想宣言，后者则在国内，在极权统治的七十年代中期，即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和参与起草《七七宪章》，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前苏联在五六年就开始比较彻底地否定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像至今还高悬在国家象征的天安门城楼上，而朝暴君像上泼污的勇

士却被自称反专制的学生扭获送公安局判重刑。同样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已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出于良知，以其大无畏的勇气、敏锐深刻的分析，和共产党集团彻底决裂，写出了《新阶级》这本批判共产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著作。相近的情况有匈牙利的卢卡奇，东德的布洛赫，而波兰哲学家科瓦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潮》在当时的西德则几乎成为文人学者案头的必备之书。在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我们不断听到类似的反抗声音：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变，布拉格之春。据统计，波兰每十年就有一次被称为“动乱”的反抗极权制度的运动。中国似乎正好相反，每七八年极权制度就有一次对文化的批判运动。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反抗极权统治的次数、规模以及鲜明、彻底，都远远超过中国。那些国家极权统治者的妥协让步以至最终的颜色革命，一方面是整个欧美民主力量的强大影响使然，另一方面也应该看作本国反抗者一代一代反抗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也随处可见。

另外，在西方，“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这样定义：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当然，他的知识分子概念不是我们中国几十年来划分成分时所依据的学历、职业等标准，而是沿袭西方传统，特指有知识者中对思想感兴趣的那部分，并不在乎其学历的高低或是否从事某些职业。按照这个标准，反右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可以算，反右以后就几乎没有了。而在反右中对共产党表达过不同意见并被打成右派的人并不等于知识分子。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93年3月，即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在德国杜塞尔道夫举行了一次有关东德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一位西德的知识分子认为，用“知识分子”一词来谈论东德的某些人，他分析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

## 四 也算结论

许多理论学者过分强调中国极权制度的专横强大——尽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忽视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性格弱点。是的，当代中国极权制度的过分强横，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整体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软弱；同时由于后者的过分软弱，客观上助长了前者的强横。这种关系有时显而易见，有时十分微妙。经过 57 年这场运动，这个政权的专制特征已经彻底暴露，那层虚假单薄的民主外衣全部撕去。这场运动期间，自感已经坐稳江山的毛泽东直言不讳，“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鲁迅在今天不闭嘴也得坐牢”。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从中觉悟到什么，他们依旧不清醒。更为不幸的是，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可贵品质几乎被消灭殆尽，而本已暴露的性格弱点则迅速膨胀，许多人还积极参与了为极权统治者树立丰碑的工程，但同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一方面，我们听到极少数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 57 年发出的勇敢声音，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革命样板戏等也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作，而且很难说这不是创作者的肺腑之言。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过一个“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还是那则伊索寓言：中箭濒死的大雁发现猎人射死自己的那枝箭，正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这就是悲剧，这就是大悲剧。中国知识分子在 57 年前后以及延至今日的整体遭遇，用这个比喻十分恰当。

我们没有权利去苛求前人，更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在极权制度下发出反抗的声音。对那些在专制年代里发出过声音的许多志士仁人，我们充满了钦佩和尊敬，我们会永远记得和张扬他们。过去，马寅初、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等许许多多永垂

不朽的名字，今天，独立中文笔会的出现，成都草堂读书会的存在，刘晓波、章诒和、焦国标的文章，高智晟等人的法律维权，丁子霖、蒋彦永、李大同、卢跃刚等不同的抗议声浪. . . 都是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我们之所以作上述那些分析比较和结论，完全是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极权统治。

试想一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如果有 10 个焦国标，100 个蒋彦永，1000 个李大同，10000 个章诒和，中国会怎么样？

# 中国右派们的政治改革情结

邢小群

我不是右派当事人，也不是研究反右运动的专家。只是因为十多年前开始参与中国知识分子口述历史的研究，接触了相当多的右派。我先后采访过的右派有：邵燕祥、唐达成、吴祖光、冯亦代、温济泽、萧乾、曾彦修、袁运生、梅娘、李慎之、何家栋、钟沛璋、朱正、戴煌、许汉三、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薛毅、张凤珠共二十余位，此外，为了解已经去世的右派顾准的经历，我还采访过不是右派的知情人如吴敬琏、骆耕漠等。

每一次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撞击。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命运有着超乎一般人的关切，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保持着高于常人的热望。不论他们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千差万别，也不论右派改正后出现了怎样的分化，从总体上看，1957年挨整的右派，活到改革开放以后，是一个政治情结十分强烈的特殊群体。

我的这种判断，是针对当今中国民众中出现的政治冷漠趋势而言的。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后极权时代消费主义日益盛行。无所不在的谎言中，当局希望一般民众关心国事越少越好，过问政治越少越好。因此，当今在整个中国物欲化、消费化、世俗化、娱乐化的潮流中，保持着公共关怀和批判分析能力的人，不论在全民之中，还是在知识分子当中，都持续走低。这和二十年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从文革结束，到1989年，关心和推动政治改革曾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当时一般民众关心政治的热情也比较高。八九以后，中国知识界逐步分化。现在仍然追求政治改革，向往民主宪政和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应当说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而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以及在此前的胡风事件和此后的反右倾机

会主义中挨整的知识分子，则情况不同。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但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工作的时代积极参与推动政治改革，就是八九以后，仍然执着地关心时政。虽然已达耄耋之年，不论是反思个人经历，还是关注国事民瘼，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态度。虽然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高低不等，行为方式有张有弛，但政治关怀的强度上，仍然有某种共通性。

随着岁月的流逝，右派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离开人世。我采访过的唐达成、吴祖光、冯亦代、温济泽、萧乾、李慎之、何家栋，已陆续辞世。最年轻的右派，现在也已近古稀。据我 10 多年的观察了解，他们当中不关心政治者也有，但是不多。记得我为韦君宜和《思痛录》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前党组书记唐达成时，他高度评价了《思痛录》对延安抢救运动的揭示，赞赏韦君宜的良心与人格，顺便对我说：“最近我收到一本书，书的作者受罪四十多年，但完全没有反思精神，我看后感慨极了，我觉得有些人是从精神上彻底被打垮了。”冯亦代先生十分关心政治，但却是在我采访中唯一不愿意多谈自己右派经历的人。我感觉，他有顾虑和胆怯的成份，但以他温文尔雅的个性看，更多的原因是不愿意回首那段人格屈辱的日子。后来，当他意识到应当记录这段历史时，已经中风，失去了口头表达和写作的能力。陈明是因丁玲问题打成右派的，但他晚年的言论，多纠缠在丁玲的冤案之中。对体制本身，却并不持批判态度。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不关心政治，只是关心的方向和态度有别。

我采访和了解过的这些右派个案，由于经历、身份和专业的不同，我按他们从事的行业做一粗略的分析：

## 学术思想界

他们在反思旧体制、引领新价值方面，对中国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顾准、李慎之、何家栋等。

顾准是经济学家，也是毛泽东时代为数不多的独立思想家。他早在 1952 年三反五反时，因为提出不同的税收政策，被薄一波罢

免了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1957 年、1965 年两度被打成右派。个人遭遇和国家命运，促使他反思自己所投身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参与建立的政权，反思自己曾经信仰的意识形态。他通盘研究中西方的哲学、经济、文化，生前写出了《希腊史笔记》。他和弟弟陈敏之等人的通信死后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并收入《顾准文集》。王元化先生说：“他是最早清醒地反思个人迷信的人，……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 10 年。……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思个人的信念，提出大胆质疑。”吴敬琏说：“在顾准之后，我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专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分析。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顾准病逝于 1974 年，没有赶上毛泽东去世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他的遗著在八九十年代出版以后，却成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思想遗产。

李慎之是顾准思想和精神的有力发扬者。李慎之说，从 1958 年大跃进失败后，他就一直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他认为到批彭德怀时，“群众已经高度猎狗化了。”“写九评时，原则上就是我们错了，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是毛。”原先他认为自己是右派第一人，顾准浮出水面之后，他说自己只能是第二人。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小时候读泰戈尔的诗记住其中的一节：‘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到地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顾准。”“八九”以前，当他的朋友热心于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体制内推进改革时，他无意动笔写文章。九十年代，他开始发言，关于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全球化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直到 1997 年，郑重倡导政治自由主义。何家栋评价李慎之的意义时说：“在 1990 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看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李慎之去世后，何家栋成为思想界的又一个标志性人物。何家

栋虽然谦虚地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但我感觉何家栋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对世界民主化格局的分析，对极权主义等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何家栋因为给刘宾雁出版《本报内部消息》一书，与刘一同被打成右派。他的经历十分悲惨，为此他失去了两个孩子。当让他谈及右派前后的经历时，他不愿沉溺于过去的伤痛，更愿意通过一些问题，切实地推动思想的解放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你看他的文章题目便可知一斑：《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宪政民主：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中国发展战略再思考》。正如学者所说，“他具有 90 年代知识分子当中难得的大见识”。

如今，顾准、李慎之、何家栋都已经去世，都成了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但还有人活着，比如杜光等右派，还在不倦地思考，不倦地笔耕。告别官方意识形态的旧道统，重建自由民主主义的新道统，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一批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的共同觉悟。而几位参加过共产主义革命又被打成右派的人，在其中成为这种思潮的先驱者和领军者，这既是巧合，也包含着某种必然。反右运动的发动者既是违反政治道德的，也是背离人类文明的，它一定要造就自己的掘墓人。

## 新闻出版界

温济泽、钟沛璋、戴煌等几位，都是新闻工作出身。思想上和顾准、李慎之、何家栋是同一价值谱系。

温济泽当年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因不同意在本部门按 5% 打右派，反右斗争结束 11 个月后被补成右派。温济泽是在延安亲自抢救过王实味的老干部，晚年，在王实味平反过程起了关键作用。他又为瞿秋白洗冤上下呼号。临终前还托人给胡锦涛带话，希望日后解决六四问题。

戴煌是新四军出身的新华社记者，当年在新华社第一个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反对特权，被打成右派。从北大荒“九死一生”回来后，他的工作，是与一个个冤假错案平反联系在一起的，被称之

为新闻界的一棵良心树。他在 90 年代撰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

钟沛璋，中国青年报的创始人之一，当年因分管讽刺性较强的《辣椒》副刊，被打成右派。改正后曾任中宣部新闻局长，离休以后，有两件要事值得记载，一是九十年代主编《东方》杂志，为六四后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失语状态，重建公共关怀，打造了最具影响力的言论平台；二是江泽民在位期间，他以老同学身份当面进言，希望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朱正说，“我的觉醒开始是从 1956 年苏共 20 大。很多疑问和动摇是从这时开始的。”他帮助李锐完成并编辑出版了《庐山会议实录》。他的《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以材料的翔实取胜。成为反右研究的一家之言。

翻译家冯亦代，曾在思想界的重要平台《读书》的创办中起骨干作用。

## 文学艺术界

在我采访过的当年右派，有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在改革开放初期到

整个八十年代，文艺界的右派在思想解放中曾经发挥过比思想理论界更显眼的作用。比如刘宾雁、白桦等。到九十年代，文艺界的右派的影响力就不如思想界了。但吴祖光、邵燕祥例外。

80 年代，吴祖光在批判电影《苦恋》、“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中就是敢言者，以至于在胡耀邦下台后，胡乔木代表中央专门跑到他家劝他退党。如吴不接受劝退，则将开除出党。但在八九以后，吴祖光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的两会，都有他掷地有声的发言。他敢于触及六四等问题，使高层事先设定的禁区在他身上失效。他还写文章批评国贸商场非法搜身，为社会正义招惹官司。吴祖光在一切开会的场合，总要大声表达自己的政见。在一些小型会议上，他主张把毛泽东的像从天安门上取下来。由于他国际影响大，骨头硬，当局只好通过亲属施加压力，让他少说话，直到去

世。

邵燕祥以诗著称，兼具思想家气质。他的杂文犀利深刻，呼吁民主、关注法制。可贵的是，他更敢于剖析自己，对自己过去积极投身的事业有着彻底的叩问和清算。20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批判姿态。他为很多右派的回忆录写了序。

文革后一度主持中国作协的唐达成，大节不亏，六四以后拒绝慰问戒严部队。

萧乾是个老自由主义者，原来在政治运动中他也比较软弱，但晚年却十分敢言，一直在思考知识分子问题。他说：“顾准倘若光研究《希腊史》、他可以是历史学家，但他把希腊城邦制度同中国的史官文化相比，他就不只是学者了，而是知识分子，他关心民族的命运和走向。以前的状元进士属于士大夫，但只有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才是知识分子。……作为驯服工具，知识分子是不及格的，因为他们往往更遵循自己的认识和良知。”

徐光耀写成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坦言部队文艺界反右运动整人真相。

一直背着沦陷区作家帽子的梅娘。文革前夕，曾帮助遇罗克发表批判姚文元的文章。过早的封笔，使她“右派”改正后，文笔依旧清新隽永，少有几十年来意识形态话语的污染。

曾任丁玲的秘书的张凤珠，这些年并没有什么公开言论，但与她交往中感到，她对政治思想文化界动向极为敏感。当年她因受丁玲牵连被打成右派，在含饴弄孙的年纪，却成为所居住的大楼里的信息源。凡是大家最关心的书籍、文章、及各种方式传递的信息，她总是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她会及时告之她认为应该知道的人。我认识的右派中，有的还成为同学会、老年合唱团等社团中的信息源。

画家袁运生，当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因对苏联教学体系有看法，打成右派，时年18岁。1980年代初，又创作壁画《泼水节》成为争议焦点。

我采访过的右派，多是在新闻、文艺领域工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不多，仅有仇士华、蔡莲珍夫妇。他们夫妇二人是在原

子能所被打成右派的。仇士华后来成为用碳 14 鉴定考古年代的专家。但我知道，当年从事理科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不少，据说当年北大打右派最多的是物理系。80 年代方励之、许良英等科学家都很引人注目。我因对科学界右派交往少，就不多谈了。

以上的分析，只是就我接触过的右派而言。右派改正以后，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的右派重新回到体制，成为高官，成为主流政治的维护者和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的右派甚至成为左派，站在比主流更僵化、更专制的立场上，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力图把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拉向斯大林体制。

今年是中国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部分当年的右派及右派家属先后公布了几封签名公开信，要求中共开放言禁，反思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郑重宣布反右运动是违宪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对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给以经济赔偿。我深知，当局不可能接受这些意见。像马英九那样代表国民党向当年受政治迫害的人士鞠躬道歉，在中国大陆做不到。但我认为，右派们的公开表达不是没有现实意义。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同时是明辨历史是非的进程。1978 年当局改正大多数右派，而不承认反右派运动的根本错误，是当时妥协的产物，是维护邓小平面子的需要。现在邓小平已经去世多年，当局仍然不肯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是维护政治权力的需要。但是，他们在台面上已经拿不出事实和道理，正面回击，只好靠控制传媒、控制集会来回避矛盾。这些右派写公开信，写文章，在事实和道理上已经占了上风。这已经是为明辨历史是非推进了一步。

（作者简介，请参阅前文。）

# 终身制与右派上书

丁东

作者简介：1951年生。现居北京。一直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并致力于中国当代民间思想的发掘和整理，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著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反思历史不宜迟》、《午夜反书》等。编有《世纪之交的冲撞》、《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怀念李慎之》，参与编辑《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距今正好50周年。反右派开始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一次少有的思想活跃期。当时产生的思想文本浩如烟海。仅文本的种类就有文章、建议、演讲、书信、小说、诗歌、杂文等多种形式，表达方式则有会议、报刊、大字报、上书等多种渠道。如果能够全面地搜集整理，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呈现出绚烂多姿的篇章。可惜，由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至今被划为禁区，因此这一段思想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很难全面展开。

## 一

余习广先生研究当代中国的上书文化，已经有二十年。他曾经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同样书名，主编了《文化大革命上书集》和《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两种珍贵的史料，《1957知名人士谏言上书集》是他主编的第三种。他不惜大海捞针，将1957年的上书

谏言文本和介绍主人公命运的文章精心编辑成书，对于后人理解和反思 1957 年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大陆视反右研究为畏途的今天，他不畏艰难，编成此书，尤为可贵。

一般来说，谏言的范围比上书宽泛。在会议上的公开发言，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公开张贴的大字报和写给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书信，只要包含批评建议内容，都可以称为谏言。而上书，则特指写给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书信。上书又分公开和不公开两种方式。

无论是上书还是谏言，都是起源于古代皇权专制社会的表达方式。皇帝是国家的主宰，臣民无论以什么方式向他表达意见，都存在着一种尊卑关系。虚心纳谏，是君主礼贤下士的美德，拒绝纳谏，是皇帝昏庸的标志。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出现了宪政民主体制。主权在民。民和官的关系与专制社会相反，成为新的主仆关系，民是主，官是仆。宪法保障以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和媒介批评政府和官员的权利。上书谏言内含的尊卑关系，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将不复存在。公民向政府和官员提出各种批评建议成为行使公民权利的常态。

在中国，上书谏言至今仍然是志士仁人关心国事民瘼，推动社会进步的表达方式之一。这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当今的执政集团，在 1949 年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武装夺取政权以来，一直把权力集中于执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大陆仍然处在前宪政社会，有宪法而无宪政。公开经营的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舆论机关，都由官方掌控。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在官方党委组织部门的掌控下产生。公民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尚不具有主人的地位。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指出批评意见，仍然要冒不同程度的风险。一部分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对触及体制弊端和高官利益的问题，没有机会通过报纸等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只好选择给领导机关或领导人写信的方式来表达。即使上书人内心已经不承认官尊民卑，在形式上，不得不将官方领导人置于权力关系的上位。所以，上书谏言仍然存在于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当然，也要看到，今天的上书者，不只是采取内部谏言的方式，还有公开信的方式。所以发出公开信，就是明知官方无意采

纳，也要充分行使宪法权利，让批评意见大白于天下。公开信通过网络传播，虽然还保持上书的形式，实际上已经是一种面对社会的公民表达。

在毛泽东当政的时代，批评性的上书谏言是一种有着巨大风险的行为。我们可以把政府分成本国公民可以批评的和不可以批评的两类。宪政政府是可以批评的政府，专政政府是不可以批评的政府。中国政府按照列宁斯大林的模式建立，公开申明自己的专政性质。建国伊始，就剥夺了政治反对派的生存空间。虽然不论从法律上、政策上、理论上，承认公民享有对公职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但实际上这项权利往往被悬置。批评者因言贾祸，遭到打击和惩罚，是支配实际生活的潜规则。这项潜规则首次发挥威力，就是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此前，毛泽东亲自出马做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反复号召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有不少人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无意提出批评意见，各级党委领导人还是再三动员。而一旦言路稍有放开，就超出了毛泽东和决策层的承受力，他们认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竟然集体密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整风并没有进行，主题却演变为反右。五十五万以上知识分子被打右派。响应号召上书谏言的批评者几乎一网打尽。中国知识界从此视上书谏言为畏途。特别是民主党派从此一蹶不振，再不敢妄想对执政党实行监督。

现在，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上书谏言者，很多都不愧为历史的先觉者。其后两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党内高级领导人因上书贾祸，使领导集团内部的谏言也成畏途，从此，中国不但是党天下，而且成为毛泽东的一言堂。

## 二

1957年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开启了批判斯大林的闸门，其内容披露之后，震动了全世界。接着，波兰、匈牙利事

件先后发生，东欧国家挣脱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控制的冲动之强烈，超出世人预料。匈牙利事件虽然遭到镇压，但影响也深刻地波及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体制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复制。中国向何处去？要不要走出斯大林的模式，不但执政者在考虑，各界知识分子也在思考。这一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中共中央做出整风的决定，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国出现了 1949 年以来思想空前活跃的局面。《1957 知名人士谏言上书集》的所有文本，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当时，人们思考的问题相当广泛，现行政治体制造成的弊端几乎无不涉及，已经超出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预设。诸如党天下、官员特权、人治代替法治、政治运动冤狱、侵犯公民宪法权利、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艺术创作自由、学术研究自由，教育独立、民生困苦，乃至外交和军队国家化、都有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分别提出。

本文只选择当时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这就是干部终身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陈铭枢和薛毅的两封上书。

陈铭枢是辛亥革命元老，民革创始人之一，长毛泽东四岁。他的上书，是对毛泽东 1957 年 4 月 30 日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的一个回应。陈铭枢经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政治，曾经旅居欧洲，对宪政自有理解。毛泽东的辞职意象，使他想到华盛顿、俾士麦、伊藤博文等外国政治家的先例：“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家犹乐道之。当日耳曼民族统一后，俾士麦当国三年即立刻辞职，他对威廉第一陈述的理由为：在位日久，将易主观臆断，耳目失聪。一己为珍惜声名，事有未放手，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功劳，纵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新锐，新硎初试，必能割此痼疾，一扫颓习，已则从旁监督，旨锐力于将来，更为有利。日本明治维新时伊藤博文师俾士麦的故智，均收同样效用。”他的希望，是以毛泽东的辞职为契机，让中国的体制进入类似华盛顿开创的美国体制。

国家的领导人到底是实行终身制，还是任期制，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差异。中国清朝以及此前的二千年间，这片土地上沿袭的一直是帝制，皇帝的终身制是理所当然，家族世袭也是理所当然的。进入民国，袁世凯当了总统，当时的制度并没有禁止他终身任职，但他还是想当皇帝。蒋介石建立了以党治国的体制，他也是终身任职。到台湾后，胡适劝他晚年放弃连任，他听不进去，胡适也无可奈何。蒋氏的统治还传到二代。

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即是中国古代帝制的传统，也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同特色。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论欧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几乎概莫能外。不但此前列宁、斯大林是终身任职，毛泽东和他前后掌握国家权力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胡志明、卡斯特罗也是终身任职。金日成还传位到儿子金正日。直到八、九十年代的越南，才出现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任期制。

从时间的维度看，终身制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任期制是一种相对的权力。终身制度里，不论是皇帝，总统，还是党魁，权力往往不受约束，说一不二。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在他们当政的晚期，都出现了一部分高层同僚实际上已经离心离德的现象，但出于畏惧，同僚们都表示忠心依从。所以，凡是终身制的国家，往往伴随着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领导人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精神领袖，既是恺撒，又是上帝。毛泽东就是兼秦始皇与孔夫子的角色于一身。到晚年成为四个伟大——导师、领袖、统帅、舵手。如果是任期制，一般就不会形成这种状况。最高领导人受到任期的限制，权力不具有绝对性。他要为自身卸任以后着想，行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为所欲为。人们也不会因恐惧和盲目，进入狂热的个人崇拜。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开启了批判斯大林的闸门，震动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件事，在中国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本国状况的联想。斯大林是终身制，毛泽东是不是终身制？这些问题自然要提出来。有意思的是，主动提出了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是毛泽东本人，并向党内外传达。当然，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不是辞去最高领导职务。因为，中国是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党指挥枪。最高领导职务是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而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实际上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毛泽东不喜欢循规蹈矩，不喜欢国家不得不履行的外事礼仪活动。在这一点上，陈铭枢先生以为毛泽东是要告别终身制，的确是误会。并且，他在上书中，不但同意毛泽东辞职，还委婉地提醒毛泽东注意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并说毛泽东“所常接触者，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他想通过毛泽东的去职，使中国最高权力进入一个有所制衡的状态，只是善良的一厢情愿。

此前，毛泽东也曾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并在党章中预设名誉主席一职。他一生的行为可以证明，这只是一种试探。退一步讲，他即使有辞去实际职务的想法，放弃对最高领导权的掌握的心思则根本没有。因为，就是不当党主席，仍然有掌握实权的办法。在他之前，蒋介石下野而不丢权；在他之后，邓小平辞职而不丢权。都是旁证。毛泽东是何等人物？他通晓古代帝王之术，特别欣赏刘邦、朱元璋。就是号召整风和鸣放，一刻也没有容忍丝毫的大权旁落。越到晚年，越担心同僚篡位，担心出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不论是庐山会议整彭德怀，还是文革整刘少奇，都是明证。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相已经明了，不论是彭，还是刘，被他打倒的“篡党”者，其实都找不出任何篡位的证据。

薛毅是一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革命干部，时任地质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建议引进考试、选举等竞争性方式，选拔干部，保持干部队伍的高效、廉洁与活力。他的上书没有特指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而是指向整个干部终身制，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实际也在他的思考中。当时，他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一万五千字的长文《改革干部使用制度刍议》，文中说：“干部使用制度方面的最大缺陷是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干部的职务几乎是终身职。我们共产党人曾正当地批判过封建王朝贵族的世袭制

度，也曾嘲笑过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为终身职的那种荒谬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所以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是以形而上学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哲理为指导的，实行起来是必然不能与干部状况在今后会有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因而，它必然会带来极为严重的恶果。”

然而，党国体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对权力的垄断。不论是陈铭枢希望毛泽东学华盛顿，还是薛毅建议改变干部终身制，都接触到权力垄断的正当性问题。毛泽东在世，直到晚年重病缠身，一息尚存，仍然大权在握。直到他去世之后，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其他领导人才开始反省如何避免伴君如伴虎的切肤之痛。在 1979 年的理论务虚会上，终于有人公开否定终身制。

照理说，陈铭枢的上书，就算有直抒胸臆之气，绝无改朝换代之心。薛毅更是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上书全是为了补天。而且，他们采取的都是内部谏言的方式，给当政者留下很大的回旋空间。你采纳不采纳，接受不接受，公众都不知道。毛泽东自己就引用过古人的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真正论到自己，还是不免叶公好龙。把谏言者视为权力的潜在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陈铭枢上书是 1957 年 5 月 18 日，当时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计划已经部署；薛毅上书是 1957 年 6 月 8 日，反右派运动的信号弹，就在这一天升空。他们两位志士仁人，当然都被划为右派。

比较陈薛二人上书的风格，也很有意味。陈铭枢是高级民主人士，他在新政权是客卿，谏言其实很有分寸。当时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愿望不过是希望回到联合政府，回到共同纲领，就是被定为右派头子的章伯钧、罗隆基，也没有任何取代共产党执政的意思。更何况陈铭枢先生既年长，又信佛？而薛毅，及和他有相似革命经历的上书者戴煌等人，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者，他们当时写信，只是因为看到现实出现了不符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理想初衷的情况，不愿意自己投身的革命走向反面，怀着恨铁

不成钢的心情，才向党建言。他们是把自己定位为主人的一分子，而不是客卿。然而，打成右派以后，他们的处境比民主人士中的右派更惨。薛毅发配青海二十余年，戴煌更是九死一生，活下来就是幸运。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陈铭枢，还是薛毅，他们的意见都体现了更为先进的政治理念。告别终身制，是现代政治体制和古代皇权专制的一道分水岭，也是通往民主宪政的重要环节。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执政者也承认要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终身制。不但对一般的干部规定了离退休的年龄和任期届数的限制，而且经过几届的交替，终于淡出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是因为，民主宪政，已经是当今世界的政治潮流。当今的发达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大致可分为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两种。实行共和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一般为总统，大多以两届为限。实行君主立宪的，国王虽然可终身任职，但是不掌握实权。发展中国家，由独裁者掌权的也越来越少，走上民主宪政轨道的越来越多。告别传统的政治模式，进入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模式，终将成为未来中国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陈铭枢先生、薛毅先生，还是 1957 年的其他上书谏言者，他们为推动中国进步做出的努力，付出的代价，都不应当被历史忘记，都应当得到后人的尊敬和珍视。

#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

余 杰

作者介绍：1973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年轻多产的著名作家，著作有：《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等多部作品集，同时活跃在网络文坛。他是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独立中文笔会理事。



我们经历了一段这样的历史，无论是屠杀者，还是牺牲者，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指示”的空洞无物和毫无意义都同样地心知肚明：正是这种认知，导致了这种以该意识形态为名义所实施的恐怖行径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卑贱；正是这种认知，造成了整个社会在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根本堕落。杀人者虽然枪弹齐射，但更多的还是仅仅使用拳头，“杀人的棍棒”每落下一次，就会同时响起杀人者丧失理智的嚎叫——这不仅证实了最能够带给人最为放纵的权力感，并且借助于对理性的奸污，会与杀人的快感一起迸发出何等强烈的狂放，这种狂放——朝向人类生存的、无论怎样未来的——启示录般的真实视野。

——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sup>1</sup>

“反右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的事件。它几乎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累积形成的几

<sup>1</sup> (匈)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作家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72页。

代至为宝贵的知识分子连根拔起、一网打尽，将中国社会彻底变成一个没有知识分子和没有公共空间的极权社会。它使得中共当局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并催生出一整套更加严密的劳教制度和劳改制度，将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敌对分子”关进遍布中国大地的现代奴隶集中营。“反右运动”彻底暴露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政权的反文明、反民主的本质，与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天安门屠杀”等政治运动和事件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甚至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

迄今为止，“反右运动”依然是中国大陆历史研究和文化评论的禁区。中国的作家和学者未能写出一部类似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史诗般巨著来。正是由于当局对历史的扭曲和对真相的掩盖，导致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某种“后反右时代”和“后文革时代”，受害者的赔偿和社会公义的实现亦无从谈起。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疏理“反右运动”与中共劳教制度及现代奴隶集中营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多个层面比较纳粹德国、苏联与中共的集中营之异同，并以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夹边沟集中营为个案，剖析其管理制度和死亡比例。以此，作为对“反右运动”发生五十周年的纪念，以及对每一位死难者和幸存者的迟到的敬意。

## “反右运动”的起源与劳教制度的确立

长期以来，史家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反右运动”究竟是毛泽东一开始便策划好的“阳谋”，还是其中途变卦、杀机渐生的结果？

我认为，毛泽东的思路确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毛泽东一开始想利用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运动”，打击党内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职业官僚体系”，从而恢复他在中共八大上失去的权力。挑动群众斗官僚、挑动官僚斗群众、挑动官僚斗官员、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四种组合是毛泽东在其漫长的掌权生涯中惯用的伎俩。他超然地置身事外，在每次斗争中都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每一次血雨腥风的斗争都成为其巩固权力的手段。

在 1956 年 9 月的中共八大上，党内高层利用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国际态势，成功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删去，并将毛泽东的权力部分架空。几个月之后，毛精心策划，掀起了“双百运动”，以对抗党内高层的“抑毛运动”。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不会有人敢于批评自己。他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 1956 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的最原始的构想。毛所制定的指标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三个“主义”不会与自己沾边，最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会伤及“皇上”。这是中国传统帝王政治的特色。<sup>2</sup>

殊不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阶层对党的批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当然，大部分人只是出于善意，向中共提出一些温和的意见与建议。但也有少数思想超前的人物，不仅尖锐批评各级党组织的官僚制度，而且将批判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的独裁统治方式，甚至提出中共应当还政于民、实施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触动中共体制本质的呼吁。有人将中共的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有人指出“现在的政府不保障公民权利的情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有人希望“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还有人揭示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制度的毛病，在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sup>3</sup>

这一结果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经过中共建政之初的批判胡适、高校院系调整、反胡风等整肃知识界的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未完全成为依附于中共这张“皮”上的“毛”。毛泽东更没有料到，党和他本人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威望竟然如此之低，只要知识分子们还能保持独立性，他本人

<sup>2</sup> 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远流出版公司（台北），2005 年，第 64 页。

<sup>3</sup> 参阅张锡锯《三害根源》、刘奇弟《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严仲强《压制不了的呼声》、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等文章，以上文章均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8 年。

就无法成为指鹿为马的“红太阳”。毛的心胸极其狭隘，报复心极强，他立即决定改弦易辙，发起反扑，宁愿暂时放过党内干部，也要先拿知识分子开刀。他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sup>4</sup>这段话将其残忍的本性表露得淋漓尽致。

于是，毛泽东公然宣称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此前宣布的“言者无罪”的承诺统统收回，其无耻程度让历代独裁者望尘莫及。正是由于这一戏剧性的转折，使得党内当权派甘当“反右运动”中的“马前卒”。在“双百运动”前期，遭到尖锐批评的第一线人物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职业官僚”。面对这一轮新的“整风”，他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毛泽东转而赦免其“罪状”，并转而迫害那些批评者时，他们便怀着深切的报复之心，积极主动地成为毛的工具。“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邓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一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者，亦每至二十年、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sup>5</sup>他们在此次运动不仅没有受到触动、反而巩固了其“党内当权派”的地位。此后，刘邓等人继续掌权长达九年，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才被毛打入深渊。

对右派的残酷迫害，由毛泽东发号施令，由刘、周、邓等人具体执行。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之际，如何处理数量庞大的右派分子，成为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1%到10%。当时的知识分子约为500万人，后来官方的说法是划了50万右派，即按照毛泽东该标准的上限来划定的。其实，右派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50万，甚至有许多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的人也被划为右派。德国学者乌利·弗朗茨认为，右派有80万人；中国学者丁抒则认为，右派接近180万。

---

<sup>4</sup> 张戎、（英）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第364页。

<sup>5</sup> 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远流出版公司（台北），2005年，第67页。

人，而邓小平 1952 年 5 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称，“反右运动”实际上影响了一千万人，还有更多所谓“漏网右派”，以及被“反右运动”波及的“地富反坏分子”。<sup>6</sup>

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具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他要设计出一套制度将右派彻底铲除，确保他们无法继续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这既是对不驯服的右派的惩罚手段，也是让其愚民政策此后畅通无阻的保障。当时，对于右派的处理办法，第一类叫“法办”，即通过原有的法律程序逮捕、判刑，从几年徒刑到十几年，到枪毙，都有。这类人在百万右派中是少数。而大部分右派的“罪证”，只是提出的一些温和的意见和建议，很难在法律层面上进行定罪。

第二类处置办法叫“劳动教养”，这是将右派迅速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去的“便宜之计”。“反右运动”对中共劳教制度发展意义重大。虽然此前劳动教养已经在各省市开始实际运作，如时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的黄琪翔便在“鸣放”中说：“人民失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联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没有听闻过。”<sup>7</sup>这说明集中营早已是中共惩戒不服从者的重要手段。但全国性的劳教机制还未正式确立，劳动教养尚待进一步制度化。<sup>8</sup>“反右运动”因而成为劳教制度化、现代奴隶集中营大规模扩展的重要契机。

1957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指示：“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搞个劳动教养条例。”于是，总理周恩来赶紧行动，先由国务院起草，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具有法律的地位，规定凡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的，都可以送去“劳动教

<sup>6</sup> 丁抒认为，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等各类“帽子”的，共约 120 万人。此外至少还有 60 万工人、店员、农民等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被按上“分子”头衔迫害至家破人亡的，超过 180 万人。参阅丁抒《阴谋：反右运动始末》，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 年，第 20 页。

<sup>7</sup> 《鸣放实录史》，当代社会出版社（香港），第 115 页。

<sup>8</sup> 吴弘达编著《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劳改基金会，2004 年，第 16 页。

养”。此外，“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也可送劳教。虽然该《决定》只字未提“右派分子”之类的话语，但从以上对劳教适用对象的表述来看，显然是针对右派的。<sup>9</sup>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发布该《决定》的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sup>10</sup>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赤裸裸地宣告：劳动教养就是收拾右派的法宝。

可以说，劳教制度完全是为右派们量身定做的。对一个公民施加劳教的手段，不必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由其所在的单位、党委即可决定，然后由公安机关立即执行。毛泽东说：“右派这么多，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这种说法虽然与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杀一千万”自相矛盾，但从劳教这一角度来看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捉”是逮捕，“办”是判刑。当时，绝大多数的右派，的确既未被“捉”，亦未被“办”，就是被“劳教”。百万右派中大多数属于该《决定》所说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的命运一般都是被送去“劳教”。

“反右运动”之后，劳教制度固定下来，以劳改农场等形式存在的现代奴隶集中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准监狱”（许多“准监狱”的条件和待遇甚至比正规监狱还要严酷）。

在右派分子当中，有人被送入新开设的、专门关押右派或以右派为主的劳改营，更多人则与一般囚犯一起关押在普通的劳改营。这两种情况各占多少比例，尚无人能作出准确的评估。<sup>11</sup>劳改与劳教的区别主要在于：劳改有刑期，劳教的不算被逮捕，未经审判，没有刑期。由于不知道何时“解除劳教”，所以几乎与无期徒刑一样可怕。<sup>12</sup>有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在劳改营被关押了长达二十多

<sup>9</sup> 吴宏达著《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劳改基金会，2004年，第18页。

<sup>10</sup> 丁抒《阳谋：反右运动始末》，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第318页。

<sup>11</sup> 魏纶和吴燕娜指出，在一九八三年以前，中国的许多营区同时有劳改队与劳教队，有时某些犯人混在一起，造成这两种犯人的混淆。见（新西兰）魏纶、（美）吴燕娜《万里大墙——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黎明文化（台北），2007年，第121页。

<sup>12</sup> 丁抒《阳谋：反右运动始末》，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第318页。

年时间（“强制留场就业”制度使得许多人迟迟不能获得自由），比刑法中规定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最长年限还要长。更有相当数量的右派在劳改营被折磨至死，“右派分子”的死亡情况和数据，至今被当局秘而不宣。“后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刽子手之一，他只承认“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而不承认该运动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当然更不会向受害者道歉。而此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都是邓小平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他们必然忠心耿耿地执行邓的政治路线。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触及“反右”问题，甚至比触及“文革”问题更为敏感。只有少数稍有良心的中共官员会谈及这场运动，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高级干部李维汉承认：“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相当多数（右派）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sup>13</sup>但是，“反右运动”的若干真相远未揭开，即便是右派的真实人数、右派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关押右派为主的劳改营的数量等等最基本的情况，仍然暧昧不明。

## 纳粹德国、苏联与中国的集中营之比较

法国思想家福柯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是《监禁与惩罚》，这本书是对监禁的历史的研究，也是一部“现时的历史”。福柯认为，以监狱为中心的斗争涉及对人类实施权力的全部技术，是现代性最为“幽暗”的一面，“监视、训练、操纵、评判、等级和地位、分类、检查。记录，这一整套蹂躏人体、控制人类数量并操纵他们能力的方法，经过几个世纪的古典时代，逐渐在医院、军队、学校、大学或工厂里发展起来：这就是纪律。无疑，十八世纪创造了自由，但它却为自由筑起一个阴森、坚固的地下室——我们永远隶属的纪律社会”。<sup>14</sup>在此意义上，现代人比古代人更不自由。《监禁与惩罚》是福柯在七十年代组织“监狱情报组”并为之长期服务的

<sup>13</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839页。

<sup>14</sup> （法）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258—259页。

结晶，他表示：“我们要弄清何谓监狱：什么人进去，怎样和为什么进去，监狱里发生的事情，犯人的生活和看守人员的生活如何，牢房、食物、卫生状况如何，内部规章制度、医疗检查、劳动车间如何运转；如何从监狱出来，以及作为我们社会中的一名出狱人员意味着什么。”<sup>15</sup>虽然福柯在其著作中并未涉及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但其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这三个“帝国”的大型集中营——这三个国家的集中营，均是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服役型社会”）里军队结构式的单位。<sup>16</sup>

什么是集中营？纳粹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共的劳改营是否为同一概念？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集中营是类似监狱的大型拘留中心，用于统一关押或隔离持不同政见者、敌侨、以及属于某一特定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团体的成员于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它与监狱最大的区别在于，集中营中关押的人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往往不经过法律判决即遭拘留，而且没有确定的拘留期限。有些被关押者虽有法律判决，而且有确定的关押期限，但这些判决大多是不经司法程序的，这些被关押者也往往不被关在监狱而是关在集中营中。通常人们很难清楚的界定集中营的各种形式，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中的被关押者的人权都被忽视、被损害。<sup>17</sup>按照这一定义，以上三者都属同一类别。

集中营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日本、共产党时代的东欧国家、红色高棉、越南、北韩、古巴、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军政权的某些拉美国家及非洲国家等，也存在各种形式的集中营。但毫无疑问的是，德、苏、中三国集中营规模之庞大、人数之众多、制度之严密，可以居此排行榜之三甲位置。对它们的异同作比较，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其本质。

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大屠杀，主要是基于种族主义思想。纳粹

<sup>15</sup> （法）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247页。

<sup>16</sup> （新西兰）魏纶、（美）吴燕娜《万里大墙——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黎明文化（台北），2007年，第150页。

<sup>17</sup> 参阅维基百科全书“集中营”条目。

的种族政策，并非希特勒一个人的极端想法和做法，它深深地根植于长达五十多年的、从科学上反对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二十世纪以来，德国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开始接受“人类是不平等的”这一源于达尔文的思想。遗传学家、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发展出了一套人类遗传的理论，该理论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理论相融合，形成了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他们于 1933 年上台后，纳粹分子便制定了一个政治框架，使得该不平等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排斥政策变成可能。同时，德国的政界、知识界和科学界的精英分子为纳粹当局提供了顺利实施这一政策所需的合法性。<sup>18</sup>因此，纳粹的集中营制度，主要针对犹太人和其他所谓的“劣等民族”，以及战争中的俘虏。对于本国本民族的国民，被送入集中营的一般是残疾人、精神病人和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士。纳粹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来，相对要宽松一些。纳粹德国并没有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送进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主要目的是对犹太人进行“生物意义上的灭绝”。党卫队领导阶层决定在偏僻的灭绝营用毒气执行死刑，并认为这是最为有效和“人道的”方法。当然，他们也强迫集中营中的囚犯从事劳役，但他们不会因为囚犯能够完成劳役、具有劳动价值而放弃对他们的屠杀。在此意义上，纳粹的屠杀行为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功利价值。另一方面，集中营里大部分的囚徒最终都将被杀戮，所以管理当局很少对他们实施“洗脑”式的教育和思想改造。这也使得纳粹集中营的管理相对要简单一些。对于集中营，德国的社会大众一直保持沉默。德国社会更广阔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动机和制度上的机制，使得通过国家命令监禁并杀害数百万民众成为可能。在此，有四种形态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恶毒的、具有强烈的生物学和宗教成分的反犹主义；第二，在家庭、学校、每日生活当中强有力的制度化极权主义的倾向；第三，建立在缺乏身份、不安全感和战败创伤基础上的好战的民族主义；第四，被一个罪恶的领

---

<sup>18</sup> （美）亨利·弗莱德兰《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北京出版社（北京），2003 年，第 1 页

导阶层统治。<sup>19</sup>

如果说纳粹集中营是以种族灭绝为目的，那么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则以阶级灭绝为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即是新时代的敌对阶级，他们应当被消灭。他们是资本家、地主、富农等。而知识分子在此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十分暧昧：他们可以被确定为劳动者的一部分，也可以被划入敌对者的行列。这完全取决于领袖的一念之差。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一个共同点：两人都未受过完整的教育，在夺权之前属于仅仅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社会边缘人，因而对高级知识分子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同时，俄国和中国的历史上都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反智主义传统，知识分子要么被统治者“媚优蓄之”，要么被关进文字狱。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该传统最极端的继承者。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中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有庞大的文化精英群体。

其次，纳粹政权的寿命较为短暂，其集中营存在的时间相应也较为短暂，而且其实际控制的区域和人口也有限。纳粹集中营大约存在了十年左右，其高峰期是在战争期间（1939 至 1945 年），最残酷的集中营一般都设立在东部占领区。相比之下，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当漫长（苏联为 1917 至 1991 年，共七十四年；中国为 1949 至今），其集中营存在的时间与之同步也相当漫长。苏联集中营的高峰时期为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的斯大林时代，中国集中营的高峰时期为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时代。而且，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所控制的区域和人口，均远远大于纳粹德国所控制的区域和人口。就集中营存在时间之长、区域之广、波及人员之多、制度之严酷而言，中国更是“名列榜首”。

苏联的集中营被作家索尔仁尼琴命名为“古拉格群岛”，他在其巨著中指出：“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

---

<sup>19</sup> （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5 年，第 681 页。

的，只有满的，或者过分满的。”<sup>20</sup>苏联的政权体制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者自居，具有僵硬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苏联的集中营将经济功能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集中营成为苏联国民经济中的一条“隐蔽的战线”，成为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源泉。“人民公敌”的家属、他们的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构成了变为囚犯的人的源源不断的链条。发展到军队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把成千上万身强力壮的人弄到了劳改营。托洛茨基曾经幻想过的免费劳动力落入了斯大林之手。

苏俄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指出，恐怖行动不仅解决了政治任务，而且也在解决经济任务。由于古拉格群岛的扩张，斯大林已有可能廉价地实施最艰难的工程项目。他的囚犯建成了白海——波罗的海大运河和莫斯科——伏尔加大运河，在难以通行的地方修筑了道路，在极圈内建起了工厂……在三十年代末，很大一部分铜矿石、黄金、煤、木材等是劳改营的人开采出来的。在他的工业动脉中，这种秘密的免费劳动力流动得越来越强劲了。此时，在重大工程开工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机关便会得到需要逮捕多少人的公开指示。<sup>21</sup>苏联的集中营将驱使囚犯从事艰苦劳动并创造社会财富为最高目的，强体力劳动让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丧命，如杰出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便死于苦役。

但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集中营的管理者通常不干涉囚徒的思想与灵魂，他们把囚犯看作是创造劳动价值的一个个的“数字”和“编号”。研究者指出，前苏联的古拉格只拥有很少的一些值得称赞的特征，其中一个就是：虽然它强制犯人身体劳动，但它差不多总是不理睬犯人的心灵，也就是说，它让犯人的心灵自由地遨游。苏联的古拉格很少强迫它的犯人去说教、去听政治宣传、或写交代、自我批评。索尔仁尼琴在描述苏联的古拉格时，很少有好的回忆。但这一点是其中之一。他当劳改犯时，很高兴地发现犯人不会被强迫去参加政治回忆。<sup>22</sup>

<sup>20</sup> (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群众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92页。

<sup>21</sup>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469—470页。

<sup>22</sup> (新西兰)魏纶、(美)吴燕娜《万里大墙——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黎

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比，中共对社会的统治更加严密，军事化程度也更高。唐德刚指出：“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的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sup>23</sup>中国社会的控制程度高于德国和苏联，中国集中营的控制程度也相应地高于德国和苏联。与苏联的古拉格仅仅将囚犯看成“免费劳动力”不同，在中国的劳改营里，囚犯不单单是劳动力，还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灌输政治教条的会议被视为极端重要，尤其是在监狱和劳改队里。

对此，有学者分析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巨大的野心，使他比苏联前辈更顽强地要推行那种把人类看成是历史和物质力量造成的、全然可塑之物的马列主义乌托邦式的看法。当毛在全国各个乡镇灌输教条时，他其实就是依照他那种毫无根据或实证的乌托邦式的假设来行事。<sup>24</sup>这种看法并不十分准确。我认为，与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只关心个人权力和国家力量的独裁者不同，毛泽东对个人迷信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更为着迷。他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而并未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获得多少思想资源。毛泽东不仅要当皇帝，还要攫取国师的角色，换言之，他企图身兼秦始皇与孔子这两种至高无上的身份。毛不仅使用暴力（军队）控制整个国家，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对国民进行完全的“洗脑”。

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中的“洗脑术”，往往与酷刑、挑动囚徒之间互相残杀、鼓励告密、故意制造的食物匮乏等恶毒方法配合起来实施，从而让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无限地泛滥——表面上看那些似乎最“高尚”的教条，却以最下流的方式来强制灌输给每一个人。研究极权主义的思想家汉纳·阿伦特在谈到纳粹的死亡营时，曾借用康德的“根本恶”概念来分析纳粹极权的性质，她把纳粹的暴行界定为一种使所有的人都变成“多余的人”的制度。人一旦被定义为废物，则用毒气室杀人，再通过焚尸炉扬灰，就不再负种族

---

明文化（台北），2007年，第189页。

<sup>23</sup> 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远流出版公司（台北），2005年，第61页。

<sup>24</sup> （新西兰）魏纶、（美）吴燕娜《万里大墙——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黎明文化（台北），2007年，第190页。

灭绝的罪责，残杀的整个过程因此而显得像一道工业生产的处理程序。学者康正果论述说，中共的极权之恶则与这种机械化的恶魔之恶有所区别，那是一种瘾三之恶，恶得毫无意义，恶得极其下流猥琐，颇似阿伦特所谓的“平庸恶”。同样是不把人当人，前者的残害是技术性的，它把多余者的人命当清除垃圾一样处理，其目的主要是干净利落地消灭多余的肉体。后者则把残害发展成精致的恶作剧，加于肉体的伤害纯粹是一种凌辱，它就是要将你的人格尊严一脚踏扁。<sup>25</sup>当年的右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在集中营中不可能得到人道的对待。

中共的劳改营堪称是地狱最底下的一层。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固然恐怖，但它充其量只是个工业化的地狱、制造死亡的工厂，而中共的监狱则把地狱百态发展成一种类似杂技演出或竞技比赛的实验，人性在这里消失了，兽性在这里肆虐。在许多右派的回忆录中，他们都记述了劳改营中千奇百怪的精神摧残和洗脑术，而这一切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着——当年右派们的经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类似于廖亦武这样的异议分子身上仍然在重现着。<sup>26</sup>

### 对右派集中营的个案分析：夹边沟劳教农场

近年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右派集中营——夹边沟劳教农场终于浮出水面。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天津作家杨显惠，他的一系列文章以“小说”的形式，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这样一种夹缝中的写作及发表状况，亦生动地说明了当下中国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及新闻出版自由的真实情况。此后，这些文章结集成《夹边沟记事》一书，由于题材的敏感性，书稿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后来，由个体书商贺雄飞运作，该书得以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夹边沟记事》问世不久，即被中宣部下令禁止印刷和发行。风头过后，经过作者修订，这些文章又以《告别夹边沟》

---

<sup>25</sup> 康正果《破碎的受难——试论廖亦武从诗歌躁动到底层勘探的书写历程》，见《民主中国》网站。

<sup>26</sup> 参阅廖亦武《证词》，明镜出版社（纽约），2003年。

为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不久，再度遭到有关部门的查禁。另一本有关夹边沟的著作，为邢同义所著之《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并走访了多名幸存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了解甘肃的反右斗争，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夹边沟。”另外，丈夫王景超丧生于夹边沟、本人也在另一个劳改农场受尽折磨的“右派”幸存者和凤鸣，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回忆录《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有大量涉及夹边沟的内容。由此，夹边沟引起了当下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有学者认为夹边沟的悲惨故事甚至不亚于《扬州十日记》。笔者也曾经撰写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和《夹边沟的罪恶与死亡》两篇文章，介绍杨显惠与和凤鸣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无法在国内发表，只能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sup>27</sup>

夹边沟位于甘肃酒泉城东北三十公里，地理及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整个地形是一带形低地，南北宽一点五公里，东西长十五公里，本场位于带形的东部，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滩”。<sup>28</sup>夹边沟农场的名字沿用于附近的夹边沟村，而夹边沟作为村名的来源是：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百姓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sup>29</sup>

夹边沟农场创建于 1954 年，先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劳改农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十八劳改营教队。在许多劳改犯刑期服完之后，当时中央政策规定不准回原籍，于是夹边沟农场就改为就业农场。<sup>30</sup>这一阶段，农场在最多的时候关押了近六百名犯人，另外还有三四十名管理人员。<sup>31</sup>在“反右运动”之后，大批右派被转移到夹边沟，而原有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转移到他处，该农场蜕变为一个专门关押被判刑或情节比较严重而被劳动教养的所谓“极右分

<sup>27</sup> 这两篇文章收入余杰《天安门之子》，开放出版社（香港），2005 年。

<sup>28</sup> 夹边沟农场最早的史料《计划任务书》，转引自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4 年，第 9 页。

<sup>29</sup> 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4 年，第 9 页。

<sup>30</sup> 杨显惠《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03 年，262 页。

<sup>31</sup> 见《计划任务书》，转引自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4 年，第 6 页。

子”的现代奴隶集中营。

夹边沟是甘肃省诸多集中营中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之所以选择将右派关押至此，与当时甘肃的主政者崇尚“极左”政策有关，甘肃对右派的处理在各地算是比较严厉的。对此，和凤鸣指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惩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当时甘肃省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sup>32</sup>她还记载了一段地方官员关于夹边沟的谈话——

这年春夏之交，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与水利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张守宽在酒泉谈工作，张守宽听说夹边沟农场劳动很重，在那里的知识分子很苦，就说：“反右派斗争时，一直说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夹边沟劳教的右派我听说苦得很啊，这合适吗？”安振说：

“你不懂政治，没有读懂《联共党史》，如果在斯大林时代，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枪毙的。我们让他们来劳动改造，就是给他们最好的出路。政治是残酷的、无情的，你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你不懂。”这些话给张守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夹边沟右派们经受的苦难，当时的领导早就定下调，认为是“最好的出路”，右派分子们哪还会有什么指望。<sup>33</sup>

可见，该官员领会了毛泽东及中央的意图，以残酷无情的方式对待右派。也只有这样泯灭了同情心的官僚，才能够在中共的体制内生存下来。虽然当局告诉选择去夹边沟的右派说，他们有朝一日改造完成仍然有可能回到原单位，其实负责官员早已心知肚明，这些右派们大都是有去无回。

关于夹边沟农场中所关押的右派的人数，目前尚无定论，大致有以下三种比较确实的说法：其一，罗增福是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是邢同义找到的目前在世并愿意接受访问的惟一一位

---

<sup>32</sup> 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2006年，第41页。

<sup>33</sup> 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2006年，第59页。

劳教农场管理干部。2002年8月23日，罗对邢说：夹边沟农场分农场本部和新添墩作业站两处，本部的劳教人员有1600名左右，新添墩作业站有1200人左右，两处加在一起，劳教人员的总数应在2800人上下。绝大多数都是右派分子，少数是所谓的各种“坏分子”。<sup>34</sup>其二，夹边沟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幸存者高吉义，是《夹边沟记事》一书中《逃往》一章的主人公。高曾经透露，他当年听炊事班长刘杰说，全场右派分子为2963人。<sup>35</sup>其三，“文革”结束后，负责处理冤假错案工作的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燕斌，在其《延安生活片断》中写道：“对在夹边沟劳动教养的2369人，撤销原劳动教养决定，为他们恢复名誉，死亡人员家属给予妥善安置。”<sup>36</sup>而大部分调查者和幸存者均认为，夹边沟关押的右派，人数最多的时候接近三千人。《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说：“据1959年7月统计，全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也就是说，甘肃省的右派分子当中有超过五分之一被关押在夹边沟农场。<sup>37</sup>

众多幸存者在回忆在夹边沟的生活时，均以“不堪回首”一词来形容。那段岁月所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一辈子也无法弥合。幸存者虽然大都获得了所谓的“平反”，但“反右”的发起者和实施者并未受到法律的惩处，受害者也未能获得相应的国家赔偿。而更多的右派已经死于千千万万类似于夹边沟这样的劳改营，且死无葬身之地。有研究者指出：“大规模的‘虐杀、饿杀自己同胞’的罪行在中共劳改制度上尤其显著。成千上万无辜人民被逮捕、长期监禁、失去人身自由，挨饿受冻。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被迫长时间劳动，并且在‘改造思想’的大盖子下受批斗及肉体、精神上的刑罚。劳改、劳教犯中有无数‘冤、假、错’案，包括因政治运动被卷入、有预谋的迫害、栽赃、屈打成招等等。”<sup>38</sup>将右派分子送到偏远地区的集中营劳动教养，这一制度不仅残害了无数

<sup>34</sup> 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4年，第26页。

<sup>35</sup> 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4年，第25页。

<sup>36</sup> 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4年，第25页。

<sup>37</sup> 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4年，第25页。

<sup>38</sup> (新西兰)魏纶、(美)吴燕娜《万里大墙——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黎明文化(台北)，2007年，第17页。

的当事人，而且对整个社会形成可怕的震慑效果。

夹边沟之所以在甘肃诸多关押右派的农场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中，夹边沟出现了大批右派被饿死的悲惨状况。夹边沟农场的囚徒，有被刑求和被虐待而死的，也有患上疾病并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而死的，但更多人还是被饿死的。夹边沟农场中的右派分子的非死亡事件，既是当时毛泽东错误的经济政策的恶果的一部分，短短三年间，全国饿死的人数至少有三千万人；同时，又是甘肃省当政者将右派置之于死地的结果。当时，如果当局迅速调配粮食或者转移夹边沟的囚犯，本来可以避免惨剧的发生。但地方官员和夹边沟的管理干部根本无视右派们的死活，也许他们认为此种结局是右派们“罪有应得”。和凤鸣指出：“反右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把他们流放到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严酷与艰苦的所在地。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借劳动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饱过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sup>39</sup>这些掌权者对夹边沟及其他奴隶集中营中右派饿死的惨剧负有责任，但他们的官位却相当稳固。夹边沟农场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以若干研究者和幸存者的估计，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囚徒的死亡率大约高达80%—90%左右。

夹边沟的管理阶层漠视大批右派的死亡情况，但他们仍然要采取多种方法掩盖这一事实。比如，编造假病历便是他们的手段之一。杨显惠采访了一名有医生身份的右派，他承认自己曾受命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历。“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那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sup>40</sup>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与其他人一起完成了这项相当庞大的工程。“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

<sup>39</sup> 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2006年，第207页。

<sup>40</sup> 杨显惠《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03年，289页。

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律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sup>41</sup>

这些动作并非为了欺骗上级，按照中共垂直的、严密的管理机制，上级主管部门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发生在基层的真实情况，下级工作人员也不敢瞒天过海地对上级封锁信息。因此，与其说夹边沟的干部们主持编造病历的工作是为了对付上级的查处，不如说他们是为了欺骗死难者的家属以及避免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的位置。一个明显的事是：事后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和农场管理者受到严厉惩罚，只有少数人被调动到其他部门任职或者受到很轻的处分及批评。由此可见，一两千名右派的生命在当局眼中轻如鸿毛。

以夹边沟为代表的集中营出现大量饿死囚徒的情况，上级党政部门并不是后来才知道，而是长期假装不知道。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直装聋作哑，冷酷无情，他对普通居民大批饿死尚且无动于衷，又怎么会对那些他内心就本来极端仇恨的右派们有半点的怜悯呢？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常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这样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独裁者，又怎么会在意小小的一个夹边沟中的一两千人呢？李志绥感叹说，毛泽东对右派的“改造”，“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sup>42</sup>在这一意义上，死亡对于夹边沟饱受折磨的右派们而言，也许真的是一种迅速的解脱。

夹边沟只是众多右派集中营中的“沧海一粟”，我相信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肯定还存在其他的现代奴隶集中营。我期盼更多的历史被发掘出来，并共同构筑成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

<sup>41</sup> 杨显惠《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03年，290页。

<sup>42</sup>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出版社（台北），1994年，第204、205页。

# 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祭

姚仁杰

五十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运动，一场由执政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谋划并亲自领导的“反右斗争”，把中国的“革命”一步步引向封建法西斯主义。

毛泽东宣布建国才短短的几年之间，虽然颁布了第一部“宪法”文本，但接二连三的政治清洗运动，以及匆忙上阵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迅猛激化了原有的诸多社会矛盾，更孳生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思想观念不同而形成的新的歧见。主要体现在民主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对思想、政治控制的反弹，对当时实施的某些政策的质疑和不满，对落实宪法已经宣布了的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的追求。

执政党的政治诺言与时政现实的巨大落差，使执政党及其绝对控制下的政府，在人们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日益败落。但毛泽东远在取得国家政权还只统治着边区根据地时，就已经习惯于靠“一票否决权”排斥异己、靠“一言堂”固执己见，就已经在党内树立了绝对的政治权威，容不得不同意见。靠列宁斯大林主义及其“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模式的权术构建起来的专政手段也曾屡建奇功，并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而得到空前的强化。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承诺，实际上成为了限制独裁者一意孤行的绊脚石。毛泽东需要解决由于地位变化、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矛盾，甚至不惜抛弃“人民民主”与“联合政府”的伪装。

毛泽东亲自挂帅，反反复复鼓吹“双百方针”，反反复复号召并邀请民主党派与广大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帮助共产党克服自身的“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表面上看不能不是领导者想要扩大

民主的一种姿态，或是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让步”。但是，既然有了鼓励提意见的号召，又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政治承诺，有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宣言，政坛的民主人士，以及广大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大学生们积极参与整风运动，进而提出一些民主的诉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响应号召以至接受邀请，乃是运动发展的必然。有谁能逃脱这种大环境的大诱惑？有几多正直人士能够躲过？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是在借整风之名以“引蛇出洞”。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早已在张网设陷。广大“右派分子”，多数人也是像林冲那样误入了白虎堂。

鸣放中出现了超越“三害”的批评和意见，形成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自发的政治诉求，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例如：在北京大学，就自发形成了声言继承“五四传统”的民主运动。探究形成“三害”的思想根源与制度根源，这是史实，不足以怪的。读一读反右斗争中北京大学党委所搜罗编辑成册的、供批判用的《右派言论集》（主要采自大字报与各种座谈会、辩论会上的发言），既让人热情澎湃又惊心动魄，意境宏远，发人深省！

说毛泽东对整风与反右是预谋已久，而且是精心策划，这是有根据的，但要从“度”上去把握。引导并解决新的矛盾的预谋（群众称之为“阴谋”）是有的，连毛自己也承认，辩之为“阳谋”。但对过程和发展的谋划究竟有多么精心、多么英明，则是大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并不是处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要迷信那些愚民政策和造神者们的鬼话，不要过度深化毛的权术与阴谋。他无非借鉴了古今中外帝王统治的权术与谋略，特别是斯大林暴政式的借革命的名义所实施的狠毒手段。很多大事在受到批评和阻力时，他自己也明知是错，只是从不认错罢了。有如在其《选集》中的不少作为政策指导性的文章，编辑成书时，早已不是当初的原本面目，而是事后经过多次修改和注释而成的“雄文”了。对比之下的很多破绽就不难看出，作为独裁者毛泽东的霸道与无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痞味十足。这在毛的专横跋扈而又浪漫式的政治生涯中并不鲜见，特别是在他处于权力顶峰的晚年。

在独裁专制时期，一当形势的发展与预谋的进程失控，情急之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什么宪法？什么民权（人民利益）？什么同志？什么朋友？什么承诺？什么诚信？都可以弃之不顾。

不能说在夺取政权过程与取得政权之后的考量不会产生若干新的思虑，进城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进程赶考”的心态，应该说明一些问题。特别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秘密报告，使得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被掩盖了的，在斯大林控制党政大权的二十六年间，大量残酷镇压和屠杀与其政见不合得来元老、将军、干部与知识分子的暴行，既震惊了世界，更吓坏了奉行斯氏权谋的毛泽东。因而产生某些改弦易辙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心里发虚生怕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也会波及自己，不得不在极力辟清“中国没有个人崇拜”的同时，又更加强化对极权政制的掌控。此乃“一朝权完，满盘皆输”的政治赌徒的“正常”心态。

这就是五十年前的“整风运动”与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时期的大历史背景。整风是想缓和矛盾，企图把对自己不利的消极因素嫁祸于人（政策是好的，只是干部执行有偏差），以凸显发动整风的领袖人物的“伟大、光荣、正确”。

一当局面失控，参与整风的民主人士、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与群众掀起的扩大民主的烈火，要探根索源、追溯产出“三害”和种种时政制度的根源，意见提到“老和尚”头上时，燎原烈火烧向了决策者自己，就原形毕露，公然反右了。毛泽东不但把刚刚萌发的反对三害、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的民主新芽掐死，而且还恬不知耻地宣称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奏效，以显示其预谋权术的成功和“伟大、光荣、正确”。

反右斗争的直接结果是使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约五百万）的百分之十几的公民（而且是敢想敢言的精英部分）被“莫须有”罗织成罪，被戴上也是毛命名的“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不经任何合法程序，野蛮地打成政治贱民二十余年，在人间地狱受尽了身心的凌辱与凄楚，成为“人民内部矛盾”按照“敌我矛盾”处

理的历史大冤案。同时，这种杀鸡儆侯的社会红色恐怖，果然钳制住了天真地以为可以借助“大民主”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上的童稚之心。同时，也成千上万地绞杀了被运动推到对立面的假想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

这种表面上的辉煌战果，更使伟大领袖昏了头脑，主观、浪漫地进一步挥舞起“三面红旗”，以至于继续扩大反右的深度与覆盖面，导致了经济崩溃，饿殍遍野的三年“大饥荒”的出现。经过短期的反复，终于还导致了更具破坏力，几至灭顶的文化大革命。

反右派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和预演，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和完成！

这两次相隔九年影响深远而又一脉相承的政治大运动，都是毛泽东亲自谋划和发动的“阶级斗争”，其千丝万缕的相关性脉络，几乎都有蛛丝马迹可寻。就连操纵过程也都何其相似！所不同的只是随着一波又一波运动的发展，受害群体的相对数量与绝对数量都难以遏制地膨胀。据多种有关资料估计：毛执政的二十七年间，受害者（包括被株连的人）几仅一亿，其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就多达几千万之巨！真是骇人听闻，真是使人不寒而栗！

整个社会似乎发了疯，千百万人似乎患了精神病。以“内部文件”，或“最高指示”，或“评论员文章”，或党报的“社论”，鼓动一波又一波社会主义运动的狂浪，以“告密”向领袖“靠拢”，以“忠字舞”跳神式的歇斯底里展示着邪教的愚昧，以“早请示，晚汇报”的祷告昭示对教主的愚忠。毛泽东一咳嗽，干部、群众就哆嗦！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空前罕见的荒谬。可见，在中国特别是毛时代，开启民智推进民主进程有多么困难。在毛泽东独揽党、政、军、财、文大权的二十七年间，是人类历史上独裁极权政制发展的巅峰，为了维护专制和独裁者的宝座，不惜付出比想象还要惨重的血腥代价，而且无所不用其极。

纪念反右派斗争不只是哀悼几十万受难的右派分子，更是要哀悼一个接一个的政治镇压给全民族带来的灾难，包括受到株连的受害者们的亲人和朋友。也要吸取深刻的教训，想想这些倒行逆施怎样使执政党自身陷入越来越迷惘的困境。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去

反思，都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社会悲剧重演！

社会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极权政制与独裁者，还从来没有发过“罪己诏”，以图革新的暴君，有的都是固执己见，一条道儿跑到黑的孤家寡人。斯大林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其共有的特点就是始终坚持个人极权与专制政体，疯狂践踏民主与法制。

在纪念整风与反右，回顾整个过程时，最常被勾起心灵震撼的是成千上万投诉无门的冤魂苦鬼，以及那些经历人间炼狱而能一息尚存的老人。他们之所以还能坚守一点人格的底线，不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除了置诸天地鬼神而无所愧疚之外，还有的也就几根并不缺钙的傲骨。

对待历史的真相须以当事人的受害亲历作为基本的依据，而不是以事变的发动者与组织者们事后由其政治秘书与喉舌们所作的种种辩解去歪曲，去文过饰非，去颠倒黑白，去混淆历史功过，去伪造历史。以蛊惑群众，欺世盗名。

主要的历史责任应该由事变的始作俑者及最高层的领袖们来担当。连邓小平后来也承认：这类事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但当局的反思还是太少太少！

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以为，对反右的研究，既要对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与社会精英们的坎坷人生与政治沉浮加以研究，如章诒和做过的那样，多下些钩沉的功夫，还需扩大被研究对象的社会覆盖面，及各政坛的层次。要看看在“联合政府”的体制下，党的领导究竟是怎样运作的，政治的民主与文明究竟还有多大的空间？封建独裁的血色毒彩有多么斑斓。看看口头上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实际上的红色恐怖是怎样形成和蔓延的。更要对各位被迫害者的史实，进行抢救性的搜集、保存与研究，多发掘他们当时的真知灼见，看看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大学生们究竟想过、说过些什么？了解他们的心路。为什么那么多优秀青年所受到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群体性迫害，远甚于那些立于政坛上的头面人物？这是因为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毛要斩断民族的希望，把他们掐死在摇篮之中。我们有必要募集一笔基金，帮助这些底层的小人物，冲破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

的现实壁垒，使他们的笔录或口述笔录得以出版。集腋成裘，使亲历者的史料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唤醒社会的良知和正义感，促进社会整体的人文关怀和进步。用社会集资与接受海内外捐助的方式，把作家巴金建议的“文革博物馆”，扩而大之为“反右与文革博物馆”，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建立起来，先分散，再集中。先野草小花，再累累硕果。当你惊愕于甘肃夹边沟成百上千右派的冤魂厉鬼、天府之国大跃进年代的饿殍，以及“人相食”、“鬼唱歌”的惨象时，你才会明白那位高踞于神坛之上，而又贪婪于人间烟火，集古今帝王毛病于一身的伟大领袖的真实德性。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做人间地狱。你才会懂得芸芸众生为何不再对“救星”顶礼膜拜而视之为魔头。你才会明白一个执政党怎样去制造自己的信任危机。你才会了解什么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社会主义生活逻辑。你才能理解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东欧为什么会变色。你也才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要顺应民心搞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而政治体制改革却大大滞后，这既有原毛教左派势力的阻挠，又有当局为了维护其威权法统的苦衷与尴尬。但是，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毛教的不少邪说已经失去了往昔愚弄人心得迷彩。

毕竟“落花流水春去也”。当健在的人们可以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的时候，暴君已在“天怒人怨（四五天安门事件与唐山大地震”人神共愤的怒声中死去。虽然毛的幽灵还时隐时现，但一具僵尸已折腾不起大浪了。这是更大深层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谨以此文告慰屈死于毛泽东统治下的冤魂苦鬼！

谨以此文各位仁人志士、以及一切善良的人共勉。

五十年前的整风与反右，是一出以整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社会大循环，是一出没有真正赢家的社会大悲剧。是执政党“进城赶考”的负面成绩，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场大灾难！是毛泽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由衷祝愿：社会生活和谐！平等对话，不再盲从！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进步！

科学昌明、文化开放、经济繁荣、世界大同！

#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劫

钟沛璋

作者简介：1939 年入上海中共的地下党，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团中央候补委员。因“恶毒地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干涉”人大对其右派妻子的斗争，1959 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全部职务。被改正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现居北京。作者年事已高，不能来美国参加反右研讨会。本文为作者向会议提交的论文。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大劫。这场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它造成了怎样的祸害？这对中国的文明进程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只有经过认真反思，才能认识过去，看清中国未来应走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正以苏联为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满怀信心地奔向明天。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揭露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至高无上的领袖斯大林滥杀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者的罪行，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发生极大的震荡，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动乱，并开展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和大讨论。毛泽东感到要吸苏联的教训，结合中国情况，先后在内部发表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感到要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1957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对解放后一些年中，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一提不同意见，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的压抑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如逢甘露，感到春天的来临，唤起了对共产党提意见和参政的热情。特别是听过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录音（与后来经过修改后，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很大不同），感到欢欣鼓舞。着名翻译家傅雷给他儿子傅聪的信中就说：“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合贯通了的人。”当时，傅聪正在波兰学习，对波兰政局剧变感到战抖。傅雷劝慰他的儿子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可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怀着极大信任对党提意见的。他们都没有想起脖子伸长了，是要掉脑袋的（傅雷夫妇后来双双自杀）。

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为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举行了许多座谈会。

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登载学校系统座谈会报道，作了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说明他当时是想听取意见，通过整风来改进党风的。但是看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报道，谈到民主党派如何长期共存、有职有权，如何改变以党代政等批评，感觉就不同了。在看到批判“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批判”，“好大喜功、急攻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偏差时，就感到不能忍受了。毛泽东想起当年他只有8元钱工薪，当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不被北京大学教授看在眼里的情景。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给党内高级干部看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说要“硬着头皮听”，作好反右派的思想准备。那些身为民主党派领导的大知识分子并不知情，还是怀着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的态度，发生了一些高质变的“右派言论”。如：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特别是6月1日

在民主人士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子报》总编辑储安平后来被称为“党天下”的发言，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人们奇怪，原是响应号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怎么出尔反尔，忽然竟变成是“引蛇出洞”的阴谋呢？毛泽东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整风受到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不要相信。”最近这段时期以来，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对他们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历史浩劫，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场浩劫造成的祸害：

一、使当时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 55 万（官方公布数，实际远不止此数），原来是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大业的知识分子，包括从大学教授、小学教师、到大学生，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帽子，顷刻之间沦为社会贱民，受尽摧残。我当时所在的《中国青年报》社，是一个对建设新中国满怀激情的青年集体，所办的青年报不但为青年喜爱，也为中老年欢迎，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反右运动中竟有 17 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两位副总编辑和像刘宾雁这样的骨干。作为副总编辑之一的我，是一个 15 岁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1957 年整风鸣放期间并没有任何反党言行，却因 1956 年团中央高层领导会议上发表过青年团改革的言论，到 1958 年反右运动已结束时，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文化部长王蒙，法学权威江平等，说明许多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精英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落后贫困的中国，经过长期战乱，百业待兴，正需要原本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大显身手，

为国效力，他们却被劳改、流放长达二十多年，许多人甚至被迫害至死。其摧残岂是数十万社会精英，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有人说，如果法国一下子失去 500 个科学家、作家、音乐家、诗人，法国历史就会倒退半个世纪。而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使中国一下子失去的知识精英，何止成千上万！

二、破坏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专制统治中结成的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爱国同盟），使一些民主党派名存实亡，中国完全走向一党专政。

三、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三者，民信为先，民无信不立，民众不信任，国家是站立不起来的。反右使解放后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诚信，人们分不清是真话还是假话，是阳谋还是阴谋。

四、使人民内部分裂成为所谓左派与右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人为地制造人与人相斗的所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人人彼此戒备，不说真话。为了一己，不惜背信弃义，诬陷、告密，互相残害，使中华民族仁爱、信义的传统美德，丧失殆尽，形成亲不爱、子不孝、人相恶，与社会和谐完全相背的恶劣社会风气。

五、使知识分子丧失了作为社会良心、民族智慧必须具备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扼杀了全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使半个世纪来中国出不了大师级人才，攀登不了世界科学和艺术的高峰。

六、反右运动扫荡了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使领袖的意志成为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全国公社化、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无不一声令下，立即横行全国。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民陷于一场又一场的大灾难、大悲剧的噩梦之中。

人们只要清醒地面对这些惨痛的祸害，能够相信反右派运动是取得伟大胜利，“反右斗争是必要，缺点是扩大化”这样自欺欺人之谈吗？

《这是为什么？》这是反右运动开始，《人民日报》社论发出的问题。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反思中渐渐醒悟过来，这是为什

么。原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 1957 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历史浩劫，表明中国有延续两千年的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辛亥革命只是革掉了清朝皇帝，并没有反掉专制主义。五四运动掀起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思潮，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救亡压过了启蒙。直到全国解放，中国人民只是从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而并没有从专制主义的阴影下解放。毛泽东曾多次为千古暴君秦始皇翻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不了什么，他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在批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诗中，又肯定秦始皇的专制制度，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他还表明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说的马克思，是打着马克思旗号屠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的斯大林。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本来就是按苏联一党专政的模式建起来的。斯大林的暴政被揭发后，毛泽东为斯大林辩护说，这是因为“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而不是由于苏联的专政制度。波兰、匈牙利发生动乱后，毛泽东又说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1957 年 5 月发动整风，毛泽东心中的尺度，原来是不触动专政制度的改进党的作风。因此当他看到一些对专政制度的批判，超过他的限度，就立即警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本来是开门欢迎批评，立即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样也就可理解，他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因为毛泽东专制主义的思想本来是一贯的。

还应该看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是一贯的。《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在 1925 年发表的时候，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大资产阶级中就包括“反动派知识阶级”，他们是银行、工商高等员司、政府的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说“这一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反革命派。”这类“极端反革命派”，显然包括拿二三百元月薪，而不把只拿 8 元月薪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放在眼里的那些大

学教授们。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把大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作特务、反革命进行清查。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连续不断地发动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先是电影《武训传》，把文艺界、史学类、报刊编辑、记者，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列入批判对象。推崇过武训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逝多年，也遭到批判，并殃及他的子弟。接着发动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定性属于资产阶级的原罪。为了“脱胎换骨”效忠共产党，他们不得不作辱没自己人格的检讨，努力制造自己的奴性，而不得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接着，毛泽东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把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与朋友之间的私人往来信件，作为反革命的罪证，使 2100 名文艺界骨干被当作“胡风分子”进行迫害，大批被逮捕入狱。胡风本人被蒙冤 33 年，直到他死后三年才彻底平反。接着就是祸及我国知识分子近三分之一的反右运动。跟着是“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上这一切表明，1957 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历史大劫，不是偶然的，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一、中华要振兴，要走 21 世纪全球化的竞争之路，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必须首先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

二、要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必须使知识分子有做人必须具备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三、要使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自己的思想，必须有知识与赖以生存的环境，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因此必须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彻底铲除专制主义的顽根。

# 《陈铭枢上毛泽东书》读后感

章立凡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整风问题，最后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sup>1</sup>

一石掀起千重浪，毛泽东的这个公开表态，在党内外引起了震动。人们纷纷猜测：毛泽东为什么不想当主席了？中共党内反映谨慎，而在党外人士中，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 一 党外人士的两封上书

领会领袖心态比较到位的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老在信中说：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出看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

<sup>1</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3页。

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者，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四天之后，毛泽东对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 100 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并要求将此信及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sup>2</sup>

半个月之后才听到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内容传达的民革中常委陈铭枢，却在 5 月 18 日上书毛泽东，对他的不连任动议表示热情支持：

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 4 月 30 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

目前党中央领导核心空前团结，政权在握，内外翕和，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

---

<sup>2</sup> 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57、459 页。

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家犹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矣。

自大革命失败以还，您首创农村根据地，中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卒以旋乾转坤，翻开历史新页。以往数十年，您无一事不首当要冲，无一日不躬上斗争前线，亦无一日不与民休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亦尽知之矣！解放后，国家草创之初，万端待理，您殚精竭虑，有加无已。其后国家规模日具，体制日备，您以党的最高领袖，而兼国家元首，礼仪接待之际，不免受形式的约束。且一日万机，纵使巧手安排，亦难有从容宽裕的暇日。正由于此，自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事理乃尔，虽固无损君子之大德，而施济的宏效，与瞻瞩的境界，盖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于此时，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国家大事，深入工农群众，体察民间疾苦，并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且利用这暇豫心绪，增加深潜宽博的修养，更加强健身心，这不只有益于默察时宜，洞悉民隐，从旁补漏救弊，且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由于宁静致远，眼界开拓，对国际局势的演变亦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使社会主义阵营与人类和平事业愈加巩固发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举也。

陈铭枢除了举华盛顿为例，还谈到德国的俾斯麦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功成身退的故事，且复述了俾斯麦向威廉一世提出辞职的理由：

在位日久，将易主观臆断，耳目失聪。一己为珍惜声名，事有未放手，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功劳，纵有不肖，不忍也不

能去之。继起新锐，新鋒初试，必能割此痼疾，一扫颓习，已则从旁监督，旨锐力于将来，更为有利。

毛泽东对此信没有表态。两周后发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这封私人信件而受到严厉批判，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

## 二 毛泽东的“主席情结”

1957 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动议；1959 年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了他的提议，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1966 年毛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1970 年他坚决反对设立国家主席，最终导致“接班人”林彪的垮台。

一系列历史事件表明，毛泽东对国家主席一职没有什么好感，自己不想当也不喜欢别人当。但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其所由来者渐矣，须追溯到中共“八大”前他与刘、周的分歧。

毛泽东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就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身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礼仪性的职务，主要是出席国家重大活动、颁发政令和任免事项、接见国宾，令习惯于山中自在的毛泽东渐渐不胜其烦，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辉煌开国的荣耀渐渐淡化之后，毛感到他“熟习的东西”正在闲下来，而以往所不熟习的经济工作，却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指挥自如。

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过分歧。薄一波曾经谈到：“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主席在 1952 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 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sup>3</sup>

毛批评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在新税制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以组织上的分散主义错误为由，于 1953 年 3 月提

---

<sup>3</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 页。

议撤销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

同年 5 月，他又针对刘少奇等重申自己的权威：“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sup>4</sup>

上述这些分歧，后来诱发了企图推倒刘、周的“高饶事件”。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又急于探索一条比苏联更高速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诗人气质的领袖喜欢浪漫的飞跃，而务实的领导层则主张符合经济规律和国力。分歧在 1956 年几乎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发动了对邓子恢的批判，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掀起了 1955—1956 年间的全面冒进。周恩来不断地抵制冒进的形势，要求“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sup>5</sup>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周恩来、陈云在主持敲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方案时，将冒进时提出的过高指标全部降了下来，毛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被搁置。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 6 月 20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前刘少奇曾将这篇社论稿批交毛泽东审阅，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制。事后他抱怨说：“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两年后清算“反冒进”时，他更指责这篇社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sup>6</sup>

毛泽东的躁进方针与政治局的稳进战略发生了矛盾，他明显感

<sup>4</sup> 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0、81 页。

<sup>5</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532 页。

<sup>6</sup>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 页。

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无法在上层推行，需要重新树立权威（1957年5月的“整风”，就是重树权威的战略部署，笔者在《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一文中已作过分析）。

两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在9月10日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自己在历次党代会上当选和落选的情况：

“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指第二、四次党代会落选中委，第六次党代会未入政治局）；还谈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sup>7</sup>9月13日他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sup>8</sup>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政治报告报告中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此时正值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当口，“老大哥”苏共也历来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重申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新党章将原有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除了（据说是根据毛本人的提议），并真的接过毛的指示，在第三十七条第五款为他预设了一个职位：“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继续作出后退姿态，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不想当了。他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sup>9</sup>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

---

<sup>7</sup> 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sup>8</sup> 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1页。

<sup>9</sup>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62页。

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sup>10</sup>

毛泽东在“八大”仍当选连任党主席。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自称“跑龙套”的他再度放风：“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sup>11</sup>4月10日，他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再度变调：“我辞去国家主席之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sup>12</sup>此后就不再提辞党主席了。

这些都是他4月30日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前奏。待到5月1日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党外大老上书挽留之后，毛泽东才在该信的批语中说出了最关键的话：“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他虽不排除在“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出现时再度出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但坚持要求“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sup>13</sup>

毛泽东在两年后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终其一生，皆连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再也没有辞职的举动。“八大”与“九大”居然间隔了十三年，接班人问题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心病。

从“八大”前夕提出不当党主席，一变为“两个主席都辞掉”，再变为让出国家主席而留任党主席，直到十年后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并废除这个职务，虽然事态的发展有历史背景上的阶段性，心路历程却历历在目。

毛泽东很清楚——“党是领导一切的”。

“以退为进”是政治家的大谋略，但伟大领袖当时的战略意

---

<sup>10</sup> 转引自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sup>11</sup> 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sup>12</sup>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页。

<sup>13</sup> 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1957年5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58-460页。

图，熟读兵法的陈铭枢竟未参透。

### 三 陈铭枢对毛泽东的“规谏”

陈铭枢成名于北伐战争，在国民党中央曾历任十一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等要职。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领袖，1932年淞沪抗战的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皆其部下；1933年他参与策动“福建事变”，揭橥反蒋抗日。1949年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陈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儒将和诗人，又兼具佛学家的身份，别号真如居士，一生与熊十力、梁漱溟结下深厚佛缘。他在1950年曾三次上书与毛泽东论佛学，毛回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sup>14</sup>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两人就佛学进行了探讨，谈话内容至今未详，但毛显然没有接受他那套“佛学治国论”。1952年毛泽东痛批梁漱溟时，陈曾当场为梁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他后半生官越做越小，在民革属于非主流派。

这次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重新激起了陈铭枢参政热情。他在5月8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了学校的党委制后，对报刊摘要刊登他的发言表示不满；随后接受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建议，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发表在12日的《人民日报》上；16日他又在座谈会上提出：“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

18日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倒是既谈优点也谈缺点，还表达了对一部分民主人士政客作风的不满：

---

<sup>14</sup> 毛泽东：《致陈铭枢》（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

……我素稔您乐于与非党人士接触，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从旁观察，所常接触者，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建国后，党为化敌为友，对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人士，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很少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以次拔擢，累累若若，阉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以至党内有不平之气，党外啧有烦言，尤其甚者，新社会风貌受其玷污，工农干部受其影响，青年学生蒙其毒害。此种世俗之见，虽由来已久，但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相将成风，尤足殷虑。……

您此一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世界高洁宏大的风范，对于百千万党与非党干部，亦能使之发扬蹈厉，知所警惕。特别对非党人士之享高位，尤斤斤于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懼，风行革化，拭目可待。

陈铭枢希望毛泽东能够对以往的行藏有所反思，提高个人修养，特提出四条“规谏”：

由于您负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要求面晤，一罄所怀，确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尽规谏如下：

(一) 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 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 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四) 由于您对于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忱，这是共产党人最高品质，我是无限景佩的，而由此而产生的另一面极端——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论诗内的函件中有

“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之句。此虽是指您自己的诗词而言，但治旧体诗者，总以为是一种“刺隐”之笔，弦外之音，大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一个不慎。就您的旧体诗而论，何尝不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长呢？如开朗的胸襟，绝逸的旨趋，高亢的声调，简练的词汇，恢阔的风怀……等等，怎能因为是旧体而遽目为是谬种呢？说明了您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够尊重之处。……

读信至此，悟出陈荻颂“右派”顶戴，端的是咎由自取。

信的前半部分已指出了毛泽东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政策措施上“畸轻畸重，失缓失急”；最后的四条“规谏”，又总结出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的四大过失，领袖肯定不会闻过则喜。

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有一门谋略大法，叫做“揣摩学”。陈铭枢的国学修养，从上毛泽东书中可窥见一斑，惟独在这门学问上远逊于另外两位上书人。

黄炎培、陈叔通的“劝留”上书，其“连选不得过两任”的建言，从宪政建设的角度当然可取，但不写给毛泽东而直接写给刘少奇、周恩来，显有讽劝二位的深意，令刘、周无法开口，为毛预留发挥空间；而陈铭枢竟以“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直接向毛进言，偏要弄假成真，更有支持“反冒进”之嫌，越发令人不受用。终毛一生，何尝真正以国事信托于人？

陈铭枢在 1931 年调停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之争”，直接促成了蒋介石的下野，二人间的嫌隙即由此而生。二十六年后他旧调重弹，以党外人士之身“促退”毛泽东，才是贾祸的关键所在。

#### 四 历史令人扼腕

陈铭枢后来检讨说：“那时，我正在读《资治通鉴》，受它的影响也大，因此不自觉地视毛主席为汉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于汲黯之戆。”

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曾在 1957 年 5 月 13 日的座谈会上不点名

地公开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言辞虽然激烈，后来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五天之后陈铭枢以私人信件方式提出“规谏”，下场却截然相反。这两人观点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陈有“劝退”之语。公布个人来信以发动批判的手法，后来毛泽东还对彭德怀使用过。

再比较一下两封上书的作者结局：对不连任“期期以为未可”的黄炎培、陈叔通，曾在“反右”发动的前夕（1957年6月5日）受到毛泽东的深夜召见，面授机宜，后来安贵尊荣到老死；“以乃至美至喜之事”的陈铭枢，则贬职赋闲（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而终。

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树个人权威后，第一件事就是乘胜在党内“反右倾”，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彻底清算，然后按照自己的旨意发动了“大跃进”。毛对于张、陈二人的批评也一直耿耿于怀，曾在1958年1月28日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

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sup>15</sup>

同年的成都会议、汉口会议上，他也讲过类似的话。

毛在“反右”前的讲话中，曾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潜台词殆非检讨而是自负。这四个字简直就是“冒进”和“大跃进”的同义语，也是他对“好大喜功”的批评一触即跳的原因所在。

陈铭枢遭到重大打击后，晚年潜心修佛，行事低调，但仍不免私下臧否时政。如对“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他便讥评道：“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sup>16</sup>

最不顺耳的当属“下诏引咎”四个字。这番话与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的“右派言论”一道被整理上报后，毛泽东于 1959 年 7 月 10 日在庐山会议上旧话重提：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 1900 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 788 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 10 年到 15 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sup>17</sup>

<sup>15</sup>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 17 页。

<sup>16</sup>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5 页。

<sup>17</sup>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 57-58 页。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民革中央庆祝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4时逝世。距毛泽东祝愿他们这些人长寿的时间，仅隔六年，来不及观摩赶上英国后的盛世。

逝者的修佛友人之一熊十力先生，如是评价斯人：

其一生言动，大概胡胡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意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其来似有因，其去极自然。吾不能不伤感，而又不必伤感也……

同年12月21日及翌年2月17日，另一封上书的两位作者、同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陈叔通也相继逝世。

“真如居士”陈铭枢圆寂一年以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人庆幸佛法护佑陈逃过了这场人间浩劫。据说他的日记史料价值很高，惜迄今未见现身。

共和国的“上书史”中，有两位将帅最值得纪念，一位是共产党开国元帅彭德怀，另一位即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君子爱人以德”，着眼点各有不同，彭为民请命，陈则关注领袖的个人修养。如果毛泽东接受了这两位的诤谏，则后来的历史或将重写。

以陈铭枢的谔谔诤言，比照毛泽东晚年所犯的种种错误，可谓切中要害。他的上书中，还有一段讲民族精神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于世风日下的今日读之，更令人扼腕：

……我国民族素有温柔敦厚的气质，广大人民守法服从，若出天性。加以重理性，讲公道，爱和平，知恩报德。治国者苟能重视民族精神，导之以正，示之以公，齐之以严肃，人民之归附，将如水之就下，莫之能御。今天，在狂风暴雨之后，继以丽日风光，则上行下效，如影随形，如响斯应，其收功之速且大，可断言者。故来日大战，不患人民之不乐于赴命，而患在効于现在的水平，不发扬民族智慧和潜力的最高领域和最大的可能性。……

以国士诤臣自命，企望明主以师友待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殊不知他们心目中的明主，往往有叶公好龙之癖。

(原载《随笔》 2007 年第一期。作者简介请看前面的介绍。)

# 再论“反右”与“文革”

魏紫丹

## 一 “两个范畴”说

我在本文的所有论述中，紧紧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观点：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蒋介石，党内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一件是发动文革，党内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何以如此？从“立”讲，前者是建立共产党的“党天下”，这符合刘少奇们权欲的“分一杯羹”思想；后者是建立毛泽东的“家天下”，这是要满足毛泽东权欲的“吃独食”思想。从“破”讲，前者是“打倒反动派”，后者是“斗党内走资派”。

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确概念，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出现鸡同鸭讲。范畴是最高的概念。所以，我们首要的和必要的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反右派斗争是属于哪个范畴？我们明确指出：反右仍是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他洋洋得意于经过反右后，共产党的“党天下”成了铁打的江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是从“立”的一面说；从“破”的一面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把右派定性为反动派。所以，反右派仍是“打倒反动派”，是属于“打倒蒋介石”的范畴；而不是属于“打倒刘少奇”的范畴。再从党内反应说，也是“赞成的多，反对的少。”就是胡耀邦所说，当时党内有不赞成整风的，没有不赞成反右的。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标志，右派言论林林总总，一言以蔽之，则是“反对党天下”。毛泽东事先清楚，我们事后明了：反右派再彻底，也只能建立和巩固“党天下”，为“家天下”打基础；毛泽东就算把右派杀个鸡犬不留，也绝不能建成他的“家天下”；只有把党内（也包括在世界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苏共在内)的对手刘少奇们打垮,才能建成毛氏家天下。所以,文革和反右是决不容混淆的两个政治范畴。

## 二 “预演”说与“序幕”说

我说:毛泽东心怀鬼胎。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对双胞胎,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胎儿,所以他们的呱呱坠地就会是兄先弟后,先后有序。这将形成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差。

另一个是要搞掉中国出现的反斯大林主义,反个人崇拜的,如果说得更具体的话,就是会在他生前公开指出其错误(彭德怀),或身后作“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毛“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

所以我认为,说“序幕”或说“预演”,决不是两个简单的比喻之争的问题,也不是抠字眼,而是标志着对历史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之认可。说“序幕”,说“先河”,说“双胞胎”,或说“两只拦路虎”,或说“两堆垃圾”,或说“姊妹篇”,或说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这都是说反右派与文革是两个回合,是章回小说中的两回;这样的说法,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是“两个范畴”,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准确的。

## 三 整风目标是冲击“反冒进”的那些领导吗? ——再论1957年毛不可能发动文革

朱正先生在为参加纪念文革40周年而写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专文中,过细地反复地论证了他的此一看法,而且流传很广。但因为“基本依据”——“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与事实相去甚远,遂导致“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也即文革就就会发生在1957年这一看法,打根儿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对此,我将从两个方面,三条线索来进行探讨:一条主线索——右派对“反冒进”的态度;另外两条随之而来的附线索——一条是“反冒进”的周恩来,另一条是“反‘反冒进’”

的毛泽东；他们各自对于反右派与反冒进二者之间的关系之认识。

“预演”说，“彩排”说，“流产”说，以及虚构的“让民主人士冲击”说，在实质上是在美化毛泽东的居心，把历史的责任由迫害者转嫁给受害者，让人们糊里糊涂，从认识中放跑了罪魁祸首。

朱文的结论是，“可见从这个意义上是有理由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已证明：“可见”是无法成立的。因为“这个意义”是无中生有，“理由”是无源之水；所以“流产”论不得不沦为“破产”之论。

## 四 反右派的来龙去脉

文革并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大跃进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甚至反右倾也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大跃进的失败才是反右倾的直接原因；随后因因相袭，就填补上从反右派(始)到文革(终)的中间环节(大跃进，反右倾，继续跃进，七千人大会，四清)。经过这样清楚的定位之后，我们再来阐明过程的始末；首先是“始”：反右派运动本身的来龙去脉。

### (一) 远因

毛的反智主义，敌视知识分子是一贯的。史料表明，反右派斗争的发生，乃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改变初衷，是出于对主子唯唯从命，一切遵照执行。这里能够发现和说明的几个问题是：(1) 毛泽东一再表明是要让民主党派都退出历史舞台，但主子不批准，才改变主意，现在却说是“有意识留下”。说明毛从来都是按着他的需要，随意编瞎话的；(2) 发电报的时间是 1947 年。但辽沈、淮海、平津具有战略决战性的三大战役，却是发生在此后的 1948 年的 9、10、12 月，一方面的事实是国民党还有很大实力，另一方面的事是民主党派正充当毛所谓的反蒋第二战线的主力军，恰如鹰犬垂涎三尺地起劲追逐着前面摇晃着的骨头。正值此时，毛却打算完他们的蛋，

实行“党天下”，自己独吞预期的果实；（3）后来，经过大鸣大放，他发现民主党派当真要行使互相监督的职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灭民主党派的心迹。他于那篇背信弃义、声名狼藉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后来添加道：“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这里当然无需提出这一同样的问题：“至于共产党能否存在下去，还要看共产党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为，“人民”就是“毛自己”。而于最后，可能是“人民”看到，经过反右派后各民主党派的表现，犹如演傀儡戏，由共产党牵着线，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摇尾乞怜，跟屁逐臭，彻底走狗化，彻底名存实亡了，才暂且恩准它作为花瓶，“长期共存”，以观后效，以骗观瞻。

## （二）近因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讲近因，主要地是三个事件：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2，波匈事件；3，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

从内因外因远因近因，任何一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这些原因的总和来进行分析、判断，必然会引起个九九归一的结果，这就是，早已暗藏杀机的毛泽东，定要通过镇压，坚决扫除“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乌龟王八”！

## 五 文革与反右比较论

反右派与反右倾，在起因上有同质性，在手法与过程上有相似性，在恶果上有递增性。在恶果的递增性上表现为：经济上大跃退，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到了

文化大革命，不仅撮总而集大成地承继了所有运动的恶劣的方面，而且都使之发展到登峰造极。有人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导致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文道德的大幅度倒退，以至到 1976 年底，全国的生产力水平及国民产值降至 1949 年的水平——等于白干 17 年。”（《当年中共领袖个人崇拜行为之源起》<http://24hour.blogbus.com/logs>）

有了上面这些前因后果的铺垫，现在再讲“文革与反右的比较”这一问题，可以说已是水到渠成，迎刃可解。

- (一) 一个目的，两个目标
- (二) 一个阴谋，两套路数
- (三) 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
- (四) 反右与文革的来龙去脉，属于同一根源

反右派和文革的发动，是毛泽东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表现。如果毛要是以作好中国的统治者，办好中国的事情为满足，那他就该想方设法以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为鹄的。事实相反，他搞得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为什么？这叫什么话？回答这个问题，长话短说，就是毛当世界领袖的壮志未酬，仍需人民勇当炮灰。

他有多大的野心，就会遭到多大的失败，中国人民就会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的经验教训就会有多么的沉重！许多人各抒己见，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总结，下面我本着“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来略述我对作为个人的毛人生的意义的看法。

我在拙著《还原 1957》中写道：毛阴谋一世，落了个“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一辈子以“运动群众”为能事，而成就“霸业”；到现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全国广土众民山崩海啸、风起云涌，兵锋直达黄龙府。“四五运动”刚过，毛第二天给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说：“广场，外地，都搞得火热，悼念总理，要邓小平上台，这都是针对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后台。”据说，毛真的变成了他自己说别人的：“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面对着自己过去的“过五关，斩六将”，譬如，对着解放军的入城式，群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本该趾高气扬，却是泪

流满面长叹息！周恩来的秘书说：“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已。毛泽东请常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28页）

《矛盾论》上说，矛盾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发展。玩弄群众运动的毛，发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尝到了群众运动的滋味。阴谋诡计、作恶多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政治性命。这就是必然的规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不见了；“我们是秦始皇的100倍！”的骄横不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不见了；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杀气腾腾不见了……“俱往矣！”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一切都等待着历史法庭的严峻审判。

毛泽东在庐山批周小舟时，曾说过这句西谚：“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页153）如果从他一生中吸取个人人生教训的话，那就是，要想“笑得最好”，就要争取做到“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万物同笑，“笑到最后”。千万别学毛，嘴巴说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际做的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从斗天，斗地，斗人中，求得“其乐无穷”，直到斗得“不亦乐乎”，最终做了一个哭到最后，哭得最惨的孤家寡人。

综观以上的归因分析，有远因，有近因；有外因，有内因；有共产极权制度的原因，又有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是否全面？是否正确？是否还原了1957？作者蚕吐丝，读者是杆秤。

# The CCP's Strategy of Media Control in the 1950s

By Jiang Shao

邵江

## 1. A Brief History of Unofficial Magazines

Magazines present a striking paradox in the Chinese context: China was the fir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develop print culture, yet it never produced an unofficial magazine until the late 19th century. Star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619—917), woodblock printing was used to produce *dibao* or “official newspapers” to transmit announcements, messages and news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official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960—1278), *dibao* became available to a limited number of selected scholars and literati, but were strictly censored on sensitive topics such as natural disasters, military information and official secrets.<sup>1</sup>

The English word “magazine” comes from the Arabic *makza*, which means “storehouse.”<sup>2</sup> Magazine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fields where thoughts are stored and disseminate further thoughts.<sup>3</sup> The earliest periodicals in Europe appear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00s. They were usually collections of summaries and essays on phenomena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he earliest known use of the word

<sup>1</sup> Ge Gongzhen, History of China’s Newspapers Studies, p. 25-28.

<sup>2</sup> AskOxford ([http://www.askoxford.com/concise\\_oed/magazine?view=uk](http://www.askoxford.com/concise_oed/magazine?view=uk)), Oxford dictionary and Penguin English.

<sup>3</sup> Interview of Zhang Yuanxun and Chen Fengxiao.

“magazine” to denote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f a collection of texts and images occurred in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by Edward Cave in 1731.<sup>4</sup> What is interesting about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is that one can already see the outline of the main elements of what the word “magazine” would later come to mean in English. The term “magazine” has many synonyms such as “periodical,” “journal,” “review,” “serial,” “daily,” “weekly,” “monthly,” “quarterly,” “annual” and “gazette.” Although something of a hybrid genre, magazines typically shar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A magazine is an “open text,”<sup>5</sup> i.e., a collection of miscellaneous texts or images that encourages the reader not only to understand but also to overstand what is written.

A magazine aims to influence public views.

A magazine is published at regular intervals.

A magazine comments on events rather than reporting news.

A magazine is reproduced in multiple copies

The first modern magazine published in China was written in English and entitled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It appeared in Macau in the 1820s, and its contents were mainly Christianity, news and science. In Chinese, a magazine is called *zazhi*, a word composed of two characters, *za* and *zhi*. According to the Han Dynasty etymology (*shuo wen jie zi*), *za* means “five colors mingled together” and *zhi* means “records.”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Chinese word *zazhi* is therefore “miscellaneous record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earliest example I have come across of the characters *za* and *zhi* being combined into a new word *zazhi* was a translation by John Macgowan of a magazine called *Shanghai Miscellany* (1862-68).<sup>6</sup>

The first unofficial Chinese magazines appeared in 1896, after

---

<sup>4</sup> Newspapers, [http://www.georgianindex.net/publications/newspapers/news\\_sources.html](http://www.georgianindex.net/publications/newspapers/news_sources.html).

<sup>5</sup> Umberto Eco.

<sup>6</sup> Ge, p. 27.

China had been defeated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organized a Society for National Strengthening and published two issues of a magazine called *Qiang Xue Bao* (National Strengthening Paper). Both Kang and Liang advocat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their magazine included petitions by a group of Chinese scholars to Emperor Guangxu calling for governmental reform. During that same year, another magazine, *Su Bao*, eventually taken over by Zhang Taiyan, supported the ideology of revolution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Qing dynasty.<sup>7</sup>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year 1896 launched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unofficial magazines, which boomed during the Wuxu Reform and the Xinhai Revolution, providing a forum of debate on reform versus revolution, and pushing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groups.<sup>8</sup>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1911, the number of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continued to increase despite stricter censorship from the regime. During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Xin Qingnian* (New Youth) and *Xin Chao* (New Tide) were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magazines disseminating concepts such as science, democracy, liber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Xin Chao* magazine was affiliated with the Xin Chao Society, which provid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series of movements that followed. The challenge posed by unofficial magazines led to attempts by regimes to suppress the magazines by bribing, imprisoning or even assassinating writers and editors and closing down the publishers.<sup>9</sup> However, these

---

<sup>7</sup> Ge Gongzhen and Zhou Nansheng analyzed why Chinese were involved in the press: there was no vo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magazines and papers, although some writers were Chinese; there were different aims for foreign and Chinese staff; the Chinese press could encourage Chinese to read papers and magazines in their daily life, reject the dogma under which Chinese did not qualify for discussing China's issues, and estab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ee Ge Gongzhen, p. 115 and Zhou Nansheng, p. 220.

<sup>8</sup> See Yu P. K. , Li Yu-ning and Chang Yu-fa,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 A Guide to Chinese Periodicals.

<sup>9</sup> Fang Hanqi, A History of China's Recent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1981, Zhang Jinglu, History of China's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Publishers. Among the journalists

threats only served to increase public support and protests, which in turn forced the authorities to compromise on many occasions. As governmental control weakened, unofficial magazines began to enjoy increasing popularity, and featured not only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but also other aspects of life such as art, literature, entertainment, fashion and taste. The boom of unofficial magazines also promoted a reform of literature, with *baihua* (vernacular Chinese) replacing classical Chinese as the written language in mainland China after the 1920s.<sup>10</sup>

## 2. The Magazine as State Apparatus

### 2.1 Consolidation of party power

I will look at three significant methods used by the CCP in its struggle for and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he three mechanisms used wer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s (MACs)—*Junguanhui*—maintained and wielded power, causing terror in society through political campaigns that employed mixed measures of use, restriction, reform and elimination to force people to submit to CCP ideology and rule. The CCP allied with the Soviet bloc countries to garner international support, and to defend and expand its power against the KMT and its American allies.

#### 2.1.1 Military mentality and practice

From its birth in 1920, the CCP regarded magazines, like all other media, as key revolutionary weapons to spread its ideology and influence

---

and editors killed were Shen Jin (沈荩), Bei Xiaowu (卞小吾), Shao Piaoping (邵飘萍), Lin Baishui (林白水) and Shi Liangcai (史量才);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8129>, [http://www.boxun.com/hero/fuguoyong/3\\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fuguoyong/3_1.shtml).

<sup>10</sup> Chen Pingyuan,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Chinese Novel, <http://sjeas.skku.edu/upload/200605/Chen%20Ping-yuan.pdf>.

to the public. Mao regarded the “pen barrel” (the media) as one of the two most effective weapons to achieve power, the other being the “gun barrel” (violence).<sup>11</sup> Magazines helped the CCP create alliances to oppose and ultimately defeat the KMT.<sup>12</sup>

Following the defeat of the KMT army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n 1947, the CCP gradually expanded its power throughout mainland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ctober 1949, while the KMT government escaped to Taiwan and continued its rule there under the na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Civil War period and the initial years of CCP rule, the CCP not only eliminated or arrested KMT memb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who were considered dangerous, but also carried out strict social and media control. With its military victory in 1947, the CCP first set up MACs in whatever areas the PLA had taken over from KMT control. The top PLA leader in the area, as the director of the MAC, served as the highest local official in the years between 1947 and 1953.<sup>13</sup> Although a few members of allied parties were sometimes included in the military committees, they had minor roles under CCP control and were subordinate to CCP branches and directors.<sup>14</sup>

To consolidate power, the CCP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further measures. First, the MACs took over the cultural sector, including

---

<sup>11</sup> Chinese News history, 1985 edited by News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 News History in Shanghai, edited by Ma Guangren, 1996

<sup>12</sup> Ibid, and “Yanan’s talk and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Mao 1938) in Mao’s selected works

<sup>13</sup> Some areas were administrated by MACs earlier than 1949, such as the Northeast area; others were taken over by the CCP administration in 1952. See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o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struction: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06/content\\_2300870.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06/content_2300870.htm). PLA history,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jssdjt/2005-10/11/content\\_311579.htm](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jssdjt/2005-10/11/content_311579.htm).

<sup>14</sup> Non-CCP members of MACs played a lesser role than their colleagues in the CCP’s “Central United Government” in 1949. The “United Government” included other parties that opposed the KMT. But CCP members occupied all the most significant administrative sectors such as the military, the media, foreign relations and finance. After 1957, almost all the members of other parties in the CCP government disappeared. Zhang, Yihé and Xie Yong, Other Parties in China after 1949,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71449&ad=4/26/2007>.

schools and publishers, KMT government agents, police bureaus, military bases and financial departments, including banks and factories.<sup>15</sup> Second, all non-communist magazines were confiscated, and news agencies were strictly instructed or monitored by MAC branches. Within a short time, publications had to obtain licenses from their local MACs if they hoped to continue publishing. Third, MACs ordered most foreign media and journalists to cease all publishing activities.<sup>16</sup> The MACs permitted only selected foreign publications and news agencies in these areas to continue publishing CCP propaganda for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These reports, which helped the CCP export its influence abroad, were then imported back to China to strengthen the CCP's internal propaganda efforts. For example, four foreign journalists were allowed to report on celebr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one from the USSR, one from Italy (*L'Unità*) and two from North Korea.<sup>17</sup> During the Korean War, journalist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lan Winnington from *Daily Worker*)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permitted to cover news events organized by the CCP, including a visit to North Korea.<sup>18</sup>

During the 1940s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small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to establish unofficial radio stations because of lim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but some unofficial radio stations existed before 1949 in KMT-controlled areas. After 1949, the CCP confiscated all unofficial radio stations. In addition, the CCP mastered the revolutionary functions and strategie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prevented the rebirth of unofficial magazines that would challenge its power. MACs often instructed CCP media to take over KMT media offices. For example, the newspaper *Jiefang Ribao* (Liberation Daily, the

---

<sup>15</sup> Chen Yi, *Report on the Takeover of Shanghai*,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4/69126/4742113.html>, and Structure of the Hongzhou MAC, [http://www.zjda.gov.cn/show\\_hdr.php?xname=CP0GHU0&dname=ESNAIU0&xpos=24](http://www.zjda.gov.cn/show_hdr.php?xname=CP0GHU0&dname=ESNAIU0&xpos=24).

<sup>16</sup> *People's Daily*, 1949, 北平军管会发出通令 停止外国通讯社及记者活动.

<sup>17</sup> *People's Daily*, 22 September 1949. See also Fang Hanqi, *China's Media History*, vol. 3, p. 55.

<sup>18</sup> Feng Hanqi, vol. 3, p. 65.

CCP organ in Shanghai), took over *Shen Dao*, the longest-running newspaper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sup>19</sup> Before the PLA took over an area, the underground CCP branch in that area assessed and catalogued all local media so the MAC could deal appropriately with them.

In November 1949, the CCP set up a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GAPP) for the PRC,<sup>20</sup> with agents at the central, provincial and local level monitoring various media and reporting on them to the MAC. In July and August 1952 three regulations were introduced: 1) a “Temporary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n books, magazines and publishing,” 2) temporary magazine registration methods, and 3) provisions regarding prohibited books and magazines.<sup>21</sup>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type of regulations required all magazines to obtain licenses from the authorities, while the ideological tendencies of the publications were directly monitored by CCP propaganda bureaus and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at the central, provincial and local levels. The third regulation was aimed at prohibit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books and magazines. An additional monitoring regulation for magazines and books<sup>22</sup> was promulgated in October 1952. Furthermore, there were regular instances of “invisible control mechanisms in Chinese Media.”<sup>23</sup> After 1952, the MACs were eliminated and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s took charge of controlling and monitoring magazines.

---

<sup>19</sup> Ma Guangren, *Shanghai News History*, p. 1089.

<sup>20</sup> History of the PRC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2/26/content\\_746710.htm](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2/26/content_746710.htm).

<sup>21</sup> 《全国报纸杂志登记办法(草案)》(1950年)  
(<http://www.ipo.gansu.gov.cn/zlzx/images/zzqfjxgfg/1583.htm>).

<sup>22</sup> Ren Bumei, 50-Year Publication Control History, [http://www.boxun.com/hero/renbm/13\\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renbm/13_1.shtml).

<sup>23</sup> The ‘Invisible’ Control Mechanism in Chinese Media,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4/06/the\\_invisible\\_c.php?show\\_all=1](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4/06/the_invisible_c.php?show_all=1). There is a regular control regulation: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4\\_20\\_8\\_7\\_57\\_790.html](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4_20_8_7_57_79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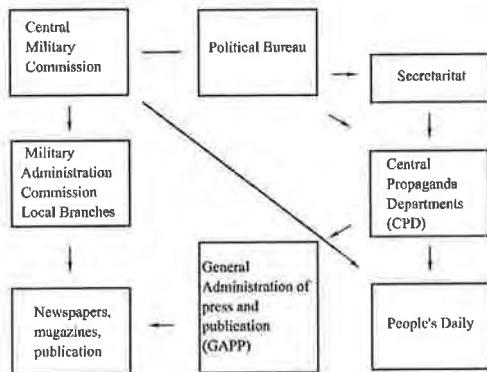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media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CCP

Arrows in Figure 1 indicate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authority. From 1949 to 1952, the MACs and their local branches controlled all the media, including newspapers, magazines, books and radio stations, with the advice, monitoring an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of GAPP. Between 1952 and 1982,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CPD) and its local branches controlled the media directly. Since 1982, the CPD and its local branches have set direction with the advice and control of GAPP and its local branches, which then implement the direction. *People's Daily* is the central Party committee's organ and the propaganda model for all official newspapers.

### 2.1.2 Political campaigns

Between 1950 and 1953, the CCP began a series of campaigns such as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Land Reform*<sup>24</sup> and *Oppose America, Aid Korea* to strengthen its power. The *Oppose America, Aid Korea* campaign helped the CCP form and consolidate its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nd advocate nationalism and mass cohes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power. A series of terror campaigns combined persuasion and threats to pressure and brainwash individuals. Moreover, the CCP formed an official work union controlled by CCP branches in the cities to enforce

<sup>24</sup> In some CCP-controlled areas, Land Reform took place before 1949.

the Party line, monitor employers' thinking and control personal income.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s of publishing, education, culture and health, in particular, were put into various work units<sup>25</sup> controlled by CCP branches. Personal income and political opinion were controlled under the work unit system.<sup>26</sup> Thus, freelance writers and publisher who had been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before 1949 were required to join work units controlled by the authorities as the CCP proceed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totalitarian system.

Moreover, Mao's policy on intellectuals was to use, restrict and reform intellectual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power. It was for this purpose that the CCP waged its *Thought Reform* campaign (1951-52), imposing administrative and regulatory measures to force all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s of publishing, education, culture and health to follow and promote Party ideology in whatever they taught, researched, wrote and presented.<sup>27</sup> All professionals were obliged to study official ideology and undergo self-criticism, and the criticism process had to be accepted by their CCP branch.

The Thought Reform campaign was succeeded by a series of campaigns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criticism of the film *Wu Xun's Story*<sup>28</sup> as well as two famous scholars, Hu Shi and Yu Pingbo (1954-55). The purpose of these campaigns was to cut off and dilute the influence of non-communi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r, using the CCP expression, "bourgeois ideology")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mmunist ideology as the norm and model. Propaganda became increasingly subtle and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many Chinese. These campaigns caused anxiety among professionals who were labeled as pursuing bourgeois ideas in opposition to official

---

<sup>25</sup> See Wei Chengsi's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of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sup>26</sup> Wei Chengsi, China's Intellectuals Since 1949.

<sup>27</sup> Xie Yong, Origin of the Thought Reform Campaign and its Influence on Intellectuals [http://www.boxun.com/hero/xieyongwenji/17\\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xieyongwenji/17_1.shtml).

<sup>28</sup> Mao declared that Wu Xun w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ist,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6/content\\_2342492.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6/content_2342492.htm).

ideology, and who feared becoming the targets of criticism and failing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sup>29</sup> In addition, the CCP advocated training “new socialist intellectuals” to replace the “bourgeois” scholars.<sup>30</sup> This take-over propaganda model became an effective and common strategy for the government: the CCP’s endless campaigns made promises to different groups, labeled them as privileged social groups or classes, and mobilized them against whatever group the CCP needed to crack down on at any given time. Thus the CCP gained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monitored heterodox thinking.

The *Purg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campaign (1955-56) continued the strategy of eliminating the enemies of the CCP. However, this time it mainly focused on enemies within the CCP and among its allies. The “Hu Feng counterrevolutionary group” was one of many targets identified in this campaign.<sup>31</sup> Hu Feng and his friends were imprisoned in a labor camp for more than 20 years because Hu sent a petition to Mao criticizing the Party’s cultural policy. The CCP had regarded Hu Feng as its close ally when the KMT ruled mainland China. Hu Feng had published magazines that expressed support for CCP ideology before 1949, and wrote poems in praise of the CCP and Mao immediate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counter-revolutionaries had to be suppressed wherever they were found, the CCP and Ma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ir suppression to innocents who had sympathized with Hu Feng. The CCP campaigns “had a deterrent function vis-à-vis the population, who assisted in institutionalizing the lie (propaganda).”<sup>32</sup>

---

<sup>29</sup> Zhun Ming, Who judges history? Criticizing the Yu Pingbo Movement,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228](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228).

<sup>30</sup> Thought Reform and Training New Socialist Intellectuals at People’s Daily, Fang Lizhi interview,

<sup>31</sup> Ding Shu, *Public Conspiracy*, p. 67-82.

<sup>32</sup> Rupnik, p. 275.

### **2.1.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old War followed close on the heel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CP and the KMT continued their struggle for power following Japan's surrender. Civil War broke out from 1946 to 1949, immediately after China became one of the victorious nati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even though although the CCP and the KMT had formed a temporary alli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Sino-Japan War. After 1945, Communist troops defeated Nationalist troops with the help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lso, initially, the U.S. Following the KMT's takeover of Taiwan, the two sides ultimately established separate overseas alliances, the CCP with the Soviet bloc and the KMT in Taiwan with the American bloc. The CCP broke all relations with the ma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establish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s its most significant diplomatic strategy, resist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 KMT returning to mainland China with help of the U.S. Soon after 1949, many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ut some significant excep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sisted on the KMT's Republic of China (ROC) a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PRC maintain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bloc an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Denmark, Finland, Sweden, Switzer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which recognized the PRC in the early 1950s.<sup>33</sup> As public relations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Soviet bloc countries, China attempted to keep its influence in the West while preventing and blocking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 from entering China. Thus, Chinese thought and ideology was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and reconstructed by official ideology imported from the Soviet bloc.

---

<sup>33</sup> *People's Daily* and Francoise Mengin,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Political Extensions to Europe—Taiwan Economic Ties,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download.php?file=%2FCQY%2FCQY169%2FS0009443902000098a.pdf&code=9df9ffa7165be4915bc15f69c7fae16>.

## 2.2 The Censorship Mechanism

The CCP had no special understanding of magazines, simply viewing them as another propaganda medium to persuade the masses to support socialism and CCP rule. In this sense, the CCP did not distinguish magazines from other propaganda media such as radio, books or newspapers.

The CCP's main control methods from 1949 to 1957 included not only militariz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edia, as described above, but also circulation control and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publishers to direct state control. In this way it formed a propaganda prototype in which 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we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to construct a totalitarian system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society.

Whereas before 1949, publishers could publish their materials with limited censorship, under China's post-1949 totalitarian system, public space was to a great extent destroyed by the indoctrination and violence of the regime. Under a totalitarian system, 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led to a situation where people could not form an independent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s citizen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The CCP carried out continuous campaigns to force people to adjust their memories in terms of what to forget and what to remember; that is, to forget civil resistance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while remembering current official ideology. In the same way, censorship blocked out any thought that contradicted the regime's current purpose while continuous propaganda strengthened the CCP's current ideology.

It is rather ironic that the CCP used the magazine to climb its way to power, then turned around and abolished all unofficial magazines. After the CCP came into power in 1949, it began to suppress and eliminate all unofficial media as well as tightening controls on the official press. All remaining magazines had been founded by the CCP or its allies in the

early 1950s.<sup>34</sup> Soon afterwards, magazines run by the CCP's allies were also closed down, confiscated or transformed into Party media.<sup>35</sup> From the mid-1950s, the number of official magazines began to increase. The CCP also used the *dibao* model — *Neibu Cankao* (Internal Refer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which was strictly limited to senior CCP officials. The down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KMT taught the CCP that it could never have come into power if the KMT had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press. The CCP regarded people involved in unofficial magazines as anti-CCP, persecuting them ruthlessly under the labels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groups”<sup>36</sup> or “groups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Many editors, participants and supporters of unofficial magazines were executed, imprisoned or sent to labor camps.<sup>37</sup> For this reason, most unofficial magazines had to exist secretly as underground media. In addition, the CCP continuously purged dissidents within its own ranks and imagined enemies of the Party in order to prevent potential alliances between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magazines.

Besides military and financial control and its monitoring process, the CCP controlled all magazine circulation, and all postal service and paper supply. Publications were mainly circulated through the Xinhua bookstores<sup>38</sup> supervised by local CCP branches and GAPP, and any sensitive content in official magazines was suppressed in a timely manner through the magazine monitoring process. The circulation of a few private publishers was controlled by Joint (*Sanlian*) Publication,

---

<sup>34</sup> Chinese News History, 1985, edited by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Peer Magazine Discourse in the Early 1950s,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740](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740).

<sup>35</sup> He Qinglian,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Media,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4/10/200410262324.shtml>.

<sup>36</sup> In 1997, “China has merely replaced the term ‘counterrevolution’ with the equally elastic notion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In “Whos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in China’s New Criminal Code, A joint report by Human Rights Watch/Asia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http://hrchina.org/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17161&item%5fid=14336>. See also Security as Justification, [http://www.helsinki.fi/nacs/nacs2003\\_papers/nacs\\_papers\\_fulltext\\_vuori.pdf](http://www.helsinki.fi/nacs/nacs2003_papers/nacs_papers_fulltext_vuori.pdf).

<sup>37</sup> See counterrevolutionary groups in Zhang Yanxun, Beida, 1957.

<sup>38</sup> History of Xinhua Shudian, <http://www.xinhuabookstores.cn/show.php?id=578>.

under monitored by CCP branches.

Some magazines that were very friendly to the CCP and were initially allowed to continue publishing nevertheless discontinued publication shortly after 1949 because the CCP organizations that controlled their circulation refused to distribute unofficial magazines. To take Hu Feng as an example, his *Qidian* (Beginning) was allowed to register, but stopped publication<sup>39</sup> after three issues because of lack of distribution. Although Hu Feng and his peers resisted the KMT's press control before 1949, many of these professional editors and writers not only adhered to the CCP's line but also demanded that their thought tendency peer groups toe the line as well,<sup>40</sup> resulting in the annihil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sup>41</sup>

### 2.2.1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publishers

Between 1949 and 1951, all non-communist media founded before 1949 were taken over, confiscated and reorganized, and then re-registered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MACs in accordance with totalitarian rules on education, culture and publishing. In 1948, the CCP announced a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n Chinese and foreign newspapers, media and news agents.” According to this regul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media should not follow the model of other private companies but should be taken over and controlled by the Party. Generally speaking, other private companies were allowed to continue running from 1949 to 1952 if the CCP judged that the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KMT. But all private media were taken over by the MAC,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were relevant or irrelevant to the KMT. Not all private assets were confiscated, but exceptions were made only when the private investors had no influence over the editing, publication or circul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After 1953, all investments in publications

---

<sup>39</sup> Take Hu Feng an example,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740](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740).

<sup>40</sup> Ibid.

<sup>41</sup>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other private companies were required to be sold to the state.

### 2.2.2 Control of magazines

The few magazines labeled by the CCP as allies had their editorial boards controlled and monitored by CCP branches. Meanwhile, all printers, paper suppliers and print media distributors were controlled by official publication agents.

The CCP not only shut down or controlled all private magazine agencies but also repatriated, arrested or even killed the majority of reporters and editors who had operated before 1949. In 1945, there were 1,848 magazines (146 state-owned).<sup>42</sup> Between 1949 and 1950, there were 295 magazines.<sup>43</sup> Out of a total of 10,000 media reporters, 99.3 percent were trained by the CCP, according to 1950 statistics.<sup>44</sup> Only 12 percent of all editors worked in unofficial media.<sup>45</sup> In my research I could not identify any unofficial magazines earlier than 1957, after the CCP came to power.

Chu Anping was one editor who survived after 1949. In 1957, he was labeled a “rightist” and disappeared. In the Mingfang period, he criticized the CCP as the “empire party,” and became famous for his statement, “Under KMT rule the



Figure: Original Square cover

<sup>42</sup> Fu Zhengyuan, p. 164,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hina Handbook 1937-1945, New York: Macmillian, 中国报刊投稿指南, 1952.

<sup>43</sup> Zhongguo Baokan Dougao Zhinan.

<sup>44</sup> Feng Hanqi, vol. 3, p. 53.

<sup>45</sup> Ibid.

question was whether there was *enough* freedom; under CCP rul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re *is* freedom.”

For the CCP, magazines, like newspapers, were a means of controll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propaganda and totalitarian language to force the individual to become “an automaton, a walking corpse” and society to become *Homo Sovieticus*<sup>46</sup> through violenc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 existential philosophy of the individual under totalitarian rule thus “prefers internalized self-censorship to institutionalized censorship.”<sup>47</sup>

---

<sup>46</sup> Jacques Rupnik, Totalitarianism Revisited in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Keane, p. 273-4.

<sup>47</sup> Rupnik, p. 277.

# 反右会议后记

# 普林斯顿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研讨会拾掇

齐家贞

六月六日和七日，由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

大会邀请了不少当年的知名右派和卓有成就的反右运动研究者，尽管其中部分人在中共直接威胁或动员子女家属阻止的情况下无法前来，仍有一批人不顾险阻、不计后果、“智斗座山雕”赶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了会议。别提这些人上台发言论理，就是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坐在下面当听众，也绝非易事，个个勇气可嘉。

岁月不饶人，这些五十年前激情飞扬、风华正茂的青年知识分子，今天最年轻的也已七十岁，平均年龄超过七十五，真的是垂垂老矣了。《开放》杂志报导，中共内部透露，现在只剩一万另三百个右派还活着，按照他们认账的打了五十五万右派的数字算，超过98%的人已经含冤去世。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弘达致开幕词时讲：这一百万右派的历史是无法抹煞的，它将永远留在中国、世界的历史上……以后还开不开这种会，我不知道，我们都会走向人生终点。

我们为已经发不出声音的人默哀，有幸活着的右派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时不站出来为历史作证，更待何时？

这样一个沉重的会议，我沉重的心拽着沉重的笔，记下了某些人某些印象较深的话语，以资纪念。

余英时（著名史家，中国信息中心董事）：1) 右派是光荣的，2) 保存史料非常重要！

余英时教授特地写了“读‘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祭’感赋四绝句”，诗以寄怀，表达了他对反右运动的基本看法：

右袒香肩梦未成，负心此夕泪纵横。  
世间多少痴儿女，枉托深情误一生。

未名湖水泛轻沤，池浅龟多一网收。  
独坐钓台君不见，休将劫数怨阳谋。

横扫斯文百万家，更无私议起喧哗。  
九儒十丐成新识，何处青门许种瓜。

辱没冤沉五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人亡家破无穷恨，莫叩重阍更乞怜。

林希翎（原右派）：我右派帽子反革命帽子还在，他们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平反！谁给谁平反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特别是现在……没改变人权，开奥运会有什么意义！

黄泽荣（原右派）：来日不多，去日已近，我们要留下声音。我剩下的生命就是揭露毛泽东，把天安门前他的画像撕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拖走。就像现在仍受迫害的李昌玉说的，我们即使是猪，在被杀之前也要叫几声。

张轶东（原留苏学者）：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他也会利用知识分子，包括傻乎乎的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原来说他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转变成比斯大林还斯大林……

张先痴（原右派）：我是县里一个非常小的科员，他们打我为右派，我根本不够资格，一点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八零年突然说我不是右派，我感到我已经被生活教育成了真的右派。打我右派和平反我右派，都是极其错误的。

任众（原右派）：画黑容易，画红难；枪毙容易，活着难……孙成，在公安局户籍处工作，为一首诗，成了右派。他被赶去了农村，干活像牛一样。农村搞运动找“名牌”，北京右派正好，杀了。平反时，他们轻松地说，你们来晚了，他给杀了。

姚仁杰（原右派）：我以右派为荣，不以为耻。人们说右派是好人，右派讲真话……我知道来此很危险，我很欣喜自己来了，回去如何，我不在乎。

姚监复（评论人）：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又说要“一边倒”，一边倒怎么站得起来……毛泽东这个叶公不好龙，他屠龙！他把共产党变成青红帮农民造反派，三十年代肃反，杀了几十万，小学毕业、戴眼镜的人就是危险的，都杀……右派是一种光荣，不需要平反。赫鲁晓夫说，现在我们承认错误是请求人民宽恕，如果被人民控告，那就是罪人。请中共及早提出“罪己诏”。

邢小群（评论人）：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钓大鱼”，朱德早就说过“打败蒋介石了，我们就要收拾民主党派。”右派当事人，个案非常重要，每个人构成活生生的历史。

俞梅荪（评论人）：我父亲是五七年打成右派自杀的，家里从来不提反右运动。大右派做不成的事，没名气的右派操办成了——四月六日，七八个右派在困难的情况下任众家会面，严厉谴责当时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我跟铁流、任众做的事非常有意义。

章立凡教授：反右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和毛泽东。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纲领上没写中共领导，是五四年宪法上写的……从联合政府变为一党专政，排斥同盟者是毛的长期目标。

张鹤慈（澳大利亚中国学者）：都熟悉皇帝的新衣的故事，现在我换一下结尾：当一个小孩子大声叫到：“皇帝什么也没有穿！”侍卫一刀就劈了这个孩子。赞美皇帝新衣的声音，从已经是铺天盖地，变成了震耳欲聋，其中又多夹杂了清楚和愤怒的，如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对这个已经被劈死的孩子的谴责。侍卫的一刀，就是反右。被杀的孩子，就是右派。……反右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逆向淘汰，弃金留沙。反右后的神州大地，人们已经不只是不敢说真话了，人们已经是不敢不说假话了。

陆清福（原右派）：……苏联解体了，俄罗斯没有了“党领导”。没了“党领导”的世界，不是比有“党领导”的世界可爱得多吗？前些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在北大演讲，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哲理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

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五十年前，一百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其实他们只做错了一件事：“向党交心，听毛主席的话”……我虔诚地感谢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美国……我相信，自由民主不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关统治者的笼子必将在中国的大地建成，人们将把手中的选票变成驯服统治者的鞭子，变成能关住他们的笼子。右派应该为此而添砖加瓦！

邵江：《广场》是五四遗产。首先从 5 月 19 运动的命名看，《广场》和它的支持者称他们独立地张贴大字报，组织辩论和社团，创办《广场》的事件为北大民主运动或 519 民主运动，取代官方定义的整风鸣放运动。许多《广场》和它的大字报同道，开始并没想帮助党的整风，只觉目前压制得厉害，要民主、自由这是正义的。《广场》定位自己作为独立的民间社会力量，而不是统治者操控和动员服务于统治者的群众团体……

党治国（原右派，作家。未能成行，讲稿由黄万里之子黄观鸿教授代读）：任何“好东西”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而一个活着的人，却不能说：“心脏是个好东西”。心脏无论好坏，都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人就会死亡。对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来说，民主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不管你认为它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都是非实行不可的制度，没有选择和商量的余地。

唐彼德（评论人）：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变成一党专政，很快变成一人专政。

方能御（原右派）：《广场》杂志放在那里卖的时候，已经在反右了，人们开始害怕了，买的人很少。主要负责人是与林希翎齐名的谭天荣。在某个方面谭比林更重要。《广场》杂志并非与社团杂志《红楼》等对抗。我们要重建确实无误的基础历史。

吴弘达补充：谭天荣在劳改时与我同队九年，外号叫老妖怪，是恩格斯主义者。

黄肖路（黄炎培儿子黄万里的女儿）：毛泽东说反右不是姑嫂之争，是敌我。父亲黄万里的小说《花丛小语》当天就被蒋南翔送到毛手里，毛说：“这是什么话！”“什么话”成为批右派的题头语。父亲被打成右派，祖父有七个成年子女，五个人被打成右派…加上众所周知的中共的阻扰…毛说彭德怀：“你就像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遇罗文（一家三个右派，两个反革命，一个被枪毙）：我最想说的是：右派是最可爱的人！他们当之无愧。我父母最大的了不起就是培养出了遇罗克……我们要记住那些舍己救人者。我有个朋友叫勉昭桢（音），他父亲公然说我这里没有一个右派（要求有 26 个），他被打成右派，劳改一年死了。他是英雄。我哥哥的难友也是英雄，当时他是北大教授，为了两个学生不被打成右派，自己成了右派。他就是程庆民（程庆民站起来，大家鼓掌。）。在人吃人的社会里，不吃人是非常难的。毛泽东成全了你们（右派英雄）享受这个荣誉……毛泽东要人人参与作恶，要你以后没有讨公道的权利！

金钟评论：一，反右以后其它的运动内容逊色了；二，很多知识分子是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右派受了五六年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影响；三，反右运动暴露邓小平的专制个性，他是毛反右运动的第一打手帮凶……从抗美援朝起，邓小平都最积极主动帮忙毛搞运动，直到毛死，邓有更大的发挥——六四屠杀。农民说，革命革了几十年，一觉睡醒回到解放前……毛已经死了，批毛应当没障碍了。

胡平评论：从 57 年到 66 年的九年里，右派们备尝艰辛，66 年后日子就更加难过。反右运动对年轻右派的扼杀，他们损失的生命价值的可能性无法估计；有人说 better than the worst（还不算最差），一点点改进就可以了，变得更容易满足，这种苟且心理很成问题。为什么不要求结束这种罪恶的制度，使我们后代不再受罪受苦。在历次运动中，共产党内整死的人比国民党整死的人还多，找不到共产党的真正受益人，没有真正的既得利益者。黄万里对自己的科学论断很坚持，但在政治上反右后，拒绝承认的人很少。政

治问题不能像科学问题那样认得清，政治上，当周围的人都与你不同时，你就会不踏实，就动摇了，不敢坚持自己是正确了。毛泽东共产党用人民来压你，他们制造舆论的高度一致，使你自认为错了，很多人直到后来还认为自己错了。

郭东海（原右派）：中国的劳改营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最无人道的集中营。他们“对右派要脱胎换骨改造”，我脱了胎，但未换骨。

程庆民（原右派，当年北大讲师）：五七年我在教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数学系的学生天真可爱，才华横溢，不太懂事，包括张进中、杨路。我去对胡启立说，这样的学生不能划右派。我流泪了。当了右派，我还说不太清楚为什么。我是在中国人民的血泪中受到教育，我才成为自觉的民主斗士，对毛泽东这个人渣不共戴天。我后来才不再稀里糊涂，学生老师在北大斗我时，我坚决不认错不低头，发疯似的喊口号打倒法西斯专政，打倒整人集团！都打人，他们打教授，我打他们，他们打我，我也打回去。他们用包着丁子的木棒打瞎我左眼，我马上打回去，把他左眼也打瞎；同学踢我一脚，我踢回两脚。公安局把我放了，叫我以后别再这样，比后来的红卫兵好。他们说我是个疯狂的反革命，只要他们打，我一定还手。我觉得你不怕他，他就不敢欺侮你……我被判了死刑，同遇罗克关在一起。大家都不认为自己犯了死罪，可人一个一个少了，就是枪毙了，遇害了。就该轮到我了，林彪出事了，杀人停了，我又活了……毛泽东说爱因斯坦是骗子，相对论是伪科学，我就改行研究相对论，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研究有了成果，这次要在美国讲学三场。

姚监复（原右派，学者）：坚持真理，讲真话；主持真理，讲真话；维护真理，讲真话。我说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不准确”，“江青不好，建议毛泽东与她离婚”，成为漏网右派反革命。我现在讲话的目的不是复述苦难，而是不让苦难再发生……文革时，呼毛泽东“万寿无疆”，呼林彪“永远健康”，我们河南的省委书记只能呼“比较健康”，县委书记只能呼“勉强健康”。我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

魏紫丹（原右派）：农民称我右派是朋友，右派就是友派，就是朋友的意思。文革并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大跃进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甚至反右倾也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大跃进的失败才是反右倾的直接原因。

何清涟（评论人）：我认为反右不是一次民主运动，没有民主怎称民主运动？只是搭上了共产党阴谋的便车。现在只有一万另三百个右派尚存，大家应当分担责任把他们的历史经历记录下来。中共正在设法销毁历史，销毁历史档案，许多地方正在进行。抢救历史极其重要……谭天荣曾经寄来一篇文章给我们杂志发表，很出乎我的意料，他的文章超越个人经历写出的理论思考，令人深思，难能可贵。

听众讲话：被枪毙的顾文选，我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在《广场》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的遭遇”。我鼓起勇气买了两本广场，许多人不敢买。顾文选性格内向，有抑郁症，不爱讲话。可大家鼓励他讲话，帮助党整风，他开始到处去讲。他在一次拉着横幅“XXX控诉会”上发言，最后一句是“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北大英语专业是右派最多的班，28人中有八到十几个右派。

吴弘达：1955年肃反就抓了许多人，57年兴起劳教……邓小平一上台，马上恢复劳教。中共把劳改支队改为监狱，但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内容和做法不变，他们太晚了，“劳改”这个词已经上了英国牛津字典。现在枪毙人不兴游街示众，但六四后又开始大规模杀人，枪毙人都是用开花弹，被杀者头给炸掉一半。不少死刑车里有手术台，华西医学院的车子跟着囚车走，摘取死囚器官。明年开奥运会，使人想起中国大部分体育场都杀过人。

余杰：纳粹集中营是种族灭绝的工具，没有思想控制，时间短（十年）；苏联的古拉格，它不理睬囚犯的心灵和个人的思想，不强迫参加会议……中国领导人多数未受良好教育，有反对资产阶级的传统，它的劳改制度则是思想改造和洗脑。与希特勒相比，毛泽东有更大的野心，更着迷个人的权力，既当皇帝还要当国师。法西斯把人定为“废物”，用毒气毒死，焚尸炉烧毁，消灭“多余的人”；中共把残害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恶作剧，用最高尚的教条，以

最下流的行为灌输，把人的尊严踩扁……直到今日，这种恶行还在继续。

林希翎：反右时，我正准备毕业考试，很犹豫不想发言。但他们不经我同意，宣布我发言。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推上讲台，五十年了还在讲……我从来没想过当英雄，也没想过当烈士，只感到悲哀。我至今意识形态还是个左派，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西方社会我都同意左派，我和法国的左派关系都很好。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是左派！共产党是左派，他们不给我平右派的反，他们有什么资格给我平反……我们在天堂再见！

章立凡（评论人）：今天是一个还原历史的过程，也是个审判的过程。审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集团的犯罪。共产党认为天下是打下来的，是战利品，不容他人染指。我们应当摆脱以往，要以公民的身份，反思反省五十多年共和国的历史，从个人的认识提升到对民族问题的思考，我们才有希望。

陈奎德（会议筹划者，评论人）：反右与制度的关系，应当从中共制度形成的历史渊源去认识。中共制度是在运动中逐步发展完成的。开始有部分是照搬苏联，但后来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部分则是通过历次运动累积起来的，是在动态的运动中产生完成，不是静态的预先设计好的。譬如，劳改、劳教制度的确立与肃反、反右的因果关系等。有的则由临时性措施发展为固定的制度形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才凝固成中共的制度。很多制度其残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例如统购统销制度（与大饥荒的关系）、户口制度（与严酷的身份歧视的关系）。解构的方法要从产生的原因中去寻找，摧毁它需要追本溯源，需要政治过程。

章立凡（评论人）：右派究竟是右派，还是左派？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更重要的是本单元的演讲提出了体制上的问题，体制问题的后果还没有清算。思想屠杀有没有效果呢？肉体被消灭，但思想还是留下来了。我父亲认为劳教是没有效果的，我看最终是没有效果的。我个人非常敬佩这次会议的主办，有什么问题，希望谅解。

齐家贞：反右时我十六岁，不够资格当右派。四年后，我当了

反革命，有幸与右派为伍，也开始了一段艰难的人生。和许多右派一样，我们曾经是共产党最驯服的工具，却变成他们最驯服的敌人。从驯服的工具到驯服的敌人，其中冤深似海，可我们不敢喊叫“还我自由”！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宣讲的话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在 1957 年前后”……我们之所以作上述那些分析比较和结论，完全是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极权统治。试想一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如果有 10 个焦国标，100 个蒋彦永，1000 个李大同，10000 个章诒和，中国会怎么样？有一句丹麦谚语，“你或许可以强迫一个人闭上他的眼睛，但是，你永远不能强迫他入睡”，今天在座的每个人就是这句话的明证！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前有一句话，“*Lest We Forget*（谨防我们遗忘）”，就是本会议召开的意议。

邢小群：我不是右派当事人，也不是研究右派的专家。只是因为十多年前开始参与中国知识分子口述历史的研究，接触了相当多的右派……每一次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撞击。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的命运有着超乎一般人的关切，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保持着高于常人的热望……从总体上看，1957 年挨整的右派，活到改革开放以后，是一个政治情结十分强烈的群体……右派改正以后，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的右派重新回到体制，成为高官，成为主流政治的维护者和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的右派甚至成为左派，站在比主流更僵化、更专制的立场上，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力图把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拉向斯大林体制。今年是中国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部分当年的右派及右派家属先后公布了几封签名公开信，要求中共开放言禁，反思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郑重宣布反右运动是违宪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对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给以经济赔偿。我深知，当局不可能接受这些意见。但我认为，右派们的公开表达不是没有现实意义，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同时是明辩历史是非的进程……这些右派的公开信，写文章，在事实和道义上已经占了上风。这已经是为明辩历史是非推进了一步。

吴弘达先生朗读章诒和女士给大会的来稿（略）

姚仁杰（原右派）：这二十一年的苦难，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占齐了。二十一年后回到北大，北大不是好呆的，我必须苦干赶上，每天从未在十二点前睡觉。接着做二十一年前的助教、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到顶了。浪费了我二十一年，不让我晚退休二十一年，想当牛都不行，还是要退下来让给新人。大多数右派是林冲带刀误入白虎堂。反右、文革都是想用毛泽东思想统治全世界。谈这些历史，我们是要一个社会公正，要一个说法，要揭露毛泽东红色暴政的罪恶。我们应以历史为鉴，不要让毛泽东和类似毛泽东的人再主宰中国。毛泽东损人开始，害己告终。我要活到毛泽东年龄83岁再加21年，活104岁，收集各种资料来清算毛泽东。活着的右派不多了，希望基金会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抢救历史，记录下历史。

胡平：如果我早出生十年，我肯定是右派，我不用动员就要讲话提意见。就算我不说话，出生不好，学习成绩好遭嫉妒，也会当右派。反右时期的思想比文革时期纯正丰厚得多，反右是空前规模的文字狱。不能指望权力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做好事，这不是单方面的承诺，而是双方的契约。不需过问当权者有无诚意，而是要假如它没有诚意，那将会怎样？屋子漏雨怪老天爷，而不是怪屋顶没修好。老天一定要下雨，大权在手是一定会滥用的。要建立一个可靠的空间，创造条件，约束权力，向人民阐述言论自由的原则……文革四人帮刚倒台，出现言论自由的松动，可是我们失去了历史上这个千载难逢之机，大家觉得给了一点点自由就谢天谢地了。如果我们大讲特讲言论自由，共产党要镇压也不容易……六四以后，整个社会的心态发生变化，不同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随便说什么，都无动于衷了……前途是光明的，所有的专制国家倒下去，没有一个爬起来的，它一定要倒！

黄泽荣：我只想活九十二岁，23年成长，23年坐牢，23年搏击商海成为中产阶级，第四个23年我从回书斋，学习王友琴，把我了解的事一件一件记录下来。我们右派要留下一个痕迹，这次会议肯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声音……人格要独立，首先经济要独立，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不一定要成为家财万贯的富翁，至少成为不愁吃

穿的中产阶级。

章立凡（评论人）：这次会议有两类人讲话，一，当事人的控诉；二，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作理性的分析。两者都对，都有理，具有互补性。我的父亲是右派，我也坐过十年牢，我介于两者之间。作为研究者，我要对事件保持距离……北京师范大学六麻袋右派档案要处理，一位姓许的人花二万元买下交给党支部，党支部说应当销毁。我家搜走的东西，许多还了，右派部分未还，我坚持私人的东西不还也得保存好。许多人正在消失，许多原始材料正在被销毁，我们应该注意这种趋势。我们不能用党文化的方式来批判党文化，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债务。它在历史上有了权力，就承担债务，债务还的时间越晚，利息越高。

数个月来，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吴弘达先生以及全体工作人员，为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浩大的组织工作，以及头绪繁杂的具体事务，加上众所周知的中共阻扰所增加的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对所有参与这次会议的人员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意。两天会议胜利结束，是给他们最大的回报。

# 廉颇虽老矣，努力加餐饭！

——写于反右五十周年

严家伟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刚刚结束的，关于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吴弘达先生致闭幕词时，不无伤感地说“今后这样的会不会再有了，我们都将告别人世，历史将留下四个字 1957”。作为当年中国百万右派中小小的一员，闻此言亦不胜唏嘘。但窃以为吴先生恐怕是说在“反右”六十周年到来时，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已告别了这个世界。这当然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能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走在征途上，实际工作中的人们来讲，它又是一段宝贵而漫长的时日。十年往事知多少，十年兴败多少人。特别对于正处在民主与专制十字路口的中国来说，未来的十年必然会成为关键的历史时期。任何关心中国未来命运，期望中国能走向自由，民主，均富，康乐的人来说，都不应让这十年“春花秋月等闲度”！

从毛泽东死去到现在也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当 1987 年刘宾雁先生提起要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时，几乎无人敢响应，回应刘先生的只有一份出卖人格的小报告恭达“天听”而已。当 1997 年“反右”四十周年时，世界上已有了不太为人注意的小规模的纪念活动。而今年“反右”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成了一条重要的时政新闻而吸引了世界许多主流媒体的关注。这就说明“时间”，这个东西，并不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可以冲毁记忆的长堤。相反，它会让历史的古树发出嫩绿的新枝。历史，也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百依百顺可以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在驱散人造的迷雾和拂去岁月的风尘以后，她终

会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遥想五十年前，“右派”二字在一般人眼里，几乎就是“罪恶”，“耻辱”的代名词，自己或家中有个亲人是“右派”，也像做了贼，偷了东西一样，生怕别人知道。二十年前，即使是已获得“改正”的右派，也会将此事作为一种“隐私”，不会轻易向别人道出。然而正如民谣所云“风水轮流转，河东转河西”，现在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右派”已成了有文化，有思想，有胆识的同义语。金钟先生说“右派是中国的民主先锋”，也决非溢美之词。去年春天在一次朋友的生日宴会上，席间互赠名片时，只见一张张名片上，赫然印着：“五七年右派某某”，“诗人，军人，右派某某”，“医师，右派某某”，而鄙人更是当仁不让，名片背面是“心似夏莲尘不染，节如秋菊老何伤”，正面则是“1957年荣膺右派称号者——严家伟”。也就是说我们不但不会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而是要理直气壮，充满自信自豪地告诉别人，我在历史上的1957年是光荣的“右派”。这就是人世的回归正途，人心的正道沧桑！同样令我感到欣慰和振奋的是，当年许多“右派”的子女和后代，不但不会感到为父（祖）辈背“黑锅”的压力，不但敢于大胆面对和正视，而且许多人更把这视为继承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章立凡先生，章诒和女士，黄肖路女士，这些仅是当年名闻全球的“大右派”的后代。而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右派”的子女也同样抬起了高贵的头颅。一位读了李才义先生《天府悲歌》一书的右派后代，写信给李先生说，“以前我最害怕人家知道我父亲是右派，读了您的书我才知道，右派原来是好人，现在我敢主动地告诉人家我父亲的情况了”。原《成都晚报》记者黄泽荣（晓枫）先生，57年是四川文艺界“大右派”，今年他回到成都去晚报遇见一些“小字辈”，当他们知道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就是晓枫时，一个个都向他竖起大拇指。正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无可讳言，当年的这些“右派”一个个都已到了暮年。不过暮年并不等于就是“等死队员”。想当年我们那位廉老先生虽到暮年，据太史公《史记》称，尚可

“一饭斗米，肉十斤。被（披）甲上马”以致诸侯不敢侵赵界。我想这样精神是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我们不但应努力加餐，善自珍摄，保重身体，还更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观念，永远为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为完善中国的人权而大声呐喊，而努力奋斗！

# 悲愴的历程

——普林斯顿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散记

金 钟



图左起：姚监复、金钟、余英时。（《开放》杂志图片）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六月六日至七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行。海外和中国大陆约六十名反右受害者与研究者出席。

六月，是五十年前中共发动反右运动的高潮。今年的纪念活动集中在美国，上旬和月底分别有两个大型研讨会在东岸与西岸举行。我出席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研讨会，由中国信息中心、劳改基金会主办。主持人吴弘达，是海外“右派分子”健在者中，最具活动实力与影响力的一位。我认识他已有十多年，1993年《开放》杂志创刊六周年酒会，曾请他和张戎蒞临演讲（但吴已于2002年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他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劳改制度，使“劳改”Laogai一词如“古拉格”一样，收入大英百科全书。他关于大陆奴工产品、器官买卖的揭露，更令中共恨之入骨，九五年

他潜入大陆被捕释放后，成为华府政界的上宾。

## 吴弘达主持 林希翎自称左派

吴弘达对五七年反右的批判是严厉的。他对我说，反右的问题，根本不是平反、赔偿问题，而是中共要接受人民的审判！但他在研讨会的开幕词却比较务实，说大多数右派当年不知东南西北，就成了阶级敌人，百万右派中有几个人反对共产党？有几个林昭？

我赶到会场时，正听到他讲话的尾声。他说“我们将会死去，但历史将永远留下 1957 年。”弘达今年七十岁，有记者形容他已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他对反右的概括深沉有力：“一个人的死亡，可以写一本书；一百万人的死亡，就成为历史的一部份。”

我上期曾报导，官方称右派五十五万人，今天存活者只剩一万人。出席这个研讨会的右派约二十名，包括来自大陆的应邀者约十人，大约都在七十多岁这个年龄层，他们的发言语调都很平和，讲述自己的反右经历。气氛颇感悲愴。就连时作激烈语的林希翎，也坦承“我是一个垂死的人”。她感到绝望。只盼给未来考古，留下一点文物。她说，她上飞机要坐轮椅、带氧气，不是一位胡小姐相陪，她来不了美国。走路要人搀扶。

遥想 1983 年林希翎初到香港，我曾负责报导她的专案，记得见她前的一夜都没睡好觉。今天这个会议上，人们对她仍然充满敬意，因为她是那场灾难中的标竿性人物，后又被邓小平定为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之一。她在会上作了几次发言。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当余杰讲完他对纳粹集中营与苏联中国的劳改营的对比之后，林希翎以一声“亲爱的同学们！”开始，谈到她对左右派的看法。她说她曾在山东和谭天荣（北大学生著名右派）相处三个月，她和谭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她在法国担任托派政治顾问十年。她宣称，她是左派，地地道道的左派，邓小平是最大的走资派。共产党有什么资格讲我是右派，给我平反？最后，她和与会者相约在天堂见面。

大陆来的张先痴也谈到划他反党右派的冤情。但他说，当了右派后，他却成了真正的右派。他遭遇到毒打、逃跑，定为投敌集

团，真假枪毙……他说，因此，划他右派是错误的，给他改正也是错误的！赢得满场掌声。余英时、林培瑞教授出席致词。

普大荣休教授余英时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这位长期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著名学者指出，中共一直把知识人当作潜在敌人，绝对不予信任，你投降，他也不信，认为你口是心非，没有交心，所以一再要挖心，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反右就是第一次大规模整知识分子运动。现在的共产党则是另一种办法，腐化你，只要你不推翻政权，做什么都可以。整个社会腐败，就没有精神力量了。他赞扬右派的牺牲是光荣的，应该将反右资料保存下来。他有绝句寄赠会议：辱没沉冤五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人亡家破无穷恨，莫叩重闔更乞怜。

会后，和余教授简短交谈，他关切询问我们出版的张戎毛传与赵紫阳谈话录的销售情况。奉告之后，他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好，资讯传播很重要。

普大教授，名汉学家林培瑞也致词，并全程出席会议，非常认真地听取每人的发言，会下以一流的汉语和与会者聊天。

几位来自大陆的右派黄泽荣（铁流、晓枫）、陆清福、任众、姚仁杰等发言都很精彩，反映了右派几十年的悲苦和当前的处境。他们说，右派在社会上虽受歧视，但民间都知道右派是好人，说真话，又有学问。张轶东是因反右而受迫害的学者，著有自传《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劳改基金会出版），描述一名留苏高材生在中苏分歧背景下的传奇命运。他曾和一位俄国姑娘结婚，又被迫离婚，两地相思，劳改入狱……直到 1976 年毛死，“一个历史时代瞬间结束了”后，获得自由，但 1989 年，才打听到前妻的消息，但她已去世三年……在研讨会上，我看到这位懂几国外语的历史学者，就像我过去在大陆同事的那些前辈专家一样安详和友善。午休时，他和两位普大少女用俄语亲切交谈——他还在寻梦吗？

### 章立凡谈毛发动反右的动机

铁流曾在《开放》以晓枫之名发表过数篇回忆四川反右中的故

事。我们初识，文如其人。他的文章直抒胸臆，敢骂敢说，畅快淋漓，没有一丝书卷气。人亦豪爽，带著几分草莽味道。他在右派圈中与众不同的是，平反后经商有成，变为大款，有房有车，不靠儿女，去年回归书斋。因此，他的主讲题目是“人格要独立，经济先要独立”。他声言，剩余的生命以揭毛泽东罪恶为使命，一定要把毛像从天安门摘下来，把毛的腐尸从纪念堂扔出来。

与会的，还有一批右派、反革命的子女，包括章乃器之子章立凡、黄万里之女黄肖路、俞梅蓀、齐家贞、遇罗文等。他们都谈到受反右株连，家庭付出惨痛代价的往事。章立凡是大陆知名的学者，他父亲章乃器是民主党派中的三大右派之一，因此，和章伯钧的女儿章詒和一样引人注目。他这次以反右研究者的身份出席会议，他的讲题是“毛泽东反右动机”。他认为，毛发动整风时，未必为了引蛇出洞，而是为了在党内分歧下重振个人权威。但鸣放一起，水淹龙王庙，毛乃因势利导，急转反右，一举实现了将民主党派打成改造对象和清算反冒进的党内务实派两个目标，提升了个人权威，为走向大跃进与文革扫清道路。

章立凡送我一本新出的文集《君子之交如水》，拜读印象，和章詒和的文采飞扬迥然有别，是一种锋芒内敛的风格，这大概和他学历史，“小愚姐”搞戏剧不无关系。会上会下的谈吐，也相当低调，斯文得出乎我的意料（似乎与乃父的作风大异其趣）。他偕妻而行，个子很高，不像五十七岁的人。

### 齐家贞真诚忏悔感动众人

来自澳洲独立中文笔会的齐家贞女士，在《开放》发表过不少非常可读的文章，她的发言和她的文章一样真诚感人。她说，反右时，她 16 岁，不够当右派，但四年后做了反革命，在狱中，她驯服接受改造，深挖阶级根源，换来提前释放。出狱那天，正遇喊“打倒毛主席”的同监犯被枪决。这件事让她羞愧不已，决心拿起笔，以说明中共统治真相为己任，不忘西谚“射死雁的箭是自己的羽毛做的”，她要一生为此忏悔。——在座一位听众竖起大姆指对

我说，齐家贞的发言是所有发言中最好的一个。

会上还有多位具份量的发言，包括王友琴、何清璉、余杰、邢小群、张鹤慈、任众等等。姚监复先生是来自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他与众不同的是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具有体制内的丰富体验，我们在《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也读到过他对赵的访问。他的发言不像许多大陆学者那样拘谨，论述中常带诙谐，会场效果极好。

## 我对反右运动的几点看法

我在会议第四节评论中，也简要地谈了几点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兹列如下：

一、反右中的大鸣大放是一种民主运动。不仅北大青年右派们要求定五一九为爱国民主运动，而且，整个社会也一样。虽然，那次鸣放是在阴谋的圈套下展开的，但是，从中共批判、反击的广度与力度来看，大部分意见已触及了专制体制。丁抒的《阴谋》不避讳收集了大量材料，证明许多右派言论在挑战一党专政和中共的暴政，其深度与鲜明性大大超过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和八十年代学潮的诉求。至少是明白地不满现实，要求民主自由，保障人权。当然，很多基层的右派诉求，层次较低。

二、右派言论的思想资源来自两方面。一是像民主党派、高教界、文艺界比较成熟的人们之中，不少人受过国民党时代甚至留学西方的教育，基本的价值观是美式的民主自由观，他们当然看不惯共产党的那一套。二是大学生、共产党内部对苏共二十大自由化思潮的共鸣。这些人与西方理性资源比较疏远，二十大思潮便极具震撼力，从刘宾雁、戴煌到林希翎、谭天荣，很多人证实了这一点。

三、反右是邓小平专制性格的大暴露。邓小平 89 年六四镇压学生并非偶然。他在中共暴政五十年中有四次恶劣记录：一是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反。邓主持西南局配合抗美援朝，两次报告中央，要求从严处理四类反革命，为毛欣赏，转发全国，扩大杀戮，不计其数。二是 57 年反右。邓是前台总指挥，纵横肆虐，到死不认错。

三是反修。主持中苏论战，组织“九评”，诬蔑苏共改革，为文革作舆论准备，事后也没有丝毫反省。以上三点，邓助毛为虐的责任远大于刘少奇、周恩来，故为毛重用。文革受排挤，复出后大力保毛，镇压八十年代自由潮，直至六四写下第四次记录。

四、反右开始，显示中国政治的进步必须批毛。第一，毛罪大恶极，不批不足以平民愤。毛独裁期间令七千万人无辜丧生。根据张戎毛传的统计，土改与镇反三百万、大跃进饥饿三千八百万、文革三百万，劳改营死亡二千七百万，共计七千一百万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毛是主要的元凶。第二，批毛有足够的证据。凭官方出版物已足够；第三，批毛没有心理障碍。毛得罪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家庭不受其害，工人农民也没有从他的统治下得到一点实际好处。农民说“革命革了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实际上，毛的革命已被完全否定。这是批毛最有利的条件。

会议开了两天，曲终人散。大家都有一种诀别的滋味在心头。对于幸存者而言，反右的恶梦恍如昨日，但岁月无情，半个世纪已付东流。正如吴弘达闭幕所说，这样的会今后不会再有，我们都将告别人间，让历史留下四个字：一九五七。

#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自由亚洲电台 紫荆

## (一)

会议第一天讨论了反右运动的背景和发展阶段、右派的典型案例和心路历程。著名右派林希翎说，对反右运动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在当代恢复真相，因为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林希翎：“反右运动以后，接下来的，大字报运动，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八九民运’，一直接下去的，镇压法轮功啊，当前对国内维权律师和人士的镇压，都是一脉相承。”

林希翎说共产党别的能耐没有，却会创造新名词，什么“改正”，“摘帽子”，“平反”，等级不同。她曾被关押 15 年坚持不认罪、因而拒绝“摘帽。”

林希翎：“李锐跟我讲，哎呀，林希翎，你要它平反干什么！不要它平反更好。我就觉得现在确实是，谁给谁平反哪？啊？它们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平反？”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姚监复说：赫鲁晓夫要在 20 大揭露斯大林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说了一段精彩的话：“现在我们承认错误，是请求人民宽恕。如果到 21 大就晚了。如果人民提出来控诉，我们是接受审判。”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邢小群说，反右运动的特点是，中央极权意见是高度一致的。有关方面的人看到档案资料，中共高层最高领导人决定搞这场运动时，在统一思想的讨论会中，有人说，我们就是要钓大鱼，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中共建政初期朱德就说过，打败了蒋介石，下一步我们就收拾民主党派。

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张鹤慈说，反右是有效率的逆向淘汰，弃金留沙。改写了皇帝新装的结尾，不仅把说真话的孩子批斗死，而

且让群众对他义愤填膺。

文革期间，张鹤慈的祖父和父亲都被关在秦城监狱，祖父就死在那里，父亲被逼疯，两个叔叔和一个婶婶自杀。他自己在劳改农场待了 16 年，他的堂兄弟被关了 10 年。

这次参加会议的还有“右派”的后代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黄炎培的孙女、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黄炎培曾是中共大力统战对象，利用他赢得知识分子的信赖。但是他 7 位子女中有 5 位被打成右派，其中两位被逼自杀。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独立中文笔会作家齐家贞说，1949 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是中国人民一起跪下来了。

与会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余英时教授，他说中共第一次正式整知识人，是反右。

余英时：“1949 年（中共）一进了城，看你知识人就是次等人，或者是潜在的敌人。所以它绝对不会相信的，你怎么投降也没有用。它认为你口是心非，它认为你心没有交出来。所以后来一再要挖心，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他提到共产党现在对付知识人的另一个办法是腐化你。只要不谈政治，不推翻我政权，做什么都可以。

余英时：“现在稍微有点头面的、有点信用的知识分子，它就用钱来收买你。”

他说中国的前途要每个人担负起来才行，不能眼睛看着共产党改革，那是幻想。

参加会议的还有从中国大陆赶来的“右派”张先痴、任众、陆清福、程庆名、郭东海、张铁东、铁流等。

## (二)

王友琴在书中她收集了 689 位受难者名字和他们的案例。当年清华大学有 571 名右派，其中 58 人被迫害致死；北京农业大学 143 名，30 人死亡。北京大学 716 人，63 人死亡，每 200 人中就有一

人被整死。一些右派是在文革中被再次揪出批斗，不堪屈辱而自杀。

但是领导过反右的人也遭受了同样命运。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在报纸上撰文积极攻击右派。

王友琴：“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在中央的高级会议上多次点名翦伯赞的‘罪行’。这样他就遭到了非常残酷的斗争。一天遭到六场斗争会。在 1968 年的 12 月 18 号，翦伯赞和他的妻子戴淑宛在他们的住处自杀了。他没有留下任何别的话，他写一个简单的遗书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978 年，随着中共开始给这些人平反，同时制造了一种理论，说是冤假错案。王友琴说不是冤假错案，是大规模的罪恶，却被中共轻描淡写说成是错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罪行，已经被定为种族屠杀。

学者何清涟在会上提出，中共当政以来使用的是体制化暴力，反右是政府有预谋的屠杀迫害知识分子。

何清涟：“其实在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中间，只有共产主义理论有一种类宗教功能，它排斥任何宗教，也排斥任何神，但是它把自己变成一种宗教，也把自己的领袖变成神。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必须要坚持自己永远正确，从来不认错。”

她说，抢救历史的记忆这个任务迫在眉睫。据她所知，中国大陆各省已经接到命令，在陆续销毁反右和文革中的档案。

会议组织者之一陈奎德透露，目前右派还活著的有 9800 人，希望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告诉这些人，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

唐彼得从法轮功不断揭露那些迫害的案例和酷刑责任人当中受到启发，希望右派能够回忆自己的经历，揭露当年整人的人。几十年前的德国法西斯凶手即使超过法律年限，依然遭到逮捕审判，目的是警告世人。

很多右派当年就是因为一两句话被身边的人举报而改变了一生。沙宣和当年就是用刚学来的物理知识说，党员只有一个自由度，团员有两个自由度，而我们没有入团入党的有三个自由度，因为这句话他被打成右派。他对与会的右派们说：“神的原意是保留你

们，为人类做贡献。怎么做呢？就是站稳是非的立场；划清善恶的界限。”

参加会议的有人希望不要开成控诉会，但是，万里迢迢从中国大陆赶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右派们”，也许是第一次将多年来积压的心里话在公开的场合倾吐，依然嫌发言时间不够。很多人经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劳动改造，九死一生。命运的捉弄刻骨铭心，他们唯有希望年轻人能够记住这一段历史。

### (附录)

#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程 (普林斯顿)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普林斯顿大学“反右运动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程”

Sponsored by:

The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CIC) and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LRF)  
主办：中国信息中心劳改基金会

June 6 (Wednesday)  
Morning Sessions  
六月六日(星期三)上午

Location: McCormick 101 (i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地点：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内 McCormick 101)

8:30-9:00a.m.: Yu Ying-Shih, Professor emeritus at  
Breakfast outside McCormick 101 Princeton University:  
早餐, McCormick 101 会场之外 Welcoming Speech  
余英时教授致欢迎词

9: 00a.m-9: 30a.m;

##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

Chair: Dr. Chen Kuide

主持：陈奎德

## Mr Harry Wu (former rightist, Head of the CIC & the LRS): Opening Remarks

吴弘达先生致开幕词：一九五七

Silent tribute to the victim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of the 1957 Anti-Rightist Campaign  
向 1957 年以来 50 年内罹难的右派分子默哀

Ms. Lin Xiling  
(former rightist): Opening Remarks  
林希翎女士（原右派）：  
会议代表致词

Mr. Huang Zerong (former rightist): Opening Remarks 黄泽荣先生（原右派）： 会议代表致词	10:30---11:00a.m.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Yao Jianfu 姚监复先生 Mrs Xing Xiaoqun 邢小群女士 Mr. Yu Meisun 俞梅荪先生
<b>9:30a.m.--11:10a.m.</b>	
<b>Panel I: 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b> <b>第一节 反右运动：背景和缘起</b>	<b>11:10---11:25a.m.</b> Coffee and tea break 休息 (咖啡与茶饮)
Chair: Prof. Perry Link, Princeton University 主持人：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教授	<b>11:25---12:45p.m.</b>
Speakers: 主讲人：	<b>Panel II:</b> <b>第二节 反右前夕的整风运动： 中国知识界状况</b>
9:30—9:50a.m.	Chair: Dr. Wang Youqin 主持人：王友琴博士
Mr. Zhang Yidong (former rightist) : Not “Open Conspiracy,” but Self-Deceiving Hypocrisy 张轶东先生： 不是阳谋，是叶公好龙	Speakers: 主讲人：
9:50—10:10a.m.	11:25---11:55a.m.
Mr. Zhang Xianchi (former rightist) :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张先生（原右派）： 反右运动的背景和导因	Prof. Zhang Lifa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On Mao Zedong’s Motivations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章立凡：毛泽东“反右”动机研究
10:10—10:30a.m.	11:55---12:25p.m.
Mr. Ren Zhong (former rightist): My Experience with Life and Thought as a Rightist 任众先生： 作为右派，我的生活与思想经历	Mr. Zhang Heci, Why Di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Happen ? 张鹤慈（澳大利亚中国学者）： 被杀的孩子——纪念反右五十周年 (为什么会有反右？)

12:25---12:45p.m.	2:20—2:40p.m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Shao Jiang : The Unofficial Magazine Square in 1957 邵江: 1957 年的非官方杂志《广场》
Prof. Yao Renjie (former rightist) 姚仁杰教授(原右派)	
Mr. Zhang Xianchi (former rightist) 张先痴(原右派)	
12:45---12:50p.m.	2:40—3:00p.m.
Closing Remarks by the Chair 主持人小结	Mr. Dang Zhiguo (former rightist, scholar, writer): Family-State, Party-State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read by Prof. Huang Guanhong 党治国 (原右派, 学者、作家) : 家天下、党天下和反右运动 (由黃觀鴻教授代为宣读)
12: 50---2:00pm Lunch Intermission (Whig H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午餐	3:00—3:30p.m.
<b>June 6 (Wednesday) Afternoon Sessions</b> 六月六日(星期三)下午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Zhang Heci 张鹤慈 Mr. Peter Tang 唐彼得 Mr. Fang Nengyu ( former rightist ) 方能御(原右派)
<b>2:00---3:20p.m.</b> <b>Panel III: Development and Stages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b> 第三节: 反右的发展阶段 Chair: Mr. Harry Wu 主持人: 吴弘达先生	3:30---3:35 p.m. Closing Remarks by the Chair 主持人小结
Speakers:主讲人:	3:35---3:40 p.m. Coffee and tea break 休息 (咖啡与茶饮)
2:00—2:20p.m Mr. Lu Qingfu (former rightist): The Observations of a Rightist on the Unfolding of the Campaign 陆清福先生 (原右派) : 一个右派对反右运动过程的观察	<b>3:40---5:00p.m.</b> <b>Panel IV: Typical Cases in the Campaign</b> 第四节: 运动中的典型案例

Chair: 主持人:	4:40---5:10 p.m.
Mr. Huang Zerong 黃泽荣先生 (记者, 原右派)	Mr. Cheng Qingmin (former rightist): My Life as a Rightist 程庆民先生: 我的右派生涯
Speakers:主讲人:	5:40---6:00 p.m
3:40---4:00 p.m. Ms. Huang Xiaolu (daughter of Rightist Huang Wanli): Mao Zedong as Viewed from the Life of Rightist Huang Wanli 黄肖路: 从右派黄万里的一生看毛 泽东	Prof. Yao Renjie: My Experience as a Rightist Since 1957 姚仁杰教授: 作为右派我自 1957 年以来的经历
4:00---4:20 p.m. Mr. Yu Luowen: My Father, My Brother, My Rightists' Family 遇罗文: 我的右派家史: 父兄与全 家际遇	Mr. Guo Donghai (former rightist) : Never Forget--A Message for the China of the Future 郭东海先生 (原右派) : 不敢遗 忘——对未来中国的一份交待
4:20—4:40p.m.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Jin Zhong 金钟先生 Mr. Hu Ping 胡平先生	6:00—6:30p.m. Discussants: 评论人: Dr. Wang Youqin ( Chigago University ) 王友琴博士 (芝加哥大学)
4:40---6:00 p.m. Panel V: Tragedies and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n Victims 第五节: 右派的悲剧及其心路历程	Mr. Shao Jiang 邵江先生
Chair: Mr. Yao Jianfu 主持人: 姚监复先生 (学者, 原中 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6:30---6:35p.m. Closing remarks by the Chair 主持人小结
Speakers:主讲人:	6:35---8:30 p.m. Dinner Party 晚宴
	<b>June 7 (Thursday)</b> <b>Morning Sessions</b> 六月七日(星期四) 上午

Location 地点:	姚监复先生(学者, 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从“反右派”到“大饥荒”的必然性——对河南“反潘杨王集团事件”的案例解析
8:30---9am Breakfast outside McCormick 101 早餐, McCormick 101 会场之外	10:00---10:30a.m. Mr. Wei Zidan (former rightist):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魏紫丹先生 (原右派) : 再论反右与文革
<b>9:00---11:00a.m.</b> <b>Panel I: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Great Famine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ical and Spiritual Links</b> 第一节: 反右与大饥荒、文革的关联: 历史的与精神的	10:30---11:00a.m.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Yu Jie 余杰先生 Ms. He Qinglian 何清涟女士
Chair: Ms. Xing Xiaoqun 主持人: 邢小群女士	11:10---11:25a.m. Coffee and tea break 休息 (咖啡与茶饮)
Speakers: 主讲人:  9:00—9:30a.m. Dr. Wang Youqin ( Chicago Universit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Victims 王友琴博士: 从受难者看反右与文革的关联	<b>11:25---1:00p.m.</b> <b>Panel II: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Modern China's Institutions</b> 第二节: 反右运动与现代中国体制 Chair: Mr. Zhang Lifan 主持人: 章立凡先生
9:30—10:00a.m. Mr. Yao Jianfu ( Chinese Scholar, Former Researcher on CCP Policies ) : The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the Great Famine	Speakers: 主讲人:  11:25---11:45a.m Mr. Harry Wu: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the Laogai System 吴弘达先生: 反右与劳改

11:45---12:05p.m.	Chair: Mr. Yu Jie 主持人: 余杰先生
Mr. Yu Jie: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the CCP's Modern Slavery Camps 余杰先生: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	Speakers: 主讲人:
12:05--12:25p.m	2:00---2:20p.m.
Ms. Lin Xiling: Reflection o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林希翎女士: 对“反右”的反思	Ms. Qi Jiazen: The Weaknesses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fore and after 1957 齐家贞: 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在 1957 年前后
12:25---12:55p.m.	2:20--2:40p.m.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Huang Zerong 黄泽荣先生 Dr. Chen Kuide 陈奎德博士	Ms. He Qinglian: A Comparison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Values of 1957 Rightists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何清涟女士: 右派与当今中国知识界生存状态与价值取向的比较
12:55---1:00p.m.	2:40—3:00p.m.
Closing Remarks by the Chair 主持人小结	Ms. Xing Xiaoqun: The Story of Rightists and Political Reform 邢小群女士: 右派的政治改革情结
1:00---2:00pm	3:00—3:30p.m.
Lunch (Whig H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午餐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Sha Xuanhe 沙宣和先生 (原右派) Mr. Peter Tang 唐彼得先生
June 7 (Thursday) Afternoon Sessions 六月七日(星期四)下午	3:30---3:35 p.m. Closing Remarks by the Chair 主持人小结
2:00---3:20p.m. <b>Panel III: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Current Intellectual Situation in China</b> 第三节： 反右运动与当前知识界情势	3:35---3:50p.m. Coffee and tea break

休息（咖啡与茶饮）

3:50---5:25p.m.

**Panel IV: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a**

**第四节：历史记忆与当代中国**

Chair: Dr. Chen Kuide

主持人：陈奎德

Speakers: 主讲人：

3:50---4:10pm

Ms. Zhang Yihe ( Read by Harry Wu) : Some Records and Memories about the Campaign

章诒和女士（由吴弘达先生代为宣读）：对反右的一些笔录和回忆

4:10---4:30p.m.

Mr. Hu Ping: Thoughts o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from a Later

Generation

胡平先生：

一个后来人对反右的思考

4:30---4:50p.m.

Mr. Huang Zerong: (former rightist):  
Economics Must Be Independent in Order for Character to Be  
黄泽荣先生（铁流，原右派）：  
人格要独立，首先经济要独立

4:50—5:20p.m.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Wu Yashan 吴亚山，  
Mr. Zhang Lifan 章立凡  
Mr. Harry Wu 吴弘达

5:20---5:25p.m.

Closing remarks by the Chair

主持人小结

End 闭幕

# 劳改基金会出版书目

## 《黑色文库》系列

《我以我血荐轩辕》	2001年	徐文立 著
《沧桑岁月》	2002年	陈文立 著
《凄风苦雨四十年》	2002年	成中和 著
《雪山下的火焰》	2003年	班丹加措著/廖天琪译
《苦难的历程》	2003年	文彻赫恩 著
一个人的两个故事：（上册）		
《昨夜雨骤风狂》	2003年	吴弘达 著
《永远的北大荒》	2004年	黄 湛 著
《从诗人到囚徒》	2004年	尚建国 著
《红尘白浪》	2004年	叶少华 著
《中国冤案录》第一卷（2001-2003）	2005年	廖亦武 著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2005年	闵和顺 著
《梦断未名湖》	2005年	陈奉孝 著
《中国冤案录》第二卷（2003-2005）	2006年	廖亦武 著
《赤海漂零记》	2006年	曾石荣 著
《记忆的声音》	2006年	阿妈阿德 口述 乔伊·布雷克斯莉 著 杨莉藜 译
《中国第一罪》	2006年	秦 耕 著
《中国巴士底》	2007年	李贵仁 著
《从列宁格勒到新肇监狱》	2007年	张铁东 著
《燕园风雨铸人生》	2007年	王书瑶 著
《花旗梦别神州泪》	2007年	唐彼得 著

## 人权书目（中、英文）

- Communist Charity 2000 年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the Executed Prison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共产党的慈善事业》 2001 年  
——关于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报告
- 《国策下的国难》 2003 年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评析
- 《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 2004 年
- Better Ten Graves Than One Extra Birth 2004 年  
China's Systemic Use of Coercion to Meet Population Quotas
-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刘晓波 著 2005 年
- 《劳改手册》 2003-2004 2004 年
- 《劳改手册》 2005-2006 2006 年
- 《反右研究文集》 2008 年

劳改基金会网址: [www.laogai.org](http://www.laogai.org) ;

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网址: [www.observechina.net](http://www.observechina.net)



# 反右研究文集

劳改基金会 中国信息中心

**Research o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Washington, DC  
2008

[www.laogai.org](http://www.laogai.org)  
[www.observechina.net](http://www.observechina.net)

ISBN 978-1-931550-18-5  
Printed in U.S.A.  
U.S. \$ 15

